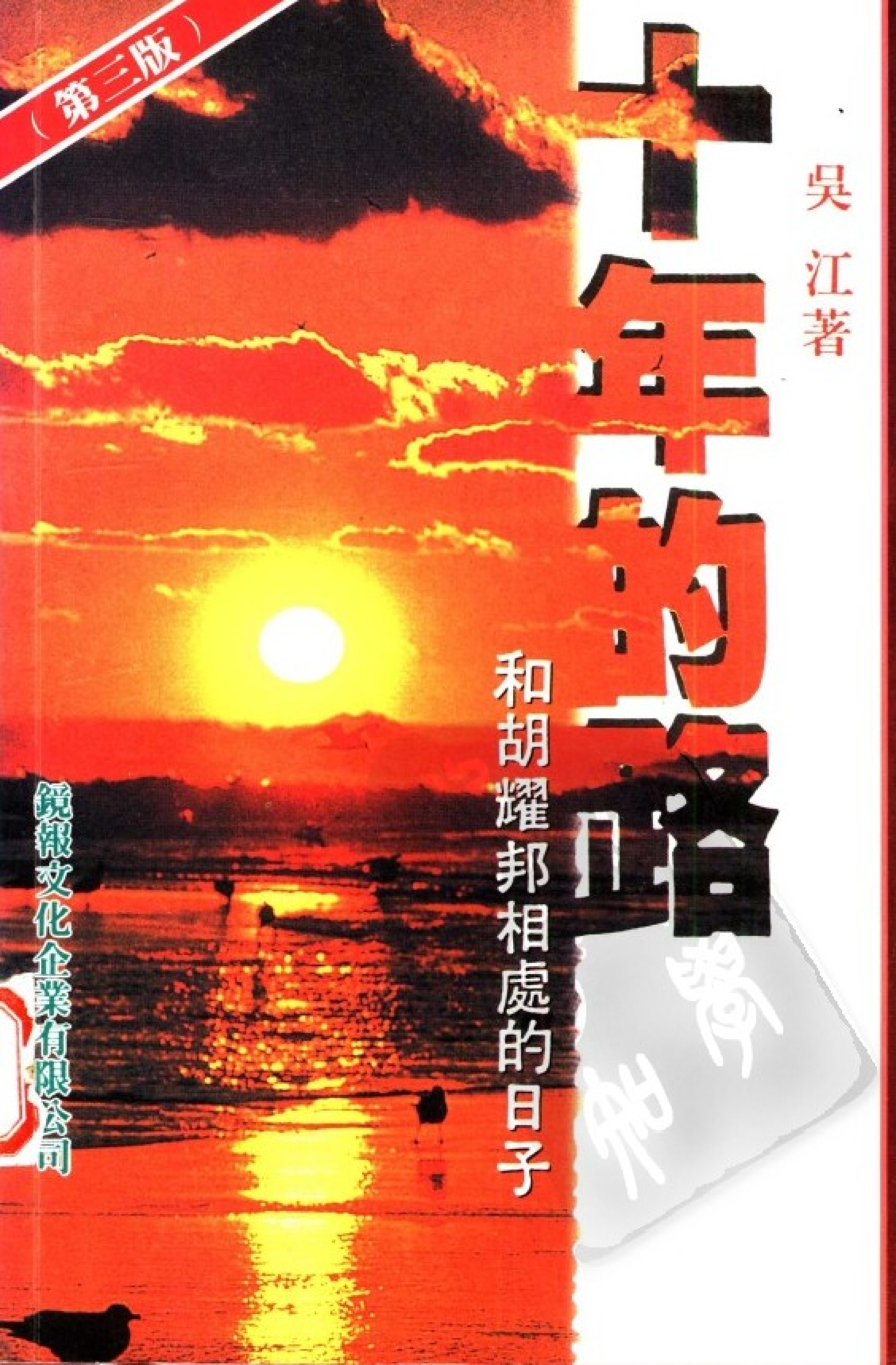

（第三版）
十年的路
吳江著
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
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十年的路

內容提要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七年，是中共對過去年代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進行反思和撥亂反正的時期，也是最初撞開改革開放大門的時期，因而是中共歷史上極其重要的十年。這期間先後經歷了關於「眞理標準」討論，糾正極左路線，新領導班子的特殊運作，開始全面進入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等重大鬥爭，並伴隨着多場激烈論爭，這些論爭無不關係着中國的前途。

作者吳江教授是中國著名學者、中共資深理論家。在本書中，作者以親身經歷記叙了各次重大論爭的內幕；並回憶了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披露了這位卓有貢獻的前總書記鮮爲人知的鬥爭遭遇及其內心世界，也爲自己走過的這十年路程作了小結。

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認識到中共在這十年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同時可瞭解胡耀邦從「文革」後走上鬥爭第一線直到最後倉促下台的一些內情。

ISBN 962-7315-18-4



十 年 的 路

——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

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書　　名：十年的路
——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
作　　者：吳　江
封面設計：魏一翀
責任編輯：梁德標
出　　版：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2－6 號華都大廈 10 字樓 D 座
電話：2576 9288　圖文傳真：2577 4130
THE MIRROR POST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LTD.
Flat D. 10th Floor, Waldorf Mansion,
2－6, Causeway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發　　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九龍旺角洗衣街 245－251 號地下
電　話：2381 8251－4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245－251 Sai Yee St., G/F.,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印　　刷：永利印務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官塘道 472－484 號官塘工業中心第一期 4 字樓 L 座
電話：2797 0893, 2763 7678　圖文傳真：2357 4520
WING LEE PRINTING CO., LTD.
Flat L, 4/F., Phase 1, Kwun Tong Industrial Centre,
472-484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62－7315－18－4
版次：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二版
　　　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三版
定價：港幣六十元正



作者簡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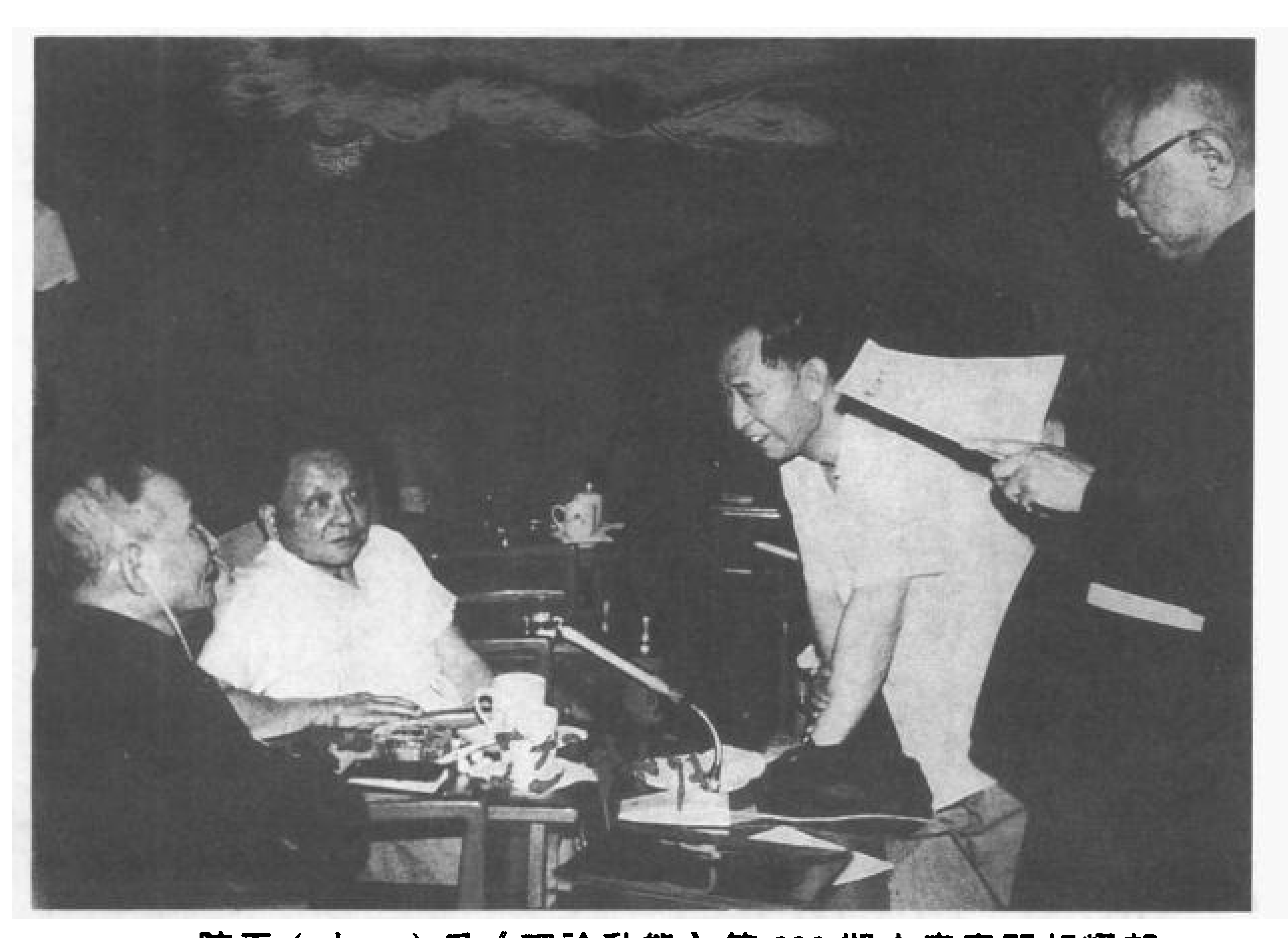
吳江教授，浙江諸暨人，1918年生。1937年參加社會工作。從五十年代後期起從事學術研究，先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主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1977—1982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黨校期間任哲學教研室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副教育長兼理論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

1990年離休。曾爲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工農聯盟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問題》、《歷史辯證法論集》、《認識論十講》、《哲學專題二十講》、《當代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民主與政黨》、《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略考》、《中國社會主義新路向》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鄧小平一九八八年題字。



陳雲（左一）爲《理論動態》第 282 期文章責問胡耀邦（右二）。鄧小平（左二）和李先念（右一）在場。（詳情見本書第 118 頁）



調寄蝶戀花

崖上有鷹終日伏。
何事慵閑，忘卻雲天闊？
道是連年征戰惡，槍林彈雨翅微折。
野鷲曠剛無媚質。
肯效堂燕，婉轉啼梁側？
自啄羽毛除污血，創收一鎩便飛掣。

——作者寫於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

雷兵書

目錄

寫在前面

從十年迷宮（「文革」時期）走出來，眼前一片迷惘。惡夢是在理性逐漸恢復正常的過程中慢慢地消逝的。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這又一個十年，是對過去年代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進行反思並開始撥亂反正的時期，也是對社會主義自身進行改革的初始階段。有人說，這是社會主義歷史的新時期，或者說是由舊社會主義轉變爲新社會主義的時期。所謂新社會主義，就是擺脫八十年代以前的舊社會主義模式，創造新社會主義模式，即重新開闢社會主義的新道路，眞正走中國人自己的路。所以十分明顯，這不是將五十年代以來的舊東西簡單地恢復，而是重新進行一場革命性的變革。這場變革比起五十年代的改造來要複雜得多，也艱難得多，因爲鬥爭發生在內部，發生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部，是社會主義前所未有的嚴格的自我批判（改革即自我批判）。

這場鬥爭總的可以說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中根深蒂固地積累起來的教條主義與「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總清算。我的這種認識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十年迷宮，憂傷和痛苦塞滿心頭，思慮肅括而凝重。到後期，忽然有些悟性，用思漸寬闊，覺得我們黨就其爲自己確定的理想和任務來說，固然堪稱偉大，但行動並非一貫正確。所謂一貫正確，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從此，我開始動起自己的腦筋來，力求對每一項行動作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這種思想逐漸明確起來，是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在改革由局部向全面推進、撥亂反正逐

漸深入的過程中，經過多種性質的鬥爭（堅持極左與反對極左，改革與保守，制度變革的嘗試，反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新領導人的上台下台，等等），而逐漸達到的。思想達到這一步，我開始覺得對許多問題需要重新認識，對社會主義也好，對馬克思主義也好，都是如此。「重新認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

我因改換工作崗位，以素不習官場的一介書生在某種程度上捲入了這一時期的政治核心鬥爭，經歷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是始料所不及的。寫文章應當少說自己，可是這一次是例外。就我個人來說，特別是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開始的兩場鬥爭使我深深地捲入了爭論風暴的漩渦，並因而使我不能擺脫接着而來的風暴的襲擊。我這個人，參加革命工作數十年，仍然不熟悉、不習慣於「搞政治」、搞官場爭鬥。「文革」結束後的十年捲入了政治鬥爭漩渦，可以說是無意中偶爾闖入，以致最後不能擺脫。「十年京兆一書生」。那時有些場合之所以敢於面對風浪，不畏風險，多半出於「書生意氣」，出於捍衛自己的獨立人格，因此碰上了甚麼也就無所謂。但是既然碰上了，特別在今天，我自感有責任將這十年我所經歷的一些事和人如實地簡要地記載下來。記下這些，並不完全爲了個人（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然要毫不隱諱地記下來，並履行我應有的說話的權利，不管別人說什麼），我也不打算爲任何人樹碑，更不無端損人牙眼（我只是說出事實）。在我，只不過是想把這十年經歷作爲觀察十年局勢的一個視角提供給讀者。在記下了這些之後，我也就可以無遺憾地揮手向那風雨交加、躁動不安的歲月告別了，是非則讓人家說去。

一　新的工作崗位

林彪垮台、鄧小平復出工作，迫於當時的形勢，重新起用了一批長期「靠邊站」的幹部，我也是其中之一。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離開了《紅旗》雜誌社的幹校，被重新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去工作（說是「工作」，實際是閒置），因爲《紅旗》規定原編委以上幹部一律不得返回原單位。其實，我對於這個單位毫無留戀之情，離開反而覺得心情輕鬆一些。這裏，我想有必要先簡單交代一下我在《紅旗》雜誌社的一段經歷。

「文革」前，我在這個以陳伯達爲總編輯、直屬中央書記處管理的雜誌社工作了五、六年，參加編輯委員會（編委會爲雜誌的集體領導機構，相當於部黨組，由中央書記處直接任命），兼管雜誌的學術稿件。總編輯陳伯達爲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第一秘書。胡繩、鄧力群爲副手。康生也插手《紅旗》的工作。

這份雜誌公開標明是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性刊物。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時毛澤東再三催促陳伯達創辦。我是一九五九年夏天到任的。創辦這個刊物的目的很顯然是爲了傳播當時抬頭的「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一九五八年《紅旗》第四期刊載陳伯達的文章《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就畫出了毛澤東企圖經過人民公社邁向共產主義的藍圖。說也奇怪，這個代表中央的刊物從此幾乎沒有擺脫過「左」的立場，而且從來不作一點自我批評，在撥亂反正時期也是如此。由此亦足見「左」的勢力在黨內根深蒂固，而且從來是被默許和寬容的。

「文革」的大批判實際上是由《紅旗》開頭。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關於「四清」運動的文件提出所謂「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件是由陳伯達執筆的。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陳伯達由天津結束「四清」回來後不久，在《紅旗》發起組織一個所謂「學術批判領導小組」（「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陳自任組長，康生爲顧問，成員包括王力（中聯部副部長，稍後即兼任《紅旗》副總編輯）、關鋒（《紅旗》編委）、戚本禹（《紅旗》歷史組組長，他剛從中央辦公廳調來）及其他共七、八個人，其中沒有胡繩、鄧力群，也沒有我。鄧力群是因爲當時突然被調離《紅旗》，下放廣西桂林地區。這本是陳伯達、康生在「文革」山雨欲來時對鄧的一項保護措施，因爲鄧力群曾任劉少奇秘書，與劉關係不同尋常。鄧突然外調廣西，當時許多人被蒙在鼓裏，就連鄧力群自己也深感委屈。胡繩呢，大概是因爲當時他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眞的關係已爲人所注意（彭是保護吳晗的，認爲吳寫《海瑞罷官》並非反黨，胡繩也這麼看）。至於名單中沒有我，大家就有些奇怪了，因爲在人們的眼中，陳伯達起草甚麼東西通常拉我參加，這次「批判領導小組」我卻榜上無名，於是大家紛紛猜測。稍後才弄清楚，原來有人反映我在背後議論陳伯達。事情可能是這樣：一九六五年我隨陳伯達赴天津參加「四清」工作，那時陳伯達正熱心提倡「電子化」、「托拉斯」，還講「計劃生育」、「改造城市廁所」、「抓鎮辦工業」等等，我對此也頗感興趣，還同當時的天津市長胡昭衡一道，爲他組織過幾次座談會。陳伯達確是一個不甘寂寞、肯用思想的人。但他不善理生活，生活作風上也有些不嚴肅、不檢點，而且爲人有古怪脾氣。我可能偶爾對人提起過這類事，後來單位的大字

報把這上綱爲吳某人誹謗陳伯達；可能此前陳伯達本人也接到過類似的「小報告」。我是怎麼知道此事的呢？因爲「批判小組」成立後不久，一次陳找我單獨談話，開門見山說：「我把你打入了冷宮，你知道爲甚麼嗎？」不等我回答（我也無法回答），他接着就提出：「這是一件重要工作，你寫一個東西給我，就可以參加小組。」我沒有分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叫我向他遞一份檢討書。照我的性格，這種做法令我十分反感。我就抱着「隨你便」的態度，不予置理。此後我記得我大概只列席過一次會議。運動正式發動後，我果然作爲第一批「黑幫分子」被揪出示衆。事後想來，這對我實在是一件大幸事。這也算是陳伯達無意中對我做的一件好事，一種幫助。否則，後果實難設想。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公佈後，鄧力群也從廣西被揪回，加入我們的「黑幫」隊伍（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黨校新任校長無端造謠，說我在「文革」初期曾擔任「鄧力群專案組組長」，這是十分可笑的，其實，我的「黑幫」資歷比鄧力群還老一些）。此後，《紅旗》雜誌雖仍由陳伯達任總編輯，實際上編務由關鋒主持，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力、關鋒垮台，又由姚文元接管，直至「四人幫」覆滅。

我下幹校的時間是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整個「文革」期間，我沒有得到過任何工作，除了勞動還是勞動；憲法所賦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權利（我當時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更如糞土被踐踏，遑論其他。一九七五年重新安排工作時，《紅旗》的主管還是姚文元，因此，到哪裏去也比回《紅旗》強。但是，幾乎盡人皆知，我的新工作地點——中共

中央黨校一直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惡戰」之地，與上層的政爭又總是密切有關。陳伯達特別康生是插手黨校的主角。學校內部，不是楊獻珍整周文、張如心、艾思奇等人，康生、陳伯達站在楊的後面，就是反過來康生在毛澤東示意下整楊獻珍（批「合二而一」論）。從傳統勢力來看，過去的中央黨校基本上是楊獻珍的領地。「文革」期間黨校停辦，造反派掌權，康生直接指揮。一九七五年由於鄧小平的整頓工作，全國形勢有所好轉，加上康生病重，黨校由紀登奎兼管，紀對意識形態工作似乎持謹慎態度，很少到校視事，所以這一段時間裏造反派的行動較爲收斂。

我到黨校正是批林批孔時期，我被放置在哲學教研室，沒有職務，沒有工作，領乾薪而已。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到黨校至一九七七年三月黨校正式恢復並擔任職務，這中間爲一個不平常的過渡時期。這時，在接二連三發生重大事情的情況下，我做了兩件事。

幹校後期，大概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我已告病假返京，一面跑醫院，一面搜集材料準備寫一部《文化大革命備忘錄》，記下「文革」從起因到運動的全過程。這件事是一位過去一道從事群衆工作的同志催促我做的，她認爲像我這樣的人有責任將這場災禍如實記載下來，才對得起後人。這位同志後來不幸因車禍身亡。當時搜集材料很困難，因爲沒有活動的餘地，只好翻翻舊報章雜誌，一部自備的《新華月報》幫了我很大的忙，有時也設法找到一些舊文件。當時這樣做倒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託，也不失爲度日子的一個辦法。到黨校報到以後，因爲我的住家在城內，黨校在城外西郊，距離較遠，我以年齡爲由（當時我已經五十八歲了），且身體不佳，就大部分時間請

假在家從事這項地下工作。

然而，爲時不久，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病逝，全國哀悼，終於發生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形勢緊張，我被迫停筆，並將已寫好的一部分「堅壁」起來。因爲清明節那天我和我的家人也到天安門廣場去兜了一圈，廣場遍佈特務和錄像機，實在不能不有所提防。

「四人幫」以此嫁禍於鄧小平。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議；同日，又發佈任命華國鋒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定。由此可見，毛澤東雖一改初衷再度廢黜了鄧小平，但並沒有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四人幫」由此更加遷怒於鄧小平，將天安門事件比作「匈牙利事件」，而將鄧小平比作納吉，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批鄧」運動，企圖利用「批鄧」達到搶奪最高權力的目的。這次「批鄧」，挨整的人中就有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胡耀邦此時主持中國科學院的工作，胡喬木、鄧力群則在鄧小平管理的國務院研究室工作。鄧力群挨批，是因爲他是闡釋鄧小平「整頓」思想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的起草者。這三個人在挨整中表現不同，遭遇不同，此點留到後面再說。

「批鄧」開始，我索性取得醫院的證明，居家養病，靜觀事態變化。這時還能做些甚麼呢？《備忘錄》暫時不可能續寫了，我於是另找了一個精神寄託點：清算「評法批儒」這筆賬，鑽進了古代法家學說和儒家學說的關係史上去。這件事對我來說頗不容易，因爲我過去對古代學術鑽研甚少，這次是認爲至少在目前有澄清這個問題之必要，所以硬着頭皮強迫自己鑽故紙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時初稿已成，同年

十二月就以《法家學說的歷史演變》爲題，發表在《歷史研究》雙月刊上。這是當時公開揭露「四人幫」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有數文章之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摘要介紹了此文的內容。

「四人幫」垮台後，造反派自身難保，我也就落得心安理得地在城內居住。這時本想把《備忘錄》續寫下去，但一提起筆來就感到時機不成熟，只好又放下。這裏附帶說一下，《備忘錄》已寫的另一部分即談「文化大革命」成因部分，經過一些挫折，最後還是公開發表了，但那已是十多年後的事了。

二　胡耀邦逐漸走上鬥爭第一線

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逮捕起來投入監獄，無疑是一場重大的鬥爭，是扭轉黨和國家危局的勇敢之舉。這場鬥爭自然應歸功於葉劍英、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思有所作爲。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爲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此人原爲康生秘書，這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指揮這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戰役的是葉劍英，汪東興爲輔。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四人幫」就擒。

當晚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由華國鋒暫任黨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待以後的中央全會予以追認。此後緊接着展開了另一場鬥爭，即關於是肯定「文革」還是否定「文革」、是堅持極左還是否定極左的鬥爭。

這場鬥爭當然要從華國鋒的態度說起。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着一系列重大的黨內外幹部和群衆強烈要求解決的問題，如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要求鄧小平及其他老同志出來工作，要求悼念周總理及朱德、陳毅、賀龍等人（因爲當時有各種禁令不准悼念），要求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包括彭德懷問題，彭羅陸楊的問題、「六十一人案」的問題等，還要求展開對「四人幫」的揭、批、查運動。這些都是當時面臨的迫切問題。華國鋒的態度又如何呢？

華國鋒是毛澤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不臣服於「四人幫」並最後下決定粉碎了「四人幫」，這是一件大功勞，人民是不會忘記也不應當忘記的。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後，華國鋒也爲結束「文革」的混亂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沒有從根本上認識「文革」的問題。作爲毛澤東的繼承人，他也沒有可能弄清「文革」與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相反，他爲維護毛澤東而全力堅持「文革」所鼓吹的「階級鬥爭爲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不斷反右的極左路線，並同樣將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等同於「毛澤東思想」來維護，在行動上阻撓解放老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華國鋒的這種立場和思想，集中表現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名發表的一篇題爲《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的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有名的所謂「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汪東興直接授意李鑫起草，最後經華國鋒批准發表的。

社論發表後，黨內外議論紛紛，認爲這是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訊號。汪東興的一些談話確實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鄧小平這個人也是有錯誤的，而且錯誤是嚴重的。他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東西。……鄧小平的問題，主席已經有了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不管怎麼樣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當時「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毛辦」）一個負責人也說：「『四人幫』是壞的，不能說鄧小平就是好的。」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汪東興向中央

辦公廳系統傳達會議精神時，一開口就問：「這裏在座的有沒有人到天安門去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接着說：「讓鄧小平馬上出來工作，把毛主席擺在哪裏？毛主席指示還執行不執行？」

二月七日社論之後，八日又發出關於「追查政治謠言」的通知。這樣一來，政治形勢大變。因粉碎「四人幫」而受到鼓舞的群衆情緒又消沉下去了，「四人幫」勢力則興高采烈，甚至發生了過去因反對「四人幫」而遭監禁、在粉碎「四人幫」後獲釋放的人這時又重新被投入了監獄這樣的事。這是一次眞正的「二月逆流」。

儘管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宣佈「文革」結束，中央領導班子也作了一些調整（大會選舉華國鋒爲黨中央主席，副主席依次爲：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在報告中也不再提「兩個凡是」了，採用了鄧小平的「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提法；但是，「文革」所執行的路線和所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體系仍然繼承了下來。

問題究竟在哪裏呢？問題首先在於：這場最深刻的鬥爭不是單純依靠少數幾個領導人所能夠解決的，雙方都需要依靠一定的黨內力量和社會力量。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雖然「四人幫」被粉碎，但其社會力量仍嚴重存在，而且集中在「英明領袖華主席」麾下，歷史悠久的極左思潮依然佔上風，因此「十一大」後雖然有些老同志已經出來工作，特別是恢復了鄧小平原來的全部職務（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儘管如此，「十一大」仍堂而皇之地鼓吹「文革」的口號（包括「揪黨內走資

派」）和煽動極左思潮，因爲它依靠了當時依然存在的「文革」所賴以進行的社會力量和黨內力量。要根本扭轉局勢，只有依靠與之相抗衡的另一種社會力量和黨內力量，有效地抑制那股以教條主義、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和「兩個凡是」爲其特徵的極左思潮。而爲了發動和組織這種力量，第一步只有勇敢地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解放大批老幹部，以及平反歷二十多年之久積累起來的全部冤假錯案，包括數量巨大的「右派」冤案。

從中國歷史上看也是這樣，古來不少朝代的昏暗政治後來轉爲較爲開明的政治，有些也是從平反冤案冤獄開始的。

胡耀邦正是適應這種形勢而在歷史舞台上嶄露頭角的人。胡耀邦是湖南瀏陽人，是被梁啓超譽爲「中國爲國流血第一烈士」的譚嗣同的小同鄉。湖湘之地，歷來人才輩出，雲興雷奮，國民革命以還，湖南省民風士風尤爲各省之冠，捨身求義者絡繹不絕。胡耀邦十四歲參加紅軍，他個子很小，但勇敢機智，被稱爲「紅小鬼」。現在在老一輩革命家當中，相比之下，胡耀邦仍是比較年青的一個。他這次復出，首先利用中央黨校這一陣地，其後又利用中央組織部這一陣地，冒着極大的風險，率先衝破各種禁區和阻撓，大膽地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解放幹部、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爲釋放、發動黨內和社會上各種健康力量而竭盡全力。可以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很大程度上是在這批被釋放的力量的基礎上召開的。

華國鋒也很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他當上中共中央主席後，爲爭取「高舉」，成立了「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突擊出版《毛選》第五卷，而這卷《毛選》的不少文章正是集中表現

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然而，「毛辦」的工作並不限於此，它同時也是一個意識形態指導機構，這個機構由汪東興負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由胡喬木負責），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等人參加（熊還兼任《紅旗》雜誌總編輯）。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恢復中央黨校，人員安排是：華國鋒兼任校長，汪東興爲第一副校長，胡耀邦爲副校長並主持黨校日常工作。

任命後不久，胡耀邦就離開當時工作的中國科學院來到了黨校。從其所負責任來看，胡耀邦的活動地盤是有限的，但這並未能束縛住胡耀邦的手腳。以爲「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華國鋒萬沒有想到，在「批鄧」中被「四人幫」整得死去活來，粉碎「四人幫」後較快地把他解脫出來，過去還同自己有過一段共同工作史（六十年代胡耀邦下放湖南任湘潭地委書記時，華爲副書記）的小個子胡耀邦，這次竟然會站到自己的對立面，幹出了一番完全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業。

三　創辦《理論動態》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正式任職時間爲五年（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八二年四月），但眞正管工作的時間不過四年略多一點，即從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一九八一年六月。一九八一年六月胡接替華國鋒爲中央主席後，就很少有時間過問黨校的事情了。

「文革」前，我同胡耀邦只有過一次接觸。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間，那時我在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工作，該辦公室分工管理工會、青年團、婦聯會等群衆團體。那時胡耀邦剛從四川川北區黨委（書記）調京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職，和鄧小平到中央任職的時間差不多。其時我有一個短時間奉派聯繫團中央，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瞭解團中央的工作狀況。

大概是第一次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時候吧，胡耀邦會後留我寒暄了幾句。根據我那時跟團中央各單位的接觸，瞭解到大家對胡耀邦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認爲胡耀邦思想活躍，不迷信，敢說話，與人坦誠相見。例如，那時候胡耀邦就敢於說：「爲甚麼要喊毛主席萬歲呢？人哪能活一萬歲！」胡耀邦還給中央團校的青年人出過一個題目，叫做《論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一分爲二》，說：對毛主席的話也要獨立思考：「毛主席只有六十幾歲，而人類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歷史，積累了許多科學知識，一個人不可能都懂得，都有辦法。」如此等等。這固然是胡耀邦的獨立特行的風格，但我想，這恐怕與當時黨內生

活還比較正常有關，因此我聽了也不覺爲奇。團中央書記們卻有一個意見，就是覺得胡耀邦的主意多，事前卻商量不夠，有些問題往往未醞釀成熟就在會議上倉促作決定，因此覺得有些不太適應。我如實地向胡耀邦本人反映了這些意見。不久有別的人代替我聯繫團中央，從此就不再見面了。後來聽說胡調任西北局第三書記，因對一些「左」的作法不滿，與第一書記劉瀾濤（原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主任）不協調，挨了整，以後下放湖南湘潭地區工作了一段。「文革」時調回團中央，和另兩位姓胡的書記（胡克實、胡啓立）挨整最兇，時稱「三胡」。後下放幹校，胡耀邦在幹校除勞動外，拚命讀書，大家都知道胡耀邦除嗜書外別無其他嗜好。同一幹校的其他人都記得，當時胡耀邦引用《後漢書》中的幾句話來安慰同志，也勉勵自己：「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不顧小節。」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胡耀邦即調回北京任中國科學院黨組負責人，主持起草《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批鄧」時這個文件被認作「大毒草」，因此再次丟掉工作，並在重病中遭到殘酷鬥爭。但他仍然頑強地挺過來了。

這次胡耀邦任黨校副校長並主持日常工作，黨校許多人都以期待和懷疑的心情看待這件事，因爲歷史證明黨校的事情實在太難辦了。「文革」期間胡耀邦和黨校也有一段因緣，即一九七五年胡耀邦曾到黨校特設的中央讀書班學習。中央讀書班是受「四人幫」嚴格控制的，「左」的勢力十分猖獗。胡耀邦、呂正操、程子華等少數老幹部在班裏處於被批判被監督的地位。胡耀邦的表現與衆不同，當讀書班組織學習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

的全面專政》兩文時，有人狂熱吹捧，胡耀邦卻一言不發，甚至在大課堂上打起瞌睡來。但他對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卻用心甚勤，寫了厚厚的讀書筆記。因此黨校有人評論，說胡耀邦在對敵鬥爭中是硬骨頭，對馬克思主義是虔誠的學習者。

胡耀邦到校後，工作上按計劃雷厲風行：揭批「四人幫」罪行和處理黨校造反派，籌組行政機構和各教研室，解決校舍問題（「文革」期間校舍被總參機關佔用，必須讓他們及早撤出方可復校）。首先辦好這三件事，力爭下半年招生開學。

揭批「四人幫」罪行大會開了幾天，造反派頭頭一個也不「隔離」，一律在群衆大會上揭發和講清問題，進行「冷處理」；後來最高處理是將個別人開除出黨，但仍給予一定工作。胡耀邦在第一次大會上就認出了我，休憩時他把我拉到一邊，說：「我知道你已來黨校。多年不見了，我一直是你的讀者。關於法家學說那篇文章寫得好，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做得對，封建主義在我們這裏還很有市場呢！理論就是要聯繫實際才有人愛看。你有時間請到我那裏談談。」

我怕打擾他的工作，直到大會結束後，才打電話同他約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們兩人晚上都要回城裏住宿），到他的臨時辦公室去看他。一見面他就談起校舍這個麻煩問題，但他告訴我：他準備將馮文彬調來，讓他來處理這件事，好在總參謀長是鄧小平，有他一句話就行。胡特別說，馮文彬是井崗山時期的老同志，如今井崗山的老同志只剩下四十多個了，馮算是其中的一個。馮從長征直到解放後，主要做青年團的工作，胡耀邦曾是他的部下。馮進城後犯了錯誤，被撤銷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下放天津，然後又到上海。這次是葉劍英把他調回北京，擬請他做軍隊後勤工作。胡耀邦說：「我把他要來了，他

行政能力強。過去對他的處理過重了些。他來黨校擔任副教育長的職務。」按照延安中央黨校的傳統，黨校教育長一職責任很重，行政教育一把抓，負全局責任。

談起「文革」，我說你比別人吃了更多的苦頭。他說：「我不是還活着嗎？有的同志已經不在了。」他突然問我：「他們究竟爲甚麼要整我？」我奇怪他這時爲甚麼提這個問題，想了一想，只能提出這樣一個假設：「也許是因爲他們認爲你是鄧小平的人。」他說：「我到團中央和鄧小平沒有關係，是毛主席點的將。」我隨即想起一件事，問他：「文革中爲甚麼仍選你當九大代表。還好像是周總理提的名。」胡苦笑着說：「那是爲了湊數，湊夠代表中間原中央委員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這個問題談到這裏就談不下去了。

接着他問起我關於黨內「筆桿子」的情況，他像是很關心這件事，首先問我毛主席是怎樣使用陳伯達和胡喬木的。我只能說陳伯達的情況，陳雖也負責起草中央的重要文件，但主要負責理論性的文章，毛主席交給他題目後除了特殊情況，一般不限定時間，請他慢慢推敲去。我說，毛主席懂得照顧理論研究的特點。胡喬木則是毛主席身邊隨時備用的筆桿子（我沒有用「侍從秘書」這個詞），起草文件，撰寫政論，都少不了他，這就需要才思敏捷，善於領會上意。胡問：《紅旗》雜誌還有哪些理論水平和寫作能力較高的人？我只說出胡繩一個人的名字，我說胡繩的特點是廣聞博識，思維縝密，筆頭穩健，尤其有史學底子，《紅旗》的重要文章、社論除少數由陳伯達裁定外主要裁決權在胡繩，尤其是關於學術方面的。胡繩不管人事，但待人較寬厚，因此頗有口碑。胡耀邦又問中央起草重要文件除掉陳伯達、胡喬木，主要依靠甚麼人？我覺得不便正

面回答這個問題，其實胡耀邦自己多少也明白一些，無須我多說。胡耀邦在仔細聽了這方面的情況後，突然說：「我們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沒有一個陣地不行。你看黨校出個刊物如何？」「是校刊？」我問。他搖搖頭：「是議論性的刊物，針對時弊，短小精悍，供黨政幹部閱讀。」

看來，胡耀邦這次聊天的落腳點是在這裏，他頭腦中原來正醞釀着辦一個刊物。這次談話使我察覺胡耀邦對於文字宣傳和理論工作的重視。

黨校雖素稱「惡鬥」之地，但現在形勢變了，任務也變了，胡耀邦認定這是一個訓練全黨高中級幹部、在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因爲到中央黨校來學習的是中央各部委以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地區一級的領導人，還有部隊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所以這裏正是全國全黨現職領導幹部集中之地。胡耀邦估計，只要這些幹部的思想提高了，全黨全國的面貌也會很快轉變，所以他全力以赴。

馮文彬果然不辱使命，經過交涉，總參答應於七七年八月前將全部人員遷走。這樣，問題就簡單了。學校的新機構很快建立起來，最高領導機構仍爲校黨委（校務委員會是以後設立的），下設政治部爲其辦事機構。校黨委名單由中央主席直接批准，胡耀邦爲書記，稍後調來的馬文瑞（「文革」前爲勞動部部長）爲副書記，馮文彬等列名校黨委常委（我是在第二屆才列入這個名單的）。但胡耀邦最爲關心的是教育內容的確定和各教研室的組成。教研室仍分設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黨史、黨的建設五門類。我兼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前主任艾思奇在「文革」前已去世）。這時的困難在於十年災難，思想理論方面一切都混亂不堪，各門課程究竟如何安排才能勝

任新的任務呢？

胡耀邦親自抓這個問題。他關起門來整整兩天找人談話，瞭解「文革」前的教學內容，並找當時還沒有出來工作的胡喬木徵詢意見。看得出來，胡耀邦對胡喬木是很尊重的。爲此，我也登門拜訪胡喬木，這是我第一次同胡喬木接觸。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胡喬木是相當謙虛的。我猜想，這大概是因爲我們尚屬初見，或者是他在當時還沒有完全從「批鄧」的內疚心情中擺脫出來的緣故。總之，他既謙和又積極幫忙，爲我們列出一批書目，並且強調要把按勞分配這個問題重新搞清楚。「最後的內容待今年八月『十一大』之後再敲定。」胡耀邦說，「但黨校必須爭取在今年九月開學，不能再推遲了。」

這時，胡耀邦不僅以最快速度籌辦中央黨校的復學，同時還爲中央起草關於催促各省市委立即着手恢復各級黨校的指示。這個指示命我屬筆，他說「你是搞理論的」，不過最後還是由他親自動手草成。中央黨校復校後不久，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召開第一次全國黨校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提出將黨校工作列爲黨委工作的重要日程，提高黨校的規格和待遇，由黨委常委以上幹部兼任校長等，這是後話。但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召開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則是從此開始的。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由毛著編輯委員會精心編選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終於出版了。這卷《毛選》收入了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的著作、講話等，以講話居多。五十年代的文章、講話有許多表現毛澤東已進入了他的晚年。五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華國鋒爲《毛選》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長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顯然是爲下半年召開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作準備，文章可以說亮明了

這次黨代表大會的方針和意向。這篇長文貫徹「兩個凡是」的原則，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抓黨內走資派」，「繼續革命」就是「繼續反右」，等等。

全黨組織學習這篇文章，黨校自然不例外。七月十二日，胡耀邦邀集各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談。我即席發言，講到應當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我說，對「繼續革命」有個總的理解問題，不宜只限於「文革」的範圍，何況現在「文革」已經結束。談到「繼續革命」的對象，我講了三點意見：第一，不能將「文革的重點是整走資派」這一提法擴大爲「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對象是整走資派」，這樣「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來不停頓地『打倒一切』」；第二，「繼續革命」的任務應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即生產力方面的革命。在此特別引證了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所寫《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要把黨的工作的着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我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我說，有人認爲「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說：「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這天晚上，胡耀邦沒有回城內，他把我找去，說：「我們的刊物可以辦了。你將今天的發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數不超過五千，明天交稿，我作爲創刊號的文章發表。刊物的名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理論動態》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我的發言並沒有提綱，屬即興講話，所以要草成一篇文章頗費斟酌。尤其當時全國正在學習華國鋒的文章，我的意見明明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另作解釋，和「英明領袖」華國鋒是同題異調，談談還可以，寫成文字發表行嗎？但我還是漏夜將它寫了出來，冠上一個題目《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第二天拿去交卷。

《理論動態》的創刊號就這樣出版了，出版日期爲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這個刊物作爲內部刊物發給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負責人，黨校的學員則人手一冊。不出我之所料，《理論動態》創刊號在有些地方遭到被封鎖的命運，一些領導人下令「不得擴散」。這種情況後來也屢有發生。

如何對待「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是七十年代末進行撥亂反正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文革」結束後，對待這一提法經過三個階段：一是「凡是派」的堅持；二是另作解釋；三是廢止。創刊號的文章是另作解釋，當時這樣做已經很不容易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原則》的報告，還說：「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麼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至於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182 頁)

後來當我即將離開黨校的時候，我才知道，在華國鋒發表他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篇長文之後，胡耀邦之所以敢於發創刊號的文章，原來是經鄧小平的認可。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上午，總書記胡耀邦和組織部長宋任窮爲調動我的工作事找我談話，胡耀邦一開頭就說（根據當

時談話記錄稿）：

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開始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口號。一九七七年七月吳江寫了一篇短文《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繼續革命的主要內容應是文化、技術革命，生產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時候提出這個論點是不容易的，可以說是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個行動。我把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論問題上第一次接觸，那時喬木同志還沒有恢復工作。這篇短文當時就作為《理論動態》創刊第一期發表。三中全會後過了一個時候，中央提出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也是對的，那是以後的事了。

胡耀邦當時為甚麼當着宋任窮的面重提這件事，用意何在，我不得而知。不過我不能不提一下的是，直到今天，有人（當然是少數人）仍認爲以「向走資派奪權」爲內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是對的，並舉出趙紫陽爲例（其實當然不是只指趙紫陽一個人）。

應當說，我從政治思想上認識胡耀邦，主要是從創辦《理論動態》開始的。在當時「兩個凡是」勢力籠罩一切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需要膽識的。以後（這裏應當加說一句：一九八二年以前）撥亂反正中一些重要的討論，如關於眞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關於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等，多由這個刊物發起。《人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的許多重要文章，也多由這個刊物供給。爲甚麼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呢？因爲用此名義可以繞過中宣部及其他意識形態工作

機構審查這一關。正因爲如此，這些文章使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大傷腦筋。這個小刊物由胡耀邦親自編輯，親自出題並最後定稿。從一九七七年七月創刊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黨校職務），這個刊物共出 345 期（目錄見本書附錄四）。將來如果有人願意研究「文革」以後的撥亂反正史，我相信，這個刊物將會成爲一份重要史料。

四　第一次登上中央黨校講台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舉行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宣佈「文革」結束，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是有歷史意義的。但是大會並沒有批判「文革」本身。就華國鋒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來說，這次大會基本上是一個堅持「兩個凡是」的大會，它維護了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爲核心的「文革」思想體系和一系列既成事實；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但是又堅持「階級鬥爭爲綱」的治國方針（所謂「抓綱治國」），堅持繼續反右；在組織上則企圖搞成一個「華汪體制」。汪東興爲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腦人物，他直接控制中宣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毛辦」等單位；「十一大」前後，他又掀起了一陣個人崇拜熱，大樹特樹華國鋒。

大會結束，九月份，中央黨校正式復校開課。但在上述政治形勢下，很顯然，進行教學並不是一種輕鬆的任務。

第一期學員約千人左右，由三部分人組成，分三個班：一爲省部級以上幹部班，其中有許多是剛解放出來還沒有安排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地專級幹部班；三是理論幹部培訓班，都是年青人。胡耀邦親自主持並確定這一期的教學方針與內容：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反動言論，批判各種錯誤思想，針對這幾年被搞亂了的問題，有選擇有重點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當時還沒有可能提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問題，因此，所謂撥亂反正，開始只提「撥林彪、『四人幫』之亂」，

而沒有提「撥『文革』之亂」，事實上當然不可能不講「文革之亂」。

黨校第一期教學的效果不限於直接參加學習者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它對全黨和全社會所發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從各種渠道傳播出去，甚至形成一些風波，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第一是哲學課程。課程結束時我作專題報告，時值九月底。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黨校講台。我的報告是接着《理論動態》創刊號那篇文章，着重講兩條戰線鬥爭問題，即既反對右，也反對「左」。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反右，不准反「左」，把繼續革命解釋成繼續反右，說社會主義時期只有右的錯誤而沒有「左」的錯誤。在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年青人的頭腦中，只有「兩條路線鬥爭」的概念，沒有「兩條戰線鬥爭」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幫」的路線說成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或假「左」實右。總之，人們不知道「左」爲何物，談「左」成爲最大的政治禁忌。

我的報告無非是爲打破這種政治禁忌。報告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兩條路線」和「兩條戰線」的關係。說明錯誤路線或執行路線的偏差，往往表現爲兩種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體情況進行反對這兩種傾向的鬥爭，就是兩條戰線的鬥爭。哲學上也有兩條戰線的鬥爭，就是既反對主觀唯心論，又反對機械唯物論。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幫」的實用主義哲學。我把「四人幫」的哲學（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的哲學思想）歸之於實用主義。這裏，我講到確定路線方針是非的標準，究竟是實踐標準還是權力標準或其他甚麼標準。原文如下：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證明路線的正確與否，即

它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論範圍內解決，而要從社會實踐的結果來證明，看它是否對發展生產力有利，是否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群衆帶來了實際利益。實踐標準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林彪也好，四人幫也好，他們把實踐標準踐踏得一錢不值，自己另立一個標準，就是權力標準。誰在台上，誰有權，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有馬克思主義。官越大，權力越大，路線的正確性越大，馬克思主義也越多。這可以說是一種權力拜物教。」

這個報告後來以《哲學上兩條戰線的鬥爭》爲題發表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初出版的《哲學研究》1－2期合刊上；這段文字後來還見之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幫」實用主義哲學批判》一文。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黨史課程，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實踐同樣是檢驗黨史問題是非的唯一標準。

我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報紙上有的文章也開始提出實踐標準的問題來。「文革」後首先是哲學界提出這個問題來是很自然的。黨校講台的特點是能夠迅速地將這類觀點傳播到全國各地的實際工作中去，對實際工作產生影響。

我的報告也出現了一個紕漏。雖然報告稿事先經校黨委審查，但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甚麼問題呢？就是在講哲學上兩條戰線對立時，拿楊獻珍的哲學觀點作爲機械唯物論的代表，這是不適當的（至於楊獻珍的哲學思想究竟有沒有機械唯物論的成分，那是另一回事）。「文革」前對於楊獻珍的哲學思想曾不止一次地發生爭論。其中，關於「思維和存在的

同一性」的討論基本上控制在學術範圍內；對於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則是有意的政治打擊，是完全錯誤的。「文革」期間楊獻珍捲入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冤案，這是康生等有意製造的。這時楊獻珍的冤案尚未平反，在這種情況下提及過去哲學上的爭論，評論楊獻珍哲學上的錯誤，顯然是不妥當的。無怪此事後來招致了楊獻珍的極大不滿，由此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個問題留待後面再說。

這裏要附帶提一下的是，我的文章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初出版的《哲學研究》雜誌發表後，日本《朝日新聞》（四月一日）發表了東京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內實先生的文章，接着日本《經濟學人》又刊登歌山大學副教授河田梯一先生的評論，他們雖然很重視這個問題，但都只從學術上看問題，認爲這是「中國老思想家的復活」，或者說「這是中國建國以來哲學史的總結」，卻不明白這些「復活」的「老思想家」究竟在幹甚麼，企圖說明甚麼問題。可見中國的現實問題及其表達方式，許多外國朋友很難搞清楚。

哲學課程以後，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兩門課程都針對「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法權」及其他問題的批判，着重講清按勞分配等問題。現在已經很難想像到，這些簡單普通的問題在當時爲甚麼甚至在一些高級幹部的頭腦中弄得如此混亂不堪。這些當時我都沒有過問。跟我直接有關係的還有一門黨史課程。

按照黨的「十一大」報告和葉劍英在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要求講清楚黨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這三次路線鬥爭：第九次是關於劉少奇的，第十次是關於林彪的，第十一次是關於「四人幫」的。講「三次路線鬥爭」是第一期課程面臨

的最大難題，關鍵又是如何講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黨的「十一大」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仍緊緊抓住不放，原定的性質絲毫不曾鬆動。這無疑是新的一道重要防線。

胡耀邦原責成黨史教研室準備出一個講授提綱供討論，並明確地提出講黨史要根據兩條原則：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以實踐爲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提綱拿出來後引起了胡耀邦的極大不滿，並提出嚴厲批評，說：這份提綱的觀點是錯誤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不敢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文件出發，對文件也不具體分析，而是照抄照搬。正因爲是抄的（指抄「十一大」文件），對你們這些參加者可以原諒，但研究歷史，應該有自己的腦袋。他還舉例說：甚麼「二月逆流」？是正氣凜然的二月抗爭嘛！

提綱按照「十一大」文件寫，在胡耀邦面前通不過了。最後提出另組一個黨史研究小組，另擬提綱。胡耀邦提議這個研究小組由我牽頭，一個星期內拿出提綱。

沒有想到球卻踢到我這裏來了。我並不是搞黨史的，但又無法推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不能不愼重考慮這個問題。其實，問題說穿了，只在於如何對待劉少奇。劉少奇是「文革」的主要對象，劉少奇一案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冤案，爲劉少奇平反實際上就是否定「文革」。中共「十一大」劉少奇案件原封未動，文件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一頂也不少。這裏順便提一下，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劉少奇案件仍毫無鬆動，記得十二月二十八日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傳達三中全會時說了這樣幾句話：「有人提，

劉少奇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有沒有？我說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可能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可是這已是後話，要我們寫提綱則是在一九七七年九、十月間，「十一大」剛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說甚麼呢？

我們離開中央上層遠一點也有好處，行動可以自由些。我對劉少奇問題提出一個方案，經小組討論試作這樣的處理：第一，將劉少奇問題與林彪、「四人幫」問題在性質上完全分開。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不是黨內路線問題，劉少奇則是黨內路線問題，也不提「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改為「劉少奇錯誤路線」（那時只能這樣說，其實是連錯誤路線也不存在的）。這樣一來，實際上將「三次路線鬥爭」的提法也改了；第二，不戴「叛徒、內奸、工賊」那三頂帽子，暫時也不加同志的稱呼；第三，劉少奇的主要錯誤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冒進」，組織工作組壓制「文革」的發動等。

十一月初將擬好的提綱送胡耀邦，我當面向他提出兩個建議：一、提綱經校黨委討論通過；二、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印發給省部級幹部和地級幹部閱讀討論提意見，然後將提綱連同學員所提意見一併上報中央。胡耀邦對不先上報中央的做法似有猶豫，我說這是教學材料，是讓學員討論的，不是向下發文件，不事先上報是允許的，胡最後表示同意。校黨委擴大會議上除教研室與會同志多表示沉默外，校黨委主要成員都同意這麼辦。

這份提綱鉛印成講義式的東西，於一九七八年一月間發到學員手裏。討論是熱烈的，可謂議論紛紛。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不戴三頂帽子，是你們的獨家創

造。」發下去的提綱多數沒有能夠回收，因爲學員們多將提綱寄回到本單位去了，這可是一次「大擴散」；當然，也聽說有的省委負責人把提綱收藏了起來，不讓傳閱。

學員們所提意見多數是要求中央盡快甄別劉少奇的案件，予以公平處理。我們把學員的意見整理出來，以校黨委名義，連同提綱一併上送校長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汪東興。聽說，也有學員自己向中央上書的。這種事，實際上對平反劉少奇案件起了某種促進作用（劉少奇冤案拖到一九八〇年二月才平反）。

胡耀邦逝世那年，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成員、「文革」史研究專家金春明，在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曾專門講到這件事。他說：雖然當時那樣做「較之後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它確實是對黨內『左』的思潮的極端——『文革』發起衝擊的第一次響亮的號角，成爲後來徹底否定『文革』的先導。」

這期教學還做了一件極重要的事，不可不在這裏大書一筆，這就是在黨建課程中着重提出黨的幹部路線問題，提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明辨是非，同林彪、「四人幫」所推行的「打倒一切」及他們的幫派幹部標準堅決劃清界限，尤其要把迅速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作爲當前一項嚴肅的戰鬥任務確定下來，爲此必須排除一切阻撓和工作不得力的情況。胡耀邦在黨建教研室佈置了這門課程之後，找了三位年青同志交代給他們一項任務，即按照他的意思撰寫一篇文章，特別叮囑文章要指出：直到現在，有些同志，特別是組織部門一些做幹部工作的同志，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仍然認識不足，有的甚至還有抵觸情緒。題目定爲《把「四人幫」顛倒了

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篇文章沒有先在《理論動態》刊登，而是以三位作者的名義發表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上。

前面說過，宣佈「文革」結束後，幹部政策問題、解放幹部問題以及平反大量冤假錯案的問題，是當時大家最爲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能否很快解決，直接關係到黨內兩種力量的對比。因此，這篇文章立即在幹部和群衆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同時也遭到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堅決反對，引起了他們的恐慌。更出人意料的是，這篇文章竟引發了中央組織部內一場大爭論，部內許多老同志以及一些在職的或不在職的副部長們紛紛站出來說話，貼大字報，揭發現任部長郭玉峰阻撓落實幹部政策的惡劣行爲，郭玉峰此人正是「四人幫」時期上台掌握人事大權的。部內同志上書中央，要求撤換郭玉峰的部長職務，另派人來主持組織部的工作，迅速落實幹部政策。

中央接受了這個建議（注意：這時葉劍英、鄧小平都已是中央副主席），免掉了郭玉峰的部長職務，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正式任命胡耀邦爲中央組織部部長，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同時，任命馬文瑞爲中央黨校副校長。

自胡耀邦到任之日起，大刀闊斧的平反工作就開始進行。中央組織部迅速集中力量對所有在案幹部包括全部「右派」案件進行了艱苦的、系統的、細緻的調查甄別工作；克服重重阻力，將原來分散在各處（主要是中央辦公廳）的許多專案材料全部集中到中央組織部。在是非分明、功過分明、賞罰分明這「三分明」原則下，平反工作次第展開。一九七八年四月決定全部摘掉「右傾、走資」的帽子，接着就爲一九五七年錯劃爲右派分子的數十萬人（包括所謂「摘帽右派」在內）平反，爲

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平反，同時也爲一九五五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彭德懷的問題、陶鑄的問題相繼平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人）問題，彭眞、陸定一、羅瑞卿、楊尙昆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問題，也在會前基本查淸，有的在會上宣佈平反，有的在會後平反。建國以來我黨最大的冤案——劉少奇冤案，則於一九八〇年二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宣佈平反。

到一九八二年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這次平反的也就是過去立案審查而成冤案冤獄的，從三反、五反以來直至「文革」，其數高達三百餘萬人。還有許多沒有立案而被審查的，這次也一併獲得解脫。可以想像，與以上幹部、人員有親族關係或工作關係而受株連的人數更是大得驚人，現在他們也可以抬起頭來做人了。與此同時，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了昭雪。

建國以來僅三十餘年，積累冤案如此之多，冤獄時間如此之長，確爲自古以來所少見，足見「左」禍爲害之烈非常人所能想像。以「左」傷人、殺人，實爲共產黨人的大恥辱！這次大規模平反冤案冤獄，乃是爲共產黨人洗刷恥辱，也是爲共產黨本身恢復元氣，其功績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爲過的。

平反冤假錯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中國共產黨內人才可謂多矣，胡耀邦並非雄才大略，亦無赫赫戰功，更非老謀深算一類人物，胡耀邦之所以能夠在反「左」和平反冤案方面敢作敢爲，全憑他

抱有共產黨人的一顆赤子之心，敞得開胸懷，容不得半點個人雜念和半點派別成見，痛恨整人立威，痛恨以整人之術作爲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將自己的權位建立在別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礎之上。環顧今日共產黨，雄才大略位高權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樣從總體上看雖非大政治家但在風波詭譎、派別林立的政壇中能夠終身懷抱赤子之心始終表現出獻身精神者則幾如鳳毛麟角！

五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起

胡耀邦將主要精力轉到中組部之後，仍沒有放下《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他臨走時設了一個「理論研究室」，將《理論動態》的編輯工作交給這個研究室，作為其主要任務。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

大概是為了表示「拜托」之意罷，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飯。我向他表示：我當盡力而為，但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勝任，所以今後《理論動態》的選題及最後審稿仍照舊，請耀邦同志定。胡點頭，只說了一句：「我相信你們能夠辦好。」接着就談一九七八年春節後第二期教學問題。

理論研究室的組織短小精悍，只設《理論動態》組、研究組、外文資料組三個組。兩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校刊組（即胡耀邦原用以編輯《理論動態》的那個組）組長孟某，一位是從哲學教研室調來的耿立。三年之後又增設三位副主任，其中就有阮銘和孫長江。這時的哲學教研室除確定每期的教學內容，日常工作已可由兩位副主任照顧，因此我的辦公室就搬到理論研究室，我所關心的也是《理論動態》這個刊物能否照原樣辦下去。

《理論動態》點燃起關於眞理標準討論之火，有些偶然性。前面說過，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這個問題，一九七七年九月和十一月，在中央黨校的哲學課程和黨史課程中已經提出討論。其後，在有的報刊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黨校的哲學課程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下述的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亂

了，按照甚麼來判別是非功過，提一個甚麼標準呢？以語錄爲標準？以權力爲標準？還是以派別爲標準？「文革」通行這三條標準，結果越搞越亂，越搞是非越顛倒。甚至到了一九七七年還發生過這樣一件怪事：爲了推翻對教育工作的兩個錯誤估計，竟非用遲群（「四人幫」的屬下）筆記本上兩條來歷不明的「語錄」不可，否則就好像沒有推翻的理由。這實在是一種怪現像，如果沒有那兩條「語錄」怎麼辦呢？難道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的事實就不算數嗎？黨史的是非標準也是這樣。

提出實踐標準問題來，並不是我們的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也可說是常識，《實踐論》講得很清楚。這條原則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末又提到過一次。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外賓時談到對當時中國黨的路線的看法，他說：「我總是同外國同志說，請你們給十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爲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說明。」這段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正因爲這樣，我們雖知道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是對立的，但相信提出這個原則問題來任何人都沒有反對的理由，何況鄧小平已經正式向中央表明「兩個凡是」的提法不妥。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中央黨校第一期幾百名高中級幹部加上理論班一百多學員討論了這個問題，大家對於這條原則沒有提出異議，當然在聯繫實際時糊塗觀念還是不少的。第二期、第三期繼續討論。所以，要說提出實踐標準的影響，在後來所寫的兩篇文章之前，已經通過幾千名高中級幹部在全國擴散開去了。

黨校學員在討論中對實踐標準提出一些問題，比如說，各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誰的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眞理呢？諸如

此類。我和孫長江同志談起這個問題，他自告奮勇願意爲《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塗認識，發給學員參考。我同意了，題目就定爲《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大概是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間的事。起草過程中，曾在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過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送給我一篇他親自組織來的談實踐標準的稿件，題目是《實踐是檢驗一切眞理的標準》，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光明日報》重視這篇文章，在楊西光主持下作了數次修改。楊送來這篇稿件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報社內部意見不一，有人反對發表這篇文章；二是，楊西光得悉我們正在寫同樣主題的文章，他就把文章送來，意在得到《理論動態》的支持，首先在《理論動態》刊載比較有安全感，然後再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我看了來稿，覺得文章寫得還是有勇氣的，只是理論和邏輯性不足。我將來稿交給孫長江一併處理，請他與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我們原定的。文章最後由我修改定稿後送胡耀邦審閱。因爲這篇文章的處理既未經過《理論動態》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報告，所以我特地在電話上向胡耀邦說明這篇文稿的來歷及意圖。如前所述，在黨校，這已不是一件新鮮事。胡劃圈表示同意，未作任何修改。文章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出版的《理論動態》上發表了（見本書附錄一）。第二天即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同日，《人民日報》轉載（楊西光事先與《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商定）。

這篇文章的發表，竟然引起一場大討論，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這可說是一種偶然性。當然，偶然性後面總隱藏着必然性：兩條思想路線的分歧既然存在，爭論或遲或早要發生，不

是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就是發生在那個問題上。這場爭論由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說，首先對文章提出指責的吳冷西（「毛辦」成員）有功勞，如果沒有吳冷西的指責，正像當時于光遠同志告訴我的：他看這篇文章只把它當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瀏覽一下就放下了。吳冷西同志並不像于光遠那樣瀏覽一下就放下，我想這也不奇怪，因爲他是「毛辦」成員，與提出「兩個凡是」有關，因此他對這個問題有高度的敏感。

吳冷西當天晚上（五月十二晚十一點）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吳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嚴厲的指責。指責的具體措辭究竟如何，胡績偉和吳冷西兩人說法不一，但這一點並不重要。根據胡績偉當時的電話記錄稿，吳冷西說了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錯誤」、「政治上問題很大，很壞很壞」、「哲學上否認相對眞理」等話；而根據吳後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聲明，胡的記錄稿有些地方與他的原意有出入。吳說，他只說過這篇文章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否認眞理的相對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說過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砍旗還是舉旗，會在國內外引起很壞的反應；並說文章是批判教條主義而不是批判修正主義（即他認爲當時仍應當批判修正主義，而不應當批判教條主義——作者註）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問題並不限於吳冷西和胡績偉個人之間。看來，吳是代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導機構說話。因爲緊接着，當時主管中央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汪東興於六月十五日召開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專門批評實踐標準這篇文章（還批評《人民日報》發表的另一篇談按勞分配問題的

文章，這篇文章由鄧小平主管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撰寫），並提出防範措置。汪東興批評這個時期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特約，是誰嘛？不知道。這些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問題。」因爲《人民日報》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所以他特別對《人民日報》施加壓力，說《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我想這大概是後來胡績偉提出黨性和人民性關係的原因吧），「沒有把好關」，甚至責備《人民日報》說：你們刊載鄧副主席的講話用了「精闢地闡述毛澤東思想」這樣的標題，而對華主席講話卻沒有用這樣的標題，難道華主席講話不是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嗎？如此等等。當時新華社社長曾濤亦因積極向全國傳播這篇文章而受到汪東興和《紅旗》總編輯的指責。

這裏要說明一下汪東興所提出的所謂「標題」問題。原來，六月二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有一篇重要講話，這篇講話着重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根本方法，目前存在着的主要危險傾向是有些同志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我黨一貫堅持的這個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這篇講話《人民日報》以「精闢地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醒目標題刊登了。這件事竟也引起了汪東興的不快。

對於實踐標準這篇文章，當時華國鋒也親自向胡耀邦點了楊西光、胡績偉和我的名。

還有這時已出任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同志，在社會科學院禮堂召開的一次大會上，也提出了指責，說如果認爲中央領導在眞理標準問題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黨中央。記得當時鄧力群同志也在場，但聽後也對我說：這話有些過頭了。這裏

要提一下，當華國鋒，汪東興下台後，胡喬木卻又一反以前立場向《光明日報》社提出要獎勵《光明日報》發表的那篇文章。胡喬木此舉除了想重新表示一下自己對此事的態度外，還意在抹煞中央黨校在這個問題上所做的工作。

顯而易見，矛頭已不僅是針對一篇文章了。形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儘管當時尚限於上層內部）。有一點很清楚，思想路線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線的分歧。怎麼辦？在這種高壓之下要不要作出正面回答？隨高壓而來是一片鴉雀無聲，有人已經開始作檢查。形勢確實是嚴峻的，我感到周圍空氣沉重。如果對於當時的嚴重指責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們已屈服，無理可說，而這樣一來，眞理標準討論將夭折，我們將承擔嚴重罪名，「兩個凡是」的勢力將更爲猖獗，我們的處境將更加困難。但如果提出反駁，倘局勢依舊，其後果也難以設想。

我對此考慮再三，最後還是決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據理駁斥，那就是六月二十四日（離宣傳系統會議不到十天）發表在《解放軍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見本書附錄二）。考慮到胡耀邦當時的爲難處境，起草這篇文章我沒有事先向他報告，但將所寫的第一次稿送給他，他叫秘書給我打電話，只交代一句：「等三個月以後再說」。我理解胡採取的愼重態度，但我覺得已經不能再等待了。爲了不再給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添上麻煩，至少在形式上擺脫胡耀邦與這篇文章的干係，最後的定稿就未送胡過目，如何處理亦未向胡請示。當時幫助撰寫這篇文章的只有孫長江一人，《理論動態》組的任何人都未曾參與。

文章爲甚麼拿到《解放軍報》去發表呢？這是因爲當時《理論動態》已不可能刊登這篇文章了；宣傳系統下達禁令

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也都不可能刊登此文。那時軍隊剛召開過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解放軍報》刊登了鄧小平在會上的重要講話，而這個講話正是同「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我於是想起求助於《解放軍報》。我認識《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姚遠方，我備了一封信，將文章送給他，也是抱試一試的態度。不想《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和副總編輯姚遠方表示完全贊成這篇文章的觀點，答應刊登。我提議不用我個人名義而用「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以加重文章的份量，他們也同意了，這是《解放軍報》第一次以這種形式刊登文章。文章發表的當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以顯著地位轉載。新華社當天轉發，因此各省市地方報紙也陸續轉載。

這裏特別要提一下的是，當我接到第一次發稿清樣時，我突然想起，建議將文章送請當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過目（羅瑞卿將軍我在五十年代華北局的會議上見過他）。我此舉自然是想尋求支持，至少是作一點試探，但我沒有想到羅瑞卿同志竟如此認眞，他不僅表示支持，並通過編輯部口頭向我建議作兩處重要增補：一是多介紹《實踐論》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辦了。（後來有人傳說，大概首先是胡績偉吧，說羅瑞卿親自修改了這篇文章。這是不確的，那時鬥爭形勢不明朗，羅不會輕易留下自己的文字痕跡。事後有人專爲此查閱檔案，證實羅並未留一個字在上頭）。但下面的事實是確鑿的，即羅曾爲這篇文章直接同胡耀邦通過幾次電話，表示對這場鬥爭的支持。文章發表後不久，羅出國治病，臨行時還留下一句話，說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話，他願意領受四十大板。這位文武兼

備的將軍（他是解放軍十員大將之一）在這場結局尚未明朗的鬥爭中所給予我們的支持，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不幸，不久他竟因病永遠離開了我們。

文章發表後，有兩件事我認爲需要記錄在案：一是，文章發表的當天，胡喬木匆匆忙忙趕到胡耀邦家裏，說這篇文章是表示我們主動發起攻擊，把事態搞嚴重了，把內部爭論公開化了，他對此表示遺憾。這件事並非我親見，是《理論動態》組的一位姓沈的同志告訴我的，他是直接聽胡耀邦說的。另一件，是胡績偉有一次到醫院去看望指責他的吳冷西同志，吳對他說：我看了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更認爲我那天晚上在電話上向你提出的意見是對的。這是胡績偉事後向我提起的。

如果說，第一篇文章還只是在中央內部不大範圍內引起爭執，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報和幾乎所有各省市報紙刊載後，誠如胡喬木所說，是把這場內部爭論公開化了，爭論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開了。

一九七八年七、八、九、十這四個月當中，大多數地方，包括軍隊，都對這場爭論或先或後地作出了反應，公開表明了態度。這樣的事在黨的歷史上是少見的。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據我推測，大概是因爲人們把這篇文章同鄧小平六月二日在中央軍委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直接聯繫起來的緣故。通常在這樣的時刻，政治人物的頭腦往往是很敏感的。

不久以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眞理標準討論的評價，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裏就不多說了。

眞理標準的討論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到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討論作出了肯定的

評價；第二階段是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三階段是一九七九年七月開始的眞理標準討論補課。後兩個階段的情況留待後面再說。總而言之，爭論並未因兩篇文章的發表而停止，相反，眞正的爭論還在其後呢！

六　胡耀邦闡釋三中全會公報和胡喬木重新恢復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距「十一大」只有一年零四個月，在此期間，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全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費時三十六天，全會只開了五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佈了全會公報。這次全會正像後來所說的，成了我黨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來說是劃時代的，正好像遵義會議對於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說是劃時代的一樣。其中最具歷史意義的是，全會重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廢止「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會議結束後的第六天，胡耀邦前來中央黨校辦理張平化和馬文瑞的工作交接事宜。全會後的政治局會議決定：黨校副校長馬文瑞調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現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業委員會主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不到一年又離開了）。政治局同時決定：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黨校職務不變，中央組織部長改由宋任窮擔任。黨校的學員聽說胡耀邦來到黨校，要求他談一談三中全會的精神。胡沒有準備，又難以推卻，就在大會上即席作了發言。

我保存了一份經胡本人審閱過印發給學員的講話記錄稿，現在這些已經成爲歷史了。這個講話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和個人風格。胡耀邦已經亡故，至今仍沒有他的文集出版。我覺得有必要將這個講話的若干段落摘抄於下：

「會議的發言簡報估計有一百五十多萬字，相當於兩部《紅樓夢》，近三部《三國演義》。總起來說，是五大問題，（一）轉變有偉大的意義，偉大的前途；（二）轉變以後，我們要老老實實抓經濟，把生產搞上去；（三）要轉變得好，就要我們把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搞好，做到是非、功過、賞罰分明；（四）還要把我們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搞好；（五）把我們黨的風氣搞好，黨的生活搞好。

「全會主要精神在哪裏呢？公報上面基本上把它概括報道了。我只向大家闡述一下公報的內容。公報的中心思想是甚麼？中心思想就是一個，就是從明年起，一定要把我們工作的着重點（或者叫重心，或者叫中心）轉移到搞四個現代化上。再說一遍，從此以後，只要沒有外敵侵略，我們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起來搞四個現代化，不搞別的。千萬不要用主要的精力今天搞這個，明天搞那個了。這個根本思想，就是會議的中心思想。

「我們適應不適應呢？我覺得我們許多同志不適應。我們有許多同志的腦子不是這麼想的，老是想搞運動，老是想搞甚麼批評人。如何搞現代化，我們懂？我們知識多？我覺得我們在座的同志，台下的，台上的，還加上樓上的，我看我們大家都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知識不多，經驗不多。思想上的習慣勢力厲害得很。習慣

勢力就好像抽煙，講話開會兩隻手總往口袋裏抓。腦子裏面有個習慣勢力作怪，新的事物它裝不進去，老是想從別的地方——從政治上幹一下，一幹，把事情就搞壞了。所以，這次黨中央明確提出來，這是根本的歷史轉折，這是個偉大的轉變。公報分析了我們要轉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上來的歷史經過和現在的條件，指出我們把「四人幫」粉碎了，最大的障礙掃除了。也談了我們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深遠意義和偉大意義。同時，也談了我們還有困難，不單還有遺留問題，我們的思想也不適應，因此我們要重新學習。我們的《理論動態》寫了《偉大轉變和重新學習》一文，指出從歷史上講，我們有兩個重新學習。進城的時候，一九四九年毛主席指出重新學習，這是第一次。現在要來個第二次重新學習。這篇文章還提到了一個古代故事，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濫竽充數」，不會吹，但是人很多，他可以混到裏面不吹。好像我們唱國際歌、東方紅，有的人忘了歌詞，不唱，唱不出來，就跟着大家啊、啊、啊，這叫「充數」。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同志們，如果再搞南郭先生那個「濫竽充數」，那就不行了。也許有人說，我以後還慢慢幹，為甚麼？我害怕將來還會有甚麼運動。我告訴同志們，中央不再搞甚麼運動了，這個決心下定了。我們吃了二十幾年的苦頭，你們回去以後也不許再搞甚麼「土政策」：不搞四個現代化，去搞甚麼政治運動。同志們，我們確實太落後了。我們的祖國偉大是偉大，但是很落後也確是事實。我看是落後的偉大，偉大的落後。列寧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引過俄國詩人

涅克拉索夫的如下著名詩句：「俄羅斯母親啊，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我們現在也是這樣，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悲觀失望。

「為了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安定團結。沒有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我們搞四個現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團結，必須分清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的功過是非，做到功過分明，是非分明，賞罰分明，叫「三分明」。這次中央會議解決了一大批遺留問題，共有十幾個。比如解決了彭老總問題，陶鑄同志問題。我們不搞甚麼繁瑣哲學。開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向我建議，說你那個組織部，彭老總要平反，開一個追悼會吧。我說，好，請你們寫一個悼詞。他們願意寫，七八天把悼詞寫出來了。寫的當中，不敢提高，改來改去評價都比較低。怎麼辦？後來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寫上彭老總是紅三軍團的創立者。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裏，小平同志說，思想還要解放。他說我來改，作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這樣公正的評價。由於大家敢講真話，講了許多問題。但不是所有問題這次都解決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後天中央用飛機把他接回來。陸定一同志的問題怎麼解決，沒有宣佈，他吃了很大的苦頭。彭羅陸楊只平反了百分之五十。還有同志問，還有劉少奇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有沒有？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可能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

「公報還講了民主和法制。前天黃火青同志說，現在正在開全國高檢會議，一定要請我去講一講。我說，

我去講不犯法嗎？他說，你去講一講，這是同志之間友好的支持嘛。我講了三個問題，我把第二個問題簡單說一說。我說，我們公報上寫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你們就是幹這麼四件事。可是你們會反過來問：現在我們有甚麼法？無法可依嘛。違法必究，是你違法還是我違法喲？是你究我還是我究你喲？現在的問題是，你們的工作困難重重怎麼辦？按甚麼辦事？第一按上級指示辦事，現在上級不會有很多指示。比如男女青年要滿二十五歲才能結婚，誰敢發這個指示？原來婚姻法規定男的二十歲，女的十八歲可以結婚，你要改變婚姻法的規定，誰敢作個人指示？第二靠過去的法律條文辦事。解放以來，我們有多少法？有些法對不對？第三靠先進單位的經驗辦事。政法先進單位究竟是哪個，我不清楚？先進單位先進經驗也得要分析。那麼，靠甚麼辦事？我們還是要老老實實，靠法制辦事，靠實事求是辦事。法律不光是寫好多文章、條文，在我看起來，高檢當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平反冤錯案。冤錯案不光幹部裏面有，監獄裏面也有。青海有五萬個勞改犯（連家屬一起），有的早就釋放出來了，可是現在同樣沒有公民權。人家現在提出問題來了，說我刑期早就已經滿了，怎麼還不給公民權。問題一大堆，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把法制搞好。

「公報第四部分講的是我們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問題。你要搞四個現代化，矛盾一大堆，問題一大堆，新問題很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都要靠上級指示才能辦事，解決問題，上級哪裏管得了那麼多。同志

們，要靠我們自己開動腦筋。開動腦筋首先碰到一個問題，敢不敢解放思想？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七千多字，講了一個主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四句話是一個問題。他在整個會議上就講這麼一個問題。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完全解決，我們現在黨內敢於講話的只是少數人，不敢講話的是多數人。在工作會議期間有同志講，我們黨裏面有的同志敢放炮，是高級炮手。但是，敢講真話，敢批評自我批評，真正敢講話的還只是少數。小平同志說我們有許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或者半僵化。然後他就分析我們黨裏面有許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的原因，這是在一定歷史條件底下形成起來的。小平同志分析了四條原因。第一條是，十幾年來林彪、「四人幫」搞了許多禁區，到處下禁令，製造了迷信，這個流毒很深，影響很大。第二個原因，我們黨裏面民主集中制遭受了破壞。簡單地說，就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許多重大問題一兩個人說了算。第三是功過是非不清，賞罰不明。第四是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容易滿足，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願意接受新鮮事物。所以，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不完全是「四人幫」的流毒，四個方面的原因都有。從這個問題，就講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討論所起的良好作用了。一切都要按照實踐來檢驗，檢驗錯了，糾正過來，對的肯定下來。可是現在許多同志，包括一些地縣級的幹部，哲學知識太少。他們說，這麼講，實踐檢驗真理，行嗎？他根據他的實踐說他是

真理，那不張三有張三的真理，李四有李四的真理了嗎？人家這裏講的實踐是千百萬人的實踐，不是哪個人的。多少年來我們很多同志不讀書。無論如何拜托你們各位，你們自己回去注意看一看，你們那裏有多少同志不讀書，不看報，連文件都不看。

「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問題，我們的組織問題。我們要把組織工作搞好，組織路線搞好。我們補了一些人，增加了三個政治局委員（鄧穎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一位副主席（陳雲），增加了九位中央委員。這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措施。這次補選，將來開十二大的時候追認，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這次中央選舉產生了以陳雲同志為首的由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我順便講一下，我們紀律檢查委員會搞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搞了一個黨內政治生活十二條基本準則。說的是共產黨裏面按甚麼辦事。文件經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以後提交中央，由中央頒佈。

「要把我們黨內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評自我批評。黨的會議上對誰有意見都可以講，至於處理那就不能隨便，要慎重。但請同志們注意一條，批評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賬，主要是着眼於現在。在我看起來，我們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或者說對於撥亂反正不認真，不堅決，或者說有錯誤。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以來，要撥亂反正，扭轉乾坤。那麼，我們的乾坤扭轉了沒有？

我個人的看法，沒有完全扭轉，乾坤初轉，或者是乾坤始轉，開始轉了。我們還沒有完全扭轉，所以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還有危險性。

「我們黨的生活還有一條很重要，你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也可能意識到了。我們黨內不能製造迷信，不能搞特權，不要多宣傳個人。這一條非常重要。不要突出宣傳個人，就是不要製造迷信，我們吃了製造迷信的虧。我們尊重領袖，尊重我們的導師，是非常正確的，可是不要迷信。我們多少年來習以為常，甚至我們現在的宣傳中還在搞那個突出宣傳個人，實際上搞了一些迷信的東西。這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東西。我們黨內，縣委製造縣委書記的迷信，說我這裏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艱苦奮鬥幾十年，英明哪，正確哪，偉大呀。同志，這麼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來我們的宣傳工作、文藝工作都有教訓哪！不是說這幾年文藝方面沒有創作，也創作了一些好的東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製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不要以為這一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恰恰相反，這個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馬克思主義是實事求是，我們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中國人喜歡好面子。中國人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不同，明明兩個人關係不好，還說我們兩個人是好朋友。搞這個。德國人就對我們有這樣的批評，說你們中國人太講客氣，我們德國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們黨的生活的這一條原則你們千萬要注意。上級來了，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請你吃飯，吃的不好怎麼辦，他

回去以後會怎麼的。有人說「帽子」沒有了，還有「小鞋」，給你穿「小鞋」怎麼辦？穿就穿，穿不進去甩掉它，你怕甚麼！我們要把我們的黨風搞好，把我們的社會風氣搞好，把我們的幹部作風搞好。」

摘錄就到這裏，已經不算短了。為甚麼要做這樣的摘錄呢？我已經說過，現在書店裏這個人那個人的文集擺得很多，能夠賣出去的我看並不多。但是至今不見胡耀邦的文集問世。不但如此，原來收集在一些文獻中的胡耀邦的主要講話、文章多數也被拿掉了。為甚麼？甚麼人有權利篡改歷史？一屆總書記，許多講話是代表黨中央的，這就是黨的歷史。有些共產黨人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歷史，任意編排黨的歷史，這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我以為必須徹底拋棄斯大林時代那種對待黨的歷史的作法。說得客氣一點，這完全是非歷史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有落井下石的市井心態，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許多問題。我在這裏要特別提到一件事，這件事對於以後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同志重新恢復了中央的工作，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胡耀邦在「講話」中對這件事是這樣說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同志提議我不再兼組織部長，改作中央秘書長和中央宣傳部長。本來有的同志提議喬木同志當宣傳部長，他是最合適了。為甚麼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過考慮，喬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較高，宣傳部的工作還有許多行政事務，如果要他來管宣傳部，勢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這就是浪費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長。我做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本不夠格，是趕着毛驢當馬騎，勉為其難。喬木同志當中央副秘書長兼

『毛辦』主任，汪東興同志不再兼『毛辦』主任了。」

「文革」後，胡喬木從此又正式登場。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在思想路線上又出現了新的複雜情況。爲了說明這一點並介紹胡喬木同志其人，讓我暫且將話題先拉開一點。

稍許公正一點的歷史學家都承認，中國共產黨是當代擁有大量才俊之士的政黨，英雄豪傑雲集，人才濟濟，爲其他各黨所難能，古來所未有。文有大思想家，大理論家，武有儒將。還有大批學問家、文學之士，其中，尤以史學人材最爲突出。在爲學者當中，同樣因爲受「左」的時勢的影響，有時涉及政治或政治人物時，也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小疵不掩大節，歷史會對他們作出公正的評價的。在追隨中國共產黨的學問家中，以個人品格論，像培根這樣的人物在中國一個也沒有出現過；以政治品質論，亦未曾出現過「中國的海德格爾」。然而即使像培根和海德格爾這樣的人，其爲學的功績也是不可以抹煞的，培根曾被馬克思譽爲「英國唯物主義的始祖」。我們最終應當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論學評文，摒棄一切黨派成見。即使像馮友蘭先生這樣的人吧，其爲人主要爲「國師」的奢望所累，無論在國民黨治下還是在共產黨治下都是如此，但即令如此，馮友蘭仍不失爲中國哲學界一位揚名的人物。

這裏說到毛澤東和他的文字助手胡喬木。毛澤東作爲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是現時代一位非常的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政治、軍事固無論矣，思想上、理論上亦獨步一時。毛澤東理論的完成，主要是在一九四一年黨的整風運動以前，那時，他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提出抗日戰爭的理論與策略，批判以王明爲代表的共產國際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表現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提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問題，以及

後來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再後來撰寫《論聯合政府》，將新民主主義論具體化。這些都是大理論、奇理論、眞理論，充分表現馬克思主義者的膽識。一九四一年以後是他的理論一步一步地付諸實現並且獲得輝煌勝利的時期。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先期理論的完成和實現不是促使他向理論的高峰攀登，反而使他的理論陷於停滯，並在建國以後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種空想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眞理越來越遠。可以說，五十年代（或五十年代中期）是一個分界線，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無所作爲，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一步一步走下坡路，專制放縱，不受約束，前後判若兩人。他逐漸地離開了他原來堅持過的正確理論，或者說他自認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在他手裏一勞永逸地完成了，絕對眞理在握，他不再注重理論了，而只滿足於對現實政治問題發表尖銳潑辣的評論。

胡喬木恰於一九四一年二月間來到毛澤東身邊，一直工作了二十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發生才結束。胡喬木毫無疑義也是共產黨內一位難得的文才。按他本人的學養，如果讓他自由發展的話，可能成爲一個名學者，或者成爲別林斯基式的文學評論家，甚至可能成爲戴望舒式的名詩人，據說，他能一口氣背誦戴望舒的好幾首詩。論文史才學，胡喬木不及其清華校友錢鍾書，但胡早年投入社會鬥爭，兩人的氣質不同。胡喬木到了毛澤東的身邊，更需要適應毛澤東的需要，重新塑造自己。毛澤東用陳伯達，是需要陳伯達來闡述和發揮他的理論；用胡喬木，則是需要胡喬木在撰寫政論（包括起草黨的文件、寫重要的社論、新聞等）方面成爲他的得心應手的助手。事情也正是這樣：胡喬木撰寫政論，其才思之敏捷、文筆之潑

辣，勝過陳伯達。胡喬木可說是毛澤東的貼心政論秘書。環境造就人，胡喬木也不例外。「文革」期間，毛澤東曾親自到胡宅去看望胡喬木，雖然因走錯了門沒有見面，但這個消息一傳出，造反派、紅衛兵就不敢再去揪鬥胡喬木，這很明顯地是毛澤東對於自己這位貼心秘書的一種保護措施，胡喬木因此得以安然度過這個混亂黑暗時期。他雖處逆境，比較之下，還是一個幸運兒。從以往的表現看，胡喬木是一個多方面的人，一個複雜的人，有時他居高臨下，說話讓人覺得如同晴天霹靂；有時又能與人平坐談心，談話中引大段普希金或托爾斯泰的話；有時「左」得出奇，出手傷人，有時又表現出一點人情味，能賜人以某種溫暖（特別對黨外文化人），例如他力主將吳祖光驅逐出黨，而又自己親身登門將勸退書送到吳祖光的面前，以示尊重，如些等等。鄧小平評論胡喬木：「這個人既固執，又軟弱。」可謂中肯之論。胡喬木在思想界特別在新聞界是「老領導」，他的復出無疑對思想界有很大的影響。

我第一次在理論上同胡喬木接觸是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就是我撰寫哲學講稿的時候，我想起來向他請教。我先將《哲學上兩條戰線的鬥爭》講稿草稿寄給他，然後登門拜訪。他肯定了這篇講稿，講了一些好意見（但他也沒有看出稿中批評楊獻珍這個問題），還提供給我一些材料，比如講稿中所寫的這樣一個可笑的事實：起初動員解放軍一個師去開發大慶油田，但後來在「文革」中他們卻被另一部解放軍批評為「恢復資本主義的勢力」——這個事例就是胡喬木提供的。

我當然知道胡喬木在「批鄧」中的表現，他揭發鄧小平的材料我也看過。聽說鄧小平原諒了他，說：「揭發材料基本屬實，只是說我拍了桌子那不是事實。胡喬木有其固執的一面，

也有其軟弱的一面。但他還是我們黨的一支筆桿子。」鄧小平這幾句話就將胡喬木「解脫」了。「十一大」以後胡喬木已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在這次跟我幾小時的談話中，他說話語氣始終平靜、緩慢，透露出思想的火花，並且令人感到其思想有相當的深度，他的廣博知識在言談中也令人感覺到。當時他給我的印象不錯，覺得他確是一位思想家，名不虛傳。

但是不久我又碰到一件事，那是在三中全會前。有一期《理論動態》發表了文藝評論工作者劉夢溪寫的一篇文章，是關於評價普列漢諾夫的問題，文章批評過去有人對普列漢諾夫否定過多。這是一篇純學術探討性的文章。關於普列漢諾夫，六十年代我也寫過一篇題爲《反對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怎樣墮落成修正主義者？》的文章，發表在《紅旗》上，後來也收進我的一個集子裏。雖然如此，我對劉文並沒有感到甚麼，認爲可成一家之言，所以把它發表了。沒有想到文章發表後很快接到胡喬木寄來的一封信並附來一篇文章要求刊登。從信上看，他對劉文不滿，而且好像認爲劉文是針對他而發。我有些奇怪。後來輾轉弄清，原來「文革」中胡喬木曾致信陳伯達，談他對普列漢諾夫的看法，這信後來我們也輾轉找到了。這件事又使我感到：胡喬木這個人至少有些心胸狹窄，容不得不同意見，對人對事容易耿耿於懷。

但是當時我也只是想，這大概是由於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因此很自然地養成一種基於優越感的獨斷性和自尊心，當他覺得別人同他唱不同調子或違逆他的意見時，馬上會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因此會有一種特殊的反應表現出來。我後來之所以盡可能與胡喬木保持距離，甚而避不參加他主持起草的某些文件（包括《歷史決議》），原因就在這裏。

上面是我同胡喬木初步接觸所獲得的印象。但我在這裏要說的是胡喬木在三中全會時，在爲鄧小平起草講話稿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政治態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胡耀邦找馮文彬、阮銘和我到他家中，說鄧小平和葉劍英準備在三中全會上講話，鄧的講話由胡喬木起草，着重講黨的工作中心轉移；葉的講話由我和阮銘起草，着重講分清是非問題。都要在三天之內寫出初稿。葉的講話我請阮銘起草，我作些修改後按期上繳。此後我就沒有再參加會議的任何文字工作了。過了幾天，聽說葉的講稿基本通過，喬木爲鄧起草的講稿卻被否定了，並且意外地獲得了一個「看來他不行了」的評語，講稿改由別人另擬。我很奇怪，胡喬木究竟出了甚麼事？

一位同志將當時胡喬木起草的講稿複印件轉給了我。這個稿子是胡喬木向他的秘書口授，秘書記錄，然後喬木親筆修改而成的。我將稿子仔細讀了兩遍，也覺得有些奇怪，此時的胡喬木居然還肯定「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說「這一點無論如何不應忘記」；還說工作着重點的轉移有利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樣，他雖然講了工作重點必須轉移的話，但按他所說的「轉移」就仍然是在華國鋒五月一日文章所解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軌道上轉移！「黨內走資派」這一概念除熊復主筆的《紅旗》雜誌有時還沿用外，全國報刊早已不再用了，如今又竟出現在胡喬木的筆下！同時，這篇稿子避而不談爲保證工作重點轉移在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問題，以及批判當時仍嚴重存在的極左思潮問題。我當時因爲想把問題再弄清楚一些，所以將這個「講稿複印件」留下了。現在翻出來重讀

一遍，更加覺得胡喬木的思想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受其晚年錯誤思想的影響是不小的，而且這種影響還有相當的固執性。可以這樣說，胡喬木這個人，當他失勢或受壓的時候，其軟弱性的一面容易暴露出來；而當他權力在握的時候，其固執性一面或者說他的權威心理和自尊心就容易表現出來。不管怎麼樣，領導人總要依靠幾支筆桿子，只要能夠寫出使自己滿意的文字，就會盡可能競相爭取「筆桿子」爲己所用，爲此甚至不惜加以不切實際的表揚，如說甚麼「第一個歷史決議是胡喬木所寫」之類（其實，負責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的主要是任弼時，文字經過許多人之手，張聞天出了大力，毛澤東親自修改了多少遍，胡喬木也在毛澤東指導下參與了文字加工）。各方面領導人對胡的重視使用，可能是增加他的優越感和權威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中全會重新恢復胡喬木的工作後，有一個時期胡仍同華國鋒一起唱反右的調子，行動上搖擺不定。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改變了中央領導班子，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改任中央副主席，胡耀邦爲黨中央主席，鄧小平爲軍委主席。這時，胡喬木的態度才有所轉變，但是他的思想仍在反右和反「左」之間徘徊不定。綜觀胡喬木重新工作的全過程，可以說「左」的東西仍在他的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特別當鄧力群成爲他的副手之後（鄧的崛起是黨內在改革問題上出現兩股勢力的產物，倒不是胡喬木有意的選擇）。這是三中全會後很長一個時期內意識形態領域風波疊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七　理論工作務虛會追述(上)

十一屆三中全會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結束，理論工作務虛會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召開。

爲甚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原因很簡單：兩條思想路線的鬥爭異常激烈。堅決捍衛「兩個凡是」的，可拿《紅旗》雜誌做代表。《紅旗》以不介入爭論爲名，堅持「兩個凡是」的立場。《紅旗》在長期沉默以後，突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寫了一篇長文《重溫〈實踐論〉》上送中央。這篇文章正像會議上有人所說的，它雖然也講實踐第一、實事求是的觀點，但整篇文章是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它不是反對教條主義，而是大批甚麼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稱之爲「海外奇談」。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顯然的：反擊對「兩個凡是」的批判。中央沒有同意發表此文。十一月，爲紀念毛澤東誕生八十五周年，譚震林同志寫了一篇肯定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井崗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紅旗》雜誌拒絕刊登，要求作者刪去文章中支持實踐標準的內容，譚堅決不同意，後經中央領導人出面干預，文章始得發表。接着在十一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就這個問題展開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也是由反對實踐標準那幾位同志挑起，他們仍然以「維護毛澤東」的名義來維護「兩個凡是」的觀點，即維護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包括「文革」在內。他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和三中全會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見這場鬥爭是很激烈的，不可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問題。

這是中央決定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議開這樣一個會的是葉劍英同志，華國鋒也表示贊同。所以，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眞理標準討論的第二階段。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七十年代末中國理論界的一件大事。像這樣的以眞理標準爲引言和主題的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或者像有人所說的是一個「創舉」。會議的內容已經是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地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各個方面。儘管限於當時的條件，會議在檢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運用方面，在怎樣於中國條件下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以及在批判「文革」、指出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批判長期存在的「左」傾危害方面，都還只能說是開了一個頭，但會議確實具有多方面的意義：無論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發展的途徑，總結過去思想理論工作的經驗教訓，對於反對爲害極其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並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澤東所應負的責任，以及批評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它開始引導人們進入了思考，或者說，開始重新認識我們已走過的道路。這個會議毫無疑義將載入史冊。

這次會議原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一百六十多人參加，各省市派來一位聯絡員，從一月十八日開到二月中旬。第二階段，以中央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派人參加，擴大到四百至五百人，開十天左右。預定第一階段以小組會爲主，第二階段以大會爲主。會議第一階段按計劃進行；第二階段因情況發生了變化，雖然人數到齊，但沒有開大會。中央理論宣傳單位按原小組繼續討論，各省市則以省市爲單位進行討

論。三月三十日聽取鄧小平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然後進行討論，提意見。本來準備舉行大會發言，未果。會議於四月初宣告結束，前後共歷時三個多月，中間雖有幾天間歇（春節休假五天和兩個階段之間的間隔時間），也要算是一個長會了。

胡耀邦開會當天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這個引言講了會議的由來、目的和開會方法，對兩年來思想理論戰線形勢的估計，以及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和理論宣傳工作的任務這樣三個問題。

胡耀邦首先宣佈會議領導小組的名單。領導小組由胡耀邦、胡喬木、黃鎮、朱穆之、胡績偉、于光遠、周揚、童大林、吳冷西、吳江、胡繩等十一人組成。領導小組名單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觀點的人，確實體現了民主討論精神。同時宣佈五個小組召集人的名單。第一組（三十三人）召集人：胡績偉（《人民日報》）、張光年（作家協會）、黎澍（社會科學院）；第二組（三十四人）召集人：童大林（科委）、林澗青（國務院研究室）、賀敬之（文化部）；第三組（三十三人）召集人：周揚（社會科學院）、王惠德（中央編譯局）、邢賁思（社會科學院）；第四組（三十三人）召集人：于光遠（國務院研究室）、華楠（《解放軍報》）、王若水（《人民日報》）；第五組（三十三人）召集人：吳江（中共中央黨校）、楊西光（《光明日報》）、阮銘（中央黨校）。各組召集人也就是後來各組的正副組長。此外，特邀出席者二十人，都是老同志，為照顧他們的身體和工作，他們可自由參加，文件、簡報照發。

追述這次會議，自然首先要提到胡耀邦的會議《引言》，

這是一篇重要的講話，雖然在今天看來仍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想，這裏也有必要像前面所做的那樣摘錄講話的重要段落，一則用以介紹這次會議的來由，目的及當時理論思想戰線的形勢；再則，用以紀念這位已故的好學深思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知識界所信任和喜愛的善良友人。

會議《引言》第一部分講述這次會議的由來、目的和開會方法。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的思想理論戰線面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同組織上的清查同時進行。兩年多來，經過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個工作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提出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就是為了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假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但是由於種種不同的情況和原因，在我們黨內，特別在思想理論戰線，對黨中央提出的這個重大理論原則問題認識上參差不齊。有些同志雖然贊成中央關於『完整、準備』的提法，但認識並不深刻，甚至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觀點。

「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開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是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基礎上來，重申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的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中實踐第一的觀點，重申只有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常識，但多年來被遺忘了，甚至被顛倒了。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

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系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這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場風波。有些同志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以及參加討論的其他文章和發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說那是『丟刀子』（指否定毛澤東），是『非毛化』，是『砍旗』（指砍掉『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

「去年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批評了那股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潮，使這場討論提高到新的水平。許多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領導同志和理論工作者都積極地參加了這場討論。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對此十分關心。這一場討論，已經對我們的實際工作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去年九月，紅旗雜誌社寫出了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長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葉劍英同志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最近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對這場理論討論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為召開理論務虛會創造了有利條件。華國鋒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指出：「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多，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的時間來解決。中央政

治局同志意見，還是按照葉帥的提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引者按：這篇講話通篇未提「兩個凡是」，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這表現胡耀邦所特有的寬容精神，同時也可能是爲會議的討論留下較大的空間。）

會議《引言》這樣談這次會議的目的：

「我們召開這樣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要達到甚麼目的呢？第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總結經驗，可以總結兩年，也可以總結十來年、三十年。建國三十年來，理論宣傳戰線有許多好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繫的。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我們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引言》的第二部分講兩年來思想理論戰線的形勢：

「兩年來，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不但在政治上、組織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同樣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思想界、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和科學界，對林彪、『四人幫』的大量反馬克思主義謬論，如『天才論』、『一切從本本出發論』、『批判唯生產力論』、『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論』、『全面專政論』、『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論』、『社會主義時期只能

反右不能反左論』、『儒法鬥爭論』、『黑線專政論』、『三突出論』、『反對科學是生產力論』，等等，進行了深入的批判，衝破了他們設置的各種禁區。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模來說，就它的戰鬥作用來說，就它對全黨理論水平的提高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以後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這兩年理論工作為甚麼取得這樣偉大的進步，根本原因是鬥爭的需要，人民群衆實踐的需要。人民對於理論工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心。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於民主和法制、關於按勞分配這三個問題的討論，吸引了廣大人民群衆特別是青年參加。理論工作像今天這樣成為真正群衆性的活動，是歷史上少有的。這樣有理論興趣的民族，是一種可貴的民族精神。

「我們的理論宣傳隊伍，在這兩年中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支隊伍在戰鬥中前進，進步是很大的。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衆、善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並不平靜，有過那麼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他們敢於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幹敢闖。這種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可貴的。這一批優秀闖將的出現，增強了我們馬

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力量，是一個了不起的收穫。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要總結這兩年理論宣傳工作的偉大進步和理論宣傳隊伍成長的經驗。同時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們理論宣傳戰線上還存在的嚴重缺點和問題。當前理論宣傳戰線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有相當數量的同志思想上還處於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少數同志甚至掉隊了，離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設禁區，下禁令，成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們應當研究一下產生這種現象的癥結在哪裏？

「意識形態戰線是容易犯錯誤的一條戰線。如果脫離實際，脫離群衆，更容易犯錯誤。我們應當允許在理論問題上犯錯誤。對待犯錯誤的同志要進行幫助，犯錯誤的同志也應總結經驗教訓，有所進步。我們要提倡對理論問題的不同觀點的爭論，提倡對理論文章的批評和反批評，真正發揚民主學風。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容易。特別是理論工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同別的批評，同政治路線的批評，同黨性的批評，有甚麼不同，有沒有它的特點？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意識形態領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如何搞得更有說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許有更多的時間考慮，使理論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錯誤。前些年，我們黨內有那麼幾個理論棍子，或者叫理論惡霸，像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還有康生，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壟斷起來，只許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許別人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他們可以利用特權毫無根據地把人民歡迎的

作品扣上『反黨文章』、『反黨小說』、『黑畫』、『黑戲』的帽子。這種摧殘文化、鉗制思想的惡霸作風必須肅清。」

《引言》第三部分是講理論工作如何適應工作重點轉移之後的形勢。這裏講了以下兩方面的任務：

「一方面是繼續掃清我們前進道路的思想障礙。我們要議一議，在思想理論上還有哪些阻礙我們前進的東西應當繼續破？還有哪些禁區？還有哪些精神枷鎖？包括毛澤東同志在世時來不及闡述清楚，後來又被『四人幫』嚴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論問題，譬如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等問題。康生、張春橋起草的那個九大政治報告，在理論上有許多錯誤，『四人幫』的很多謬論是從那裏來的。這些理論是非不澄清，會使我們的思想受到束縛，成為我們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絆腳石。希望同志們在這次會上議論出一批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有些題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發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理論工作從實際出發又能走到億萬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的前頭，生氣勃勃地指導我們的實際工作飛躍前進。這就是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以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我們要認真地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使理論宣傳工作者從思想上來一個轉變，面向四個現代化的實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解決。這就需要我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認真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真正做到理論同現代化建設的

實踐緊密結合。如果根本不結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在空中，當作神，那就等於打着招牌招搖撞騙，只能叫做假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如果結合得不緊密，只能叫做半馬克思主義，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馬克思主義。」

在講到如何實現這樣的任務時，《引言》說：

「為了把理論工作搞好，請所有報刊、各級宣傳部注意：對於有份量、有影響的重點理論文章，不要匆忙發表，要深思熟慮，研究清楚。例如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我對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完全想清楚。現在總的思想傾向是好的。去年黨內有那麼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辦」；今年社會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現在上訪的問題上。上訪的人多數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這是主流。我們工作沒有做好，使他們吃了苦頭，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但是否也有那麼千分之一、萬分之幾的人，他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有的舉大標語遊行，提出「反飢餓，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國人掛鈎，一談四個小時。對這種情況，怕是不要怕，也不要抓人。但要研究這類個別人是甚麼思想？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個人主義傾向。我們黨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反對民主個人主義。有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以講抽象的『民主』為其主要特徵。當然，不管怎麼，有三條一定要堅持：一是不要隨便抓人；二是不要隨便點名批判；三是不要亂打棍子。在這方面我們是吃過虧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可

以變好。朱自清、聞一多曾經都是民主個人主義者，不是變好了嗎！有些青年思想活躍，敢想問題，但敢想問題不等於就是馬克思主義。要引導他們，要找他們談談，幫助他們。類似這些問題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以上就是會議《引言》的摘要。

這裏我只想提一下，胡耀邦這位當年「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主角，他的會議《引言》轉眼間距今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了。

八　理論工作務虛會追述(中)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進行。這一階段共發出了 264 期「簡報」，主要刊登與會者的發言，或個別發言，或綜合報道。「簡報」散發的範圍相當廣，因而傳閱者很多，會議的影響也大，引起社會各界震動。

其實，平心而論，這次會議無論就其規模來說，就其提出的問題或討論的深度來說，同一九八〇年十月（距務虛會結束僅一年半時間）黨中央召開的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初稿有四千人參加的大會比較起來，是遠遠的不如。例如，四千人大會有人敢於揭露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內幕及其細節，而務虛會則只不過批判了當時《紅旗》雜誌總編輯在中央工作會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已通過要爲彭德懷案件平反之後還撰文反對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這樣的活動。時間僅隔一年多，形勢發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爲到了一九八〇年上半年，已在分淸毛澤東歷史功過的前提下，明確指出了毛澤東晚年犯了一系列「左」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錯誤的集中表現，並得出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而在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時候，形勢顯然還沒有達到這一步，因此人們的思想仍有較大局限性，不可能暢所欲言。但是無可懷疑，理論工作務虛會大膽衝破了一些禁區，它在思想上爲形勢的發展準備了條件，這正是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歷史功績所在。

務虛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兩個凡是」這個問題上分淸是

非。會議基本上弄清了「兩個凡是」的出籠經過及一些人（主要是汪東興和「毛辦」幾位主要成員以及《紅旗》雜誌社的負責人）的部分活動情況，這些前面已經提及。就這次會議說，交代或揭發淸楚一些事實當然是必要的，但理論上的批判則顯得不夠（沒有大會穿插於其間也是一個原因）。現在看來，堅持「兩個凡是」的起因不外兩者：或由於維護既得利益，或由於認識上的差異。後者居多，前者只是少數人。而認識上的差異，大抵又由於有些人不認識我黨長期執行的「左」傾錯誤路線（其思想上的根源則是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對於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傷害及其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的危機的嚴重性，而這主要又是由於不認識或不承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嚴重性所致（附帶說一句，直到今天，還有人將「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胡作非爲與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當活動混淆起來）。

然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在當時，不僅會議參加者未能進行透徹的批判，就是全黨也因時機尙不成熟而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批判，這是務虛會所面臨的客觀局限性。所以，當時會議就這個問題所印發的多是一些揭發性材料，這些材料雖有助於弄淸事實，但批評與自我批評很不足。當事者雖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卻拒不分析自己的錯誤何以發生。因此可以說，會議實質上並沒有在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前進多少。

同時，會議領導方面也有意盡可能避免緊張情況的發生，特別避免發言涉及高層領導人（**按**：有些涉及高層領導人的材料沒有上「簡報」）。

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起大家注意是在另一方面，即在總結以往二、三十年思想理論戰線上的經驗敎訓，以及在一些問題上

提出較為尖銳的意見。這些在目前看來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被一些人認為驚世駭俗，非同小可，甚至被認為是搞「非毛化」。

閱讀大量「簡報」，親身經歷這場討論，留下一些簡單的筆記，今天憑這些簡單的筆記來追憶當年的發言內容，自然只能屬於「舉例說明」性質，但我相信這種回首前塵往事在今天仍然是有意義的。

首先要記下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的幾句開宗明義的話，他說：「現在全黨面臨着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建國快要三十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裏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搞理論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該組組長周揚接着說：「首先有個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結論當然要由中央來做，但在理論上，我們必須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着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如果這個理論站得住，在這方面講『凡是』也許還可以；如果這個理論有問題，那就更不能『凡是』了。過去，我們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現在『凡是』不下去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才能解決。隨着，『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會議的發言已不迴避公開指名道姓地評論毛澤東同志。歷

史學家黎澍這樣談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變化狀況：「毛主席本人思想在變化。他在《論聯合政府》和七屆二中全會上都說過，全國解放以後，要保存資本主義一個階段，並要讓它有所發展。還說過，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馬上建設起社會主義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必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會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國落後需要讓資本主義有一個發展，這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的社會制度一產生他就想超越經濟自然發展階段，這樣也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還說貧窮能更快進入共產主義。」

經濟學家許滌新也說了這樣一段話：「三大改造後，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和黨內許多領導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後認爲在他的堅強的意志之下，中國是可以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於是就來了個『大躍進』，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等等。但是國民經濟卻因此出現了極大的困難。看來，毛主席在『大躍進』失敗之後，就認爲許多老黨員、老幹部，不能適應他的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認爲這些老傢伙是修正主義，因此，反右傾，搞『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是不是可以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下來的結果？既然唯意志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麼還有甚麼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爲了急於消滅三大差別，竟然要知識分子丟掉知識，丟掉科學文化。毛主席在哲學、政治、軍事、詩詞等方面有偉大的成就、功績，就是不懂經濟。」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從國際論戰談到國內的「左」，直接批評《九評》，他是第一個觸動這禁區的人。《九評》是指六十年代中央爲反擊蘇共對中共的攻擊，由特組的「中央反修領導小組」撰寫的九篇論戰文章，在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有相當的影響。中央由鄧小平負責，每篇均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全組七、八個人，正副組長是康生、吳冷西，我也是小組成員之一。《九評》發表以後，國內也就進入了「四淸」和「文化大革命」。《九評》在思想上乃至國際背景上毫無疑義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內，反到自己頭上來了。我對宦鄉的發言自然感興趣，可惜我的筆記很簡單，這裏只能略記其大意。

宦鄉說：「二十年來國內『左』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同一定的國際條件也有關，特別表現在國際共運的論戰中。當然，別人干涉我們的內政，或者企圖損害我們的主權，進行反擊是對的，可是當時的論戰卻大大加強了國內『左』傾思想的發展。尤其是因爲蘇聯批評我們的『大躍進』，我們就更發誓要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並且毫無根據地懷疑有些中央領導人暗中與蘇聯通氣，因此加強了國內反右鬥爭。《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和《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兩評，前一評是根本錯了，斯大林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修正主義的典型，赫魯曉夫把它平反了，並親自登門道歉，而我們卻出來維護斯大林的無理判決，輕點說也是干涉別國內政。現在雖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錯誤觀點及其影響尙待淸理。這篇文章的文風也特別壞，東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斷材料，無限上綱。這篇文章聽說

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評》對國際國內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對國內來說，從《九評》可以看到提出『走資派』的由來和發展，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在批判蘇聯的『獎金掛帥』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中發展我們的『政治掛帥』、忽視經濟規律、忽視發展生產力的，也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從支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迷信而又轉到提倡個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幫』利用這一點大售其奸。而『兩個凡是』實際上就是去鼓勵繼續搞個人迷信。」

會上議論個人迷信的問題不佔第一位，也佔第二位。因爲個人迷信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還繼續搞了一陣。一位與會者舉出一個例子，說粉碎「四人幫」後他在某省見到了這樣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現了遊行隊伍，鑼鼓喧天，十分熱鬧。上街一看，原來是各單位到省委去迎接新發行的華主席畫像，據說，華主席的畫像剛由飛機運到省城，省委領導人已從機場迎回。這種迎請畫像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去時，各單位領導人站在隊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鏡框，回來時把畫像放在鏡框裏面，抱着率隊歸來。一時之間，滿城都是迎請畫像的隊伍。這位同志最後慨嘆道：想不到我們黨竟淪落到這個地步，連某些迷信團體也做不出來的事情我們都公開做出來了！「凡是派」不知道怎樣對待這類事？

會上，對於以往理論工作和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各種不合理不正常現象，批評意見自然不少，特別對理論問題上出現「長官意志」大家很反感。認爲，中央領導人直至黨主席自然有權利對理論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在理論爭論中最好少發表），但是他們只能作爲平等的一員參與討論，他們的見解只能說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法令性或組織上的權威性，別人也是可以

批評可以反駁的。過去常常發生這種情況：黨的領導人隨便插進來說某人的觀點對，或某篇文章好，這篇文章或某人就立即走紅，招搖於衆，而對立的觀點就倒霉了，往往很長時期翻不了身。這是壞作風，妨礙理論問題的自由爭論和自由研究，助長理論上的惡霸作風，一些人就看風撰文，作文媚上，賣論取官，比封建社會還不如。

大家又指出在宣傳或批判工作中有一種極壞的現象，就是常利用外論整人，利用外國報刊的言論作爲黨內鬥爭的工具。這個話題這次由《紅旗》雜誌所寫的《重溫〈實踐論〉》一文所說的「海外奇談」引起。有人說：黨內鬥爭中利用所謂「海外奇談」一類東西整人，由來已久。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國外有評論，廬山會議剛結束，大規模的反「右傾」開始，《人民日報》就公佈了美國新聞處抨擊我國「大躍進」的言論即所謂「海外奇談」，同時發表了觀察家評論，評論說：我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具有右傾思想的人，同美國老爺們是一鼻孔出氣。這樣一來，當時許多人被指責爲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這種手段一直被沿用下來，這次在《重溫〈實踐論〉》中又出現了，用的是香港地區的材料。國外或港澳台甚麼人都有，對於他們的言論也要加以分析。自己出了問題，包不住，人家要說話，說了，我們怎麼辦？要區別。有的確屬攻擊性，有的是一般的輿論評論，並無甚麼惡意，有的也可能是我們自己不說的話他們說了，這些我們不妨聽一聽。就是攻擊性的言論有時也可以促使我們注意自己的問題。要完全避免外國新聞媒介的評論是不可能的。國外有所謂「非毛化」之說，那是在我們抓了「四人幫」以後唱起來的，說抓了「四人幫」等於否定「文化大革命」，抓了江青把毛澤東置於何地，等

等，說這是最大的「非毛化」。難道因爲外國有這類評論，我們就得趕緊把「四人幫」請回到政治局裏來嗎？如此等等。

在宣傳或批判方面，大家對於康生的揭發批判最多，並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情緒。認爲，康生雖然去世，但「康生現象」應引起全黨充分警惕。爲甚麼中國共產黨內竟會產生像康生一類人物？這顯然與黨內生活不正常有關，有專門操整人之業者，此等人在黨內往往很吃得開，他們靠整人升官發財。整人惡俗不除，「康生現象」不絕。

下面的意見可說是絕大多數人都一致的，就是認爲對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要重新分析評價。對於經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東西應繼承發展；對於一些有待實踐進一步檢驗的東西應當細心地辨別其合理內核；對於實踐已證明是錯誤的東西就不能再爲之辯護，要公開實事求是地指出，不能搞「兩個凡是」。

會上議論的問題當然不止這些。有人提出廢除終身制，有人提出應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並剖析其實質，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位同志提出建議：中央應將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像四十年代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一樣，做一個總結，通過總結，弄明是非功過，統一對毛澤東的評價。

關於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所涉及的議論，大體就是以上這些。

與中央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同時，有些省、市春節前也自動召開了同樣的會議（山東、上海、福建、廣東、遼寧、湖南、

江蘇等），參加人數一般五、六十人，上海達到三百人。所談內容圍繞着眞理標準、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民主法制、總結三十年來宣傳理論工作的經驗教訓等問題，提出了下面這樣一些意見：說「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說法究竟對不對；對毛主席的功過評價應提到日程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應當恢復名譽；應展開關於民主法制的討論，等等。

這裏必須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幫」後，特別中共三中全會後，社會好像從沉睡中驚醒過來，或者說從被綑綁中掙扎出來，一下子震盪起來了，出現了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前面胡耀邦所說的大量人員上訪就是這種現象之一。二月八日左右，胡又將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發生一些群衆騷動的材料印發給會議人員參看，上面批有「請同志們想想這個問題」字樣。這表明務虛會期間形勢慢慢地有所變化。

這裏就要談到北京出現「民主牆」的問題。

西單「民主牆」出現較早，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就開始了，在西單地區一個較開闊的路邊的牆上開出一塊言論園地，貼出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初期，內容主要是反對「兩個凡是」，主張言論、新聞自由，保障人權，實行民主與法治，徹底平反一切冤假錯案，批評對象主要是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和管理意識形態的副主席汪東興。「民主牆」的言論開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包括鄧小平、葉劍英等。如《人民日報》十一月二十日登載鄧小平對當時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的談話，其中就說到：「群衆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衆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衆有氣要讓他們出氣。」葉劍

英則在十二月十三日一次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這表示當時需要利用黨內民主和社會輿論來否定「文革」，向以華國鋒爲代表的與「文革」關係密切的當權人士提出挑戰。

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民主牆」的一部分言論轉向激進，再加上當時正值反擊越南挑釁發動對越作戰之際，有些批評和質疑轉到了鄧小平身上。於是形勢逐漸發生了變化。正像有人所分析的，當時鄧小平面對社會上激進派和黨內「凡是派」的雙重壓力，權衡利弊和力量對比，對「民主牆」的激進言論不再寬容，最後採取了取締的措施。

對於「民主牆」的過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馬看花地去蹓過一趟，覺得這是一個群衆議論的場所，這樣的場所當然誰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組有兩位同志對「民主牆」問題專門寫了一份材料，談了他們的看法。我從他們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牆」已經有兩年歷史了，開始被看作社會民主輿論的代表，改革勢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後來的情況變得比較複雜，各種思潮和各種政治力量都在那裏表現，也有外國人介入。逐漸地，又出現了一些未經法律手續認可的團體和「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北京之春》等）。還從貴陽跑來了一個甚麼「啓蒙社」（幾個工人組成）。當然會有一些別有用心分子混跡其中。於是出現了一些攻擊性的言論，醜化共產黨的言論。「四人幫」的餘孽也乘機活動，他們貼出了爲江青翻案的大字報，全面攻擊中共三中全會。事實說明，儘管參加「民主牆」活動（特別在初期）的多數人的動機是好的，表現出關心人民命運和國家前途，但是這種活動方式最後證明也容易爲少數不良分子所利用。前面我說到「民主牆」最終被取

締，但我不知道「民主牆」是何時被取締的，是在務虛會中間還是務虛會結束以後。

但我想說的並不是「民主牆」本身。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恰恰也是「民主牆」活動期間，而務虛會上有些話題剛好也是「民主牆」上的話題，這一點本來並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爲當時大家都面對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問題。但是某些對務虛會懷抱不滿的人，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卻利用「民主牆」的問題做務虛會的文章，說兩者「互相串通」、「內外呼應」，以圖製造混亂，擾亂社會。還應指出，當時已代替汪東興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等人，已在過分渲染當時的輿論局勢和鼓動反右，矛頭也是對着務虛會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用心並沒有完全白費，在當時社會發生一些騷動的情況下，他們把矛頭引向務虛會的言論至少對某些領導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九　理論工作務虛會追述(下)

務虛會第一階段於二月中旬結束，第二階段於三月下旬開始。第二階段除原中央單位的人員外，按計劃邀請各省市同志（主要是黨委負責思想宣傳的書記和宣傳部長）參加，共四、五百人。會前領導小組開了個會，胡耀邦在會上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明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討論這個報告，說明考慮組織大會發言，各組做點準備；在小平報告前，各組可以議一議前段的討論情況，有哪些成績，有哪些不足，我想不足之處總是有的吧！並說，對於我們的會議，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認爲「有問題」，我們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光明磊落。

我在這裏插幾句。第一階段結束不久，鄧小平的講話稿就着手準備，由胡喬木主持，我也參加。先到鄧小平家中（我記得有胡耀邦、胡喬木、宋振庭、阮銘和我，共五人），由胡耀邦簡單彙報會議的情況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記不清鄧小平究竟說了甚麼，總之是話不多，好像主要是說解放思想不能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類的話。起草時幾個人分工寫一部分，我寫第一部分，寫好了交給胡喬木，由胡喬木總修改，然後交鄧小平自己完稿。修改和完稿的情況我們就不再過問了，我只記得我所寫的第一部分只剩下開頭的十幾句話。

小組會又開起來了，但和第一階段大不相同，有些不景氣，像是聽了報告就準備草草收場一樣。

小組會傳達了領導小組對會議安排的意見，又宣讀了批下

來的幾份材料，記得其中有上海《民主論壇》一些主要人物活動的情況，然後檢討前一階段務虛會的情況並討論各種反映，大致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見：

（一）共同認為三中全會以後總的情況是好的，務虛會第一階段始終沒有離開三中全會的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澄清了許多長期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問題，特別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發揚黨內民主作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對全國也發生了很好的影響，這一點應當肯定。同志們研究問題的態度是嚴肅的。大家分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很不願意涉及他老人家的問題，一方面又感到重大問題的錯誤不指出，不糾正，我們將很難前進，也很難統一思想。但是，完全不存在像有人所說的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問題，正如列寧所說，有些眞理接受起來是痛苦的。

（二）現在社會上出現一些不正常的和違法亂紀的現象，同中共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和理論工作務虛會沒有關係。社會上和黨內有些人反對務虛會，也是反對三中全會的，如說「現在的政策比劉少奇還右」，責問「為甚麼要給右派平反」，有人直接說「農村出現包產到戶，以及民主牆的問題，都同三中全會宣傳民主、大講解放思想有關，同平反天安門事件有關」，等等。北京街頭甚至出現了「必須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義」的小字報。這些難道不是提醒我們對於林彪、「四人幫」的流毒不能低估嗎？說「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連毛主席都可以議論了，難道還有甚麼禁忌嗎？」有人若願意聽這些話儘可以聽便。

（三）因此，多數與會同志希望小平同志的報告要肯定眞理標準討論的成績及其帶來的好形勢，肯定三中全會以來解放

思想的好形勢，肯定務虛會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方向是正確的。還希望講清楚當前的方針究竟是「放」還是「收」，因爲有人說現在要「收」了。

（四）各省市來的同志說些甚麼呢？他們多數要求小平同志就三中全會以後的形勢多說幾句，給予充分肯定，因爲現在頗有些人對三中全會不理解或者有抵觸情緒，說甚麼「知青鬧事是發揚民主引起的」，「落實政策是燒紙引鬼」，甚至說「我早說過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陝西省一位相當負責的幹部公開說「階級鬥爭爲綱不能不提」。現在有些「四人幫」的重點人物還不服氣，不承認錯誤，有的還進行反攻，對於要求他們說清楚問題，則提出要「反說清楚」，如此等等。對於前一階段的務虛會，不少人認爲是開得成功的，要充分肯定；第二階段多開幾天，不要草草收場。有人特別指出：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不忙做結論是對的，但在黨內一定範圍內議論還是正常的；現在有人因爲中央發了個二十三號文件，就認爲解放思想過頭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此外，來自外地的人也有說「務虛會批『兩個凡是』不妥當」，「務虛會缺點很多，中央早該說話了」之類的話的。

這裏要說明一下，有人提到中央發的二十三號文件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一位外國朋友對於三中全會後國內某些議論，包括對毛澤東的議論，認爲不夠妥當，因此向中央寫了信。這位外國友人當然是出於善意。但是幾位省市同志對於把這位國外友人的信加按語作爲中央文件下發（按：這是胡喬木提議華國鋒這樣做的）有意見，認爲：外國友人的意見未可厚非，但是有甚麼必要單獨發一個中央文件呢？其中有的提法也不一定對，比如說「毛主席代表一個時代」。「四人幫」過去提甚麼

新的里程碑，毛主席自己就反對，說他不能代表一個時代。

總之，第二階段開始時的議論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的各種社會輿論的反映，不單是指務虛會本身而言，而且對務虛會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三中全會的評價。因此說，這是一次難得的對三中全會以來幹部思想狀況的測驗。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作題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結束時鄧小平說：我只是初步講些意見，請同志們討論提出意見，然後再作修改。講話稿事先未發會議領導小組，估計胡耀邦事先也未曾過目。

在我的記憶中，討論中大家的意見不多，因爲報告主要講當前存在的兩種思潮：一種是林彪、「四人幫」的和「兩個凡是」的思潮，一種是脫離或違背四項原則的思潮，包括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出現的少數人鬧事。而報告着重講的是後一種思潮。我記得我所在的小組對報告談了這樣幾條意見：(1)報告對另一種思潮講得較少，這就發生一個問題：當前的主要問題、主要危險究竟是甚麼，是前一種思潮還是後一種思潮？(2)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主題是分淸兩條思想路線，兩條思想路線的分歧在黨內經常出現。報告對務虛會在分淸兩條思想路線問題上所做的工作沒有足夠的評價。(3)應當劃淸兩個界線：一是不能將「兩個凡是」看成就是「四項堅持」，以致認爲反對「兩個凡是」就是反對「四項堅持」，這是很危險的；二是思想理論工作上的缺點和反對「四項原則」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混淆。

當時的問題是怎樣召開大會。爲準備大會發言，我請本組的孫長江、邵華澤、滕文生三位同志起草一個發言稿，題目定爲《分淸兩條思想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爲我覺得在

小平同志報告後，特別要講清兩條思想路線和堅持四項原則的關係：一方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脫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但另一方面，運用四項原則也不能不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否則，「原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會變成教條主義、學理主義，或變成像馬克思所說的「刻板的正統觀念」。我們需要的是在實踐中、群衆鬥爭中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刻板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原則也一樣，我們目前要檢討我們在運用社會主義原則方面究竟發生了甚麼毛病，以致出現了目前這樣的嚴重問題。

準備講這樣的問題，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商量。胡不在會議場所，當時是在他家裏。晚上我給他打電話，他邀我到他家去一談。剛好安子文同志也在座，安這時已到中央黨校工作，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他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冤案」中的重要人物，「文革」前任中央組織部長，我們見過面。耀邦問我小組會情況，我據實以告。我問大會究竟何時召開，小組會已經開不下去了。趁他暫時沉默之際，我向他彙報我們準備的發言內容。他反過來問我：「你覺得大會是開好還是不開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說：「大家究竟會講些甚麼呢？你們的發言內容自然可以。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動搖。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和堅持四項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出在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弄成兩張皮。但是，你們準備的東西是否拿到大會上去講，還要考慮一下。」然後他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走動，這是他的習慣。這時安子文向我說了一句：「你們發起的眞理標準討論很重要，沒有這場討論，也許

我們的案子還不可能這樣快解決。」我記得這句話薄一波同志在劉瀾濤家裏碰到我時也這樣說過。「六十一人冤案」確是在真理標準討論後完全徹底平反的。薄一波和劉瀾濤都是第一屆中共中央華北局的領導人，我當時在那裏工作。當我正與安子文說話時，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堅定的語氣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

黨的歷史上少有的這樣一次理論工作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我對我們準備好的發言稿沒有用上，覺得有些惋惜，回去後同長江一起對講稿（原是三人分頭寫，沒有統一整理）做了一番調理工作，改寫成一篇文章，先刊登《理論動態》，然後又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也算是我們對於這次會議的一個留念。

十　真理標準討論「補課」

在談「補課」這個題目之前，先把黨校本身的事交代一下。

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黨校領導班子又有變動。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央任命安子文爲副校長；張平化調離黨校改任國家農委副主任；馮文彬任黨校副校長，同時兼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實際上主要精力在中辦）。黨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改變了，新設校務委員會爲學校最高領導機構，校務委員會由胡耀邦、安子文、馮文彬及四位正副教育長（宋振庭、吳江、桑子楨、范若愚）共七人組成。原領導機構校黨委及其常委會撤銷，學校黨組織另設機關黨委。

關於教育長的職務，前已提及，中央黨校教育長職務按延安的傳統肩負學校的實際重任，不僅負責教學，也負責行政、後勤等，至少在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兼任校長的時候是如此。原副教育長馮文彬已卸職，現在要安排一位教育長，幾位副教育長。教育長人選曾考慮由我擔任，馮文彬徵求我意見時，我推辭了，因爲我自知不是搞行政的材料，而且希望有時間能做點研究工作。學校接受了我的意見。但我仍任第一副教育長，和另一位副教育長范若愚（「文革」前爲中央黨校副校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共同管理教學工作。我原負責的哲學教研室和理論研究室，辭掉了一個，只兼任理論研究室主任。

教育長宋振庭是從吉林省調來的，他到黨校不久就病倒

了，是癌症，不能工作，但卻在黨校突發的一個案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事後面要講到。

三中全會以後，甚至理論工作務虛會後，有關「兩個凡是」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局勢並沒有完全明朗化，但眞理標準的討論卻中斷了，「凡是」勢力乘機反撲，理論工作務虛會成了一些人攻擊誹謗的目標。社會上盛傳三中全會犯了右傾修正主義的錯誤，有人公然說今後必須繼續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有人認爲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揚鑣」，個別部門甚至發生反攻倒算行爲。

現在國內外傳播的一些有關書籍和文章，當談到眞理標準討論時，好像認爲只是關於眞理標準的一、兩篇文章就解決了問題，因此只限於詳細介紹文章的寫作修改過程及細節，而全然不瞭解這場討論的全過程及其各個重要環節，有的書籍甚至還作了演義式的虛構描寫。其實，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內部的爭論，而且處於受壓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雖然把爭論公之於全國，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討論，但討論只限於中央及省市上層，並沒有深入到廣大幹部和群衆中去。正因如此，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才敢於在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再度挑起爭論；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實際上只是把這場爭論搞得更加尖銳化罷了。

還要請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論工作務虛會後，有人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口號。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這是小平同志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後，當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在一篇講話中說的，《理論動態》曾議論過是否刊登這個講話，後來打消了這個主意。「經濟上反

『左』，政治上反『右』」雖然和「兩個凡是」不同，但這個口號在當時的出現無形中代表了今後一種有勢力的傾向，也反映了黨內在改革問題上存在的一種分歧，雖然它一直沒有見之於任何中央文件。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務虛會結束後不久，鄧小平赴天津、山東、上海等地考察。他講了幾次話，從思想路線講到組織路線，重新提出要警惕「兩個凡是」。這些講話後來經過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一文中（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0－191頁）。這篇文章註明是鄧小平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人員時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些重要的段落：

「就全國範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

「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執行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着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孔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些人大體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感到現在這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經過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

「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講話最後提出：「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成，現在要考慮補課。」

將鄧小平當時幾次講話整理成一篇文章並正式公佈是後來的事，當時我看到的是從下面傳來的講話記錄，內容大致與後來經過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個別詞句刪掉了。我將收到的記錄送給胡耀邦，請他考慮《理論動態》是否寫一篇東西。胡看完記錄給我一個電話，要我先到中宣部會議上去講一講，關於補課的內容也可以提出我個人的意見，讓大家議一議。

我在中宣部除照唸記錄外，對當時面臨的情況和補課的內容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爲這次補課，或者說繼續討論，重點應當解決領導思想問題，就是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帶頭解放思想，旗幟鮮明，端正思想路線首先要端正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的思想路線。領導的責任在於通過討論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的方針上來。我並提出，根據前一段的經驗和目前的情況，這次的補課在思想上始終要抓住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弄清楚究竟甚麼是眞正的毛澤東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林彪、「四人幫」那一套思想體系記在「毛澤東思想」的名下，要區別眞「高舉」和假「高舉」、眞「堅持」和假「堅持」；另一個，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思想及幫派組織路線並肅清其流毒，「兩個凡是」就是極「左」思想及幫派路線流毒的集中表現。

會上大家議論了一陣，都認爲有補課的必要。耀邦對我說，將這些內容先在黨校向全體學員講一講。我照辦了。

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及秘書長劉瀾濤找到我，說中央統戰部正在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上暴露出來的糊塗觀念和「左」的東西很不少，想請我在會上就眞理標準問題講一講，幫助大家統一思想。我有些遲疑，因爲這是中央部門的全國性會議，而我並不瞭解統戰幹部思想的深淺。但無法推辭。時間就定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

報告會由劉瀾濤親自主持，年近九秩的李維漢同志（其時他任中央統戰部顧問）也在台上就座，我實在有些過意不去，站起來請他老人家回去休息，我另找時間向他匯報，他不肯，一直坐到終場，可見會議之認眞。

會議印發了我的講話全文，並開了兩天小組討論會，討論「簡報」也送給我一份。我留心翻閱這些「簡報」，發覺多數同志贊成，認爲弄清這個問題對於統戰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統戰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發現了兩個問題：

一是，有一位省委統戰部長說：「這樣重大的討論，既然在中央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爲甚麼中央沒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傳達，而由中央黨校的同志出來講呢？我們那裏，黨委從來沒有傳達過，也沒有討論過。這次回去，說補課重要，如果黨委不動，我們統戰部門補課是補不起來的。」這個反映很重要，說明雖然三中全會公報鮮明地對眞理標準討論作了「傳達」，但有的省委卻故作不知，按兵不動。當然，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場討論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三分之一」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補充說幾句。我原來收到的小平講話記錄稿，有這樣幾句話：「利用毛主席的錯誤，堅持『兩個凡是』，即換一個面孔，堅

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樣的人，個別單位竟達到三分之一。這是全國的縮影。」我講時聲明，這是根據別人的記錄稿，不是原文。會議印發我的講話稿，上面明白地有我的聲明。對於這個問題，討論「簡報」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爲「個別單位達到三分之一」的估計是適當的，黨內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轉不過彎來的人的確相當多；另一種意見則反對「三分之一」的估計，他們撇開個別單位這個詞，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幹部堅持「兩個凡是」，這還了得！

我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向會議作解釋。但是我後來聽說，以鄧力群爲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寫會議簡報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時，把前一種意見略去，只將後一種意見寫上，聽說小平看了有些不悅。後來有一次我請鄧力群向黨校學員作報告時專門向他聲明這件事，他沉默不語。我想，不管怎樣，能夠引起鄧小平的「不悅」，編寫會議簡報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也算達到了。

與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同時，中央組織部也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我又被部長宋任窮邀請於九月六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講同一個問題，講話內容基本與上次同，不過突出了這次小平所說的「用人」問題，「現在還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但這次會議對這個問題究竟如何對待，是否進行了討論，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後，根據中宣部意見，新華通訊社的《內部參考》（九月二十七日）刊登了我兩次講話的要點，題爲《眞理標準討論補課重點要解決領導思想問題，補課要落到實處》。《內部參考》發至中央各部（包括司局）、各省市委、地委（包括縣委第一書記），軍隊則是軍師級及相應的領導幹部。因此，至少

可以說，關於眞理標準討論應當補課的問題，一九七九年九、十月間，已經以新華社內參的形式下達全國了。

眞理標準討論補課爲眞理標準討論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大體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基本結束。這次全會通過了《歷史決議》，明確指出有一個「毛澤東晚年錯誤」問題；全會同時免去了華國鋒的黨中央主席職務，由胡耀邦接任。這樣，就從思想方面和組織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撐「兩個凡是」的支柱。

所謂爭論基本結束，就是說並沒有完全結束。因爲思想路線上的鬥爭並未因此停止，以後在各種問題上（自然包括改革問題），「凡是」與「實踐標準」的爭論仍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有人對改革開放路線始終不以爲然，他們看到改革開放出現一些問題，如經濟秩序混亂，有的環節失控，出現假冒僞劣以及出現腐敗現象，因此就在相反意義上舉起「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旗幟。而對於提出並宣傳實踐標準的人，因爲在爭論中得罪了相當一批仍掌握實權的人，無異爲自己埋下了禍根。這是由鬥爭的反復性、複雜性決定的。

關於眞理標準討論的意義和影響，有些外國評論家倒要比我們有些人看得透徹些。下面舉幾個例子。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菲利普・肖特所寫《熊與龍——今日中蘇內幕》一書（一九八二年），其中說到：「《人民日報》把眞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看成中國現代史上三大運動之一，與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並列。蘇共二十大後，卻提不出類似的口號來。」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顧問）奧克森柏格，在美國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的《知識分子》季刊，撰文說：「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

這兩句話，不僅是政治口號，而且反映了中國領導人企圖改變決策過程的決心。」

更值得注意的還是新加坡《聯合早報》於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發表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國際影響》一文，這篇文章說了這樣一段話：「貫穿着整個改革運動的其實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精神。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號，其實卻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效用非常大的原則，使改革領袖可以放手採用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論或意識形態的束縛。」（引者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裏只要把「意識形態」一詞改成「教條主義」就可以了。）

十一　經濟學的撥亂反正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召開「十一大」之前，首先發動的是經濟學界關於「資產階級權利」（舊譯「資產階級法權」，下同）、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兩者是一回事。因爲自從「大躍進」以來，對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傷害的，正是否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以及同時批判所謂「庸俗生產力論」、「唯生產力論」，以「階級鬥爭爲綱」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所謂「以革命促生產」一語的涵義），實行鄙陋貧困的平均主義；同時，否定商品生產，重新回到軍事共產主義時代去。這是「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典型表現，結果在經濟上造成了持續不斷的異乎尋常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九月張春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即按勞分配原則的文章，指出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這一原則與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相矛盾，它雖刺激物質興趣，卻妨礙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毛澤東親自爲這篇文章寫「編者按」推薦給讀者，以此爲極「左」思潮開路。

「資產階級法權」是馬克思關於按勞分配的理論用語。馬克思在批判拉薩爾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時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只能實行按勞分配。所謂按勞分配，就是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是「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這是一種平等權利；但是由於各人勞動能力的差別，各人在相同時間

內提供的勞動量不可能是同等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因此，這種「平等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能力來說，又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

馬克思在這裏以「資產階級法權」這樣的特殊用語來表述這種「不平等的權利」，完全不是否定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性質，它不過是與理想中的「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相比，指出這種「不平等的權利」還帶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某些痕跡，並非說這種「不平等的權利」即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按勞分配的主要標誌是剩餘產品歸勞動者自己，不歸資本家及其他剝削者所有。有人望文生義，或者一見「資產階級」一詞就反感，以致想入非非，完全是一種理論上的「左」傾幼稚病。雖然「大躍進」中因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領工資」或「部分供給制加基本工資的分配制度」，對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因此中間曾一度糾正平均主義的傾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卻又變本加厲，進一步強調「資產階級法權」即按勞分配原則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基礎，批判勢頭一浪高過一浪，嚴重挫傷了人民群衆的勞動積極性。這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最嚴重錯誤之一。

所以，粉碎「四人幫」後首先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批判極「左」思潮，是並不奇怪的。從一九七七年二月起，經濟學界于光遠、薛慕橋、王惠德、蘇紹智等，首次在北京地區召開了討論會，以後又連續舉行了四次全國性的討論會（前三次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月、十月，第四次是一九七八年十月）。

在按勞分配這個問題上較易取得共識。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報告中就正式宣佈，必須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

幹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

我已經說過，黨校復校後第一期（一九七七年九月開始）經濟學課程主要就是重新弄淸按勞分配問題。黨校的做法是，每節課程都請校外專家作報告。第一期經濟學課程被邀請作報告的有于光遠、薛慕橋等人。薛還借住黨校完成他那本總結以往三十年經濟工作經驗的比較有影響的著作。

校外專家的報告有的經過整理刊登在《理論動態》上。胡耀邦對具體經濟工作並不十分熟悉，但他重視經濟理論，《理論動態》由他出題目撰寫的經濟評論不算少。我對經濟學也是一知半解，這時也被迫不能不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了。

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展起來後，人們開始敢想敢說，敢於探索，經濟方面提出的問題尤多。應當提一下，這時人們也開始注意南斯拉夫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即現時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先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當時遭到我們的批判。據我所知，一九七八年前後在我們這裏就有人根據南斯拉夫的經驗寫文章論證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

一些外國經濟學家的著作特別是關於評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著作，更多地被介紹到中國來，有的在內部資料上摘要介紹。我記得，正是在這個時候，大名鼎鼎的胡喬木在這方面演了一場鬧劇。

第四國際托派理論家曼德爾（比利時人）《關於過渡時期社會的理論》一書上下兩冊，其上冊早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六五年作爲內部參考書籍出版，下冊又由該館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以《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爲名，作爲一般學術著作出版，未加任何說明。胡喬木讀到此書後甚爲欣賞，他於一九八

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誇獎此書說：「我看到一本比利時的學者曼德爾寫的這樣的書，叫《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獨立的觀察，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裏面很少利用的。……這位作者並不是一個那種流行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沒有堅持到這種程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話，他一定都要接受。」胡喬木的意思顯然是說，曼德爾是一位創造性的、沒有教條主義習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要算是很高的評價了。

胡喬木特別重視該書第十五至十七章，即研究蘇聯及過渡時期的那三章。他不僅在社會科學院的黨代表大會上向全體社會科學工作者推薦，而且叫一個黨中央機關將該書三章印成大字本分發中央負責人參考，並推薦給胡耀邦，胡耀邦也在中央黨校將這三章印成大字本發給全體學員和教員，作爲學習材料。我自然也得到一本，但當時我因忙於別的事務來不及翻閱，擱下了。後來這本書在一九八〇年又由中聯部蘇聯研究所推薦給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這次出版倒是加了出版者的說明，點出此書「代表了第四國際的政治思潮」。

豈料一九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同一個胡喬木，竟於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六日兩次嚴厲批評人民出版社，說：「我想像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書，走得太遠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國際托派曼德爾的書，還說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國際的觀點，明知他是托派還公開出版他的書。」眞令人哭笑不得！爲此事，當時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曾彥修，於一九八四年九月間鄭重其事地寫了一份《關於不

同意胡喬木同志一九八四年兩次對人民出版社的強烈指摘的申訴書》，分送給胡喬木及中央各領導人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結果，卻不了了之。（以上事實及引語均摘自曾彥修的《申訴書》）

但這只是作爲一個小插曲在這裏順便提及。現在就該談到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了。

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是一場有重要意義的討論，它爲經濟體制改革作了理論上的準備。這場討論發生在肯定實踐標準之後。討論的發起緣於黨校經濟學課程中學員們對於一個問題的爭論：我們的經濟工作是否存在着「爲生產而生產」的問題？對此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爲，「爲生產而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生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始終是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値或剩餘產品或利潤，資本主義生產甚麼或不生產甚麼，都以可能獲得的剩餘價値或利潤爲轉移，而工人即生產者「只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不是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儘管資本主義生產爲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値或利潤，它的生產也必須面向市場，根據市場需要而生產，否則產品就沒有出路，又哪來利潤？因此從長遠看，資本主義「爲生產而生產」在客觀上仍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從總體上爲改善人們生活（當然不可能消除貧富懸殊現象）創造了現實基礎，從這點看它具有歷史進步性。

另一種意見則認爲，雖然從本質上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爲了人及其需要，即爲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及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服務，與資本主義生產追求最大利潤相區別，不應該存

在「爲生產而生產」的現象，但是實際上，這種現象依然以某種形式存在着。這同片面執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方針有關：只重視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基本建設戰線拉得很長，年年壓也壓不下去，甚至愈壓愈長；又提出「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實際上把人們的生活置於腦後。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甚麼變動，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有的實際工資比五十年代還有所下降，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絕大部分生產是自上而下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的，只看重產值指標，很少顧及變動中的市場因素，因此生產出來的東西常常不對路，形成積壓。企業靠老設備運轉，人民靠低工資生活。我們的生產縱然有所發展，但對人民生活欠賬實在太多，這是事實。這就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我們的「爲生產而生產」在發展生產力方面還遠不及資本主義的「爲生產而生產」來得有效益。原因究竟是甚麼？現在我們不能諱言這一現象，而是要認眞分析和糾正這一現象。

在聽取匯報時，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責成匯報者整理成一個材料送胡耀邦，並在電話上建議就此撰寫一篇評論文章；胡耀邦在材料上作了批示，支持第二種意見。這就是《理論動態》第 160 期（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刊載《要弄淸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一文的由來。

沒有想到，這篇評論除了及時回應學員的討論之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人民日報》於十月二十日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全文轉載了這篇評論；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

紫陽就此問題發表的講話；

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經濟學家于光遠就此所寫的評論；

接着，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在當地刊物上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講話（十二月六日）。

特別要指出，任仲夷的講話提出了「通過這場討論，要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的意見。指出：社會主義生產既然是爲了滿足人民和社會的需要，人民消費的需要，那末，計劃就必須考慮市場的情況，認眞進行市場調查，不僅要調查省內和國內的市場，還要調查國際市場，要充分地正確地發揮國營企業的計劃外生產、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個體生產、集市貿易等經濟形式的作用；要充分地正確地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方面的政策去影響和調節市場；所謂市場調節就是由市場供求變化調節我們的生產，供求變化會導致價格的上下波動，因此，市場供求調節實際上是價格調節，所以我們的生產必須十分注意價格問題，等等。

據我所知，這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第一次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問題。這是討論生產目的問題的一個重大成果。

但是同樣沒有想到，正在討論順利展開的時候，胡耀邦突然通知我，說有人對這個討論有意見，特別對批評「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有意見，並說胡喬木對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表述也認爲有問題，因此中央領導同志決定這個討論暫時停下來。

我覺得奇怪，這個討論切中時弊，多數人認爲很有必要，

爲甚麼又要設置禁區呢？其實，當時中央一級報刊雖然停發了文章，但地方報刊並未接到任何通知，仍然議論紛紛。一九八〇年初，來中央黨校學習的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也要求澄清這個問題，尤其要求從理論上搞清楚這個問題。作爲分工管理學校教學的負責人，我不得不作一次講話，從理論上並聯繫實際說明這個問題。三月間講話，四月就整理成一個書面東西，分發給學員並上送胡耀邦和中央，算是提出個人的意見。我表示這樣一個意思：我們的經濟工作曾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問題很多，應當發揚經濟民主，允許大家總結經驗教訓。《紅旗》雜誌社一位副總編輯看到這篇文章後，要求在《紅旗》上公開發表，並說這件事由他們向中央宣傳部請示。這樣，這篇文章就以《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再研究》爲題，在一九八〇年《紅旗》第 12 期（六月十五日出版）上刊出了。

這篇文章所闡述的着重點之一，是分析我國過去經濟工作中發生「爲生產而生產」現象的各種表現及原因，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嚴重後果。談原因時，除了指出我們的經濟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指出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積累長期居高不下（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過百分之四十），積累資金的分配又片面側重生產性積累，輕視非生產性積累，特別以犧牲與人民消費直接有關的生活資料生產爲代價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同時，高積累又與高浪費結伴而行等等原因外，還特別指出下面一點，即：「我們的計劃體制、計劃方法是自上而下垂直的，不注意企業的橫向聯繫和市場需要。這就產生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不少企業盲目生產那些不對路產品，生產得多，積壓也多。有產品沒有銷路的『閒置工業』，也有生產能力超過當前

需要的『重復工業』。有的簡直是爲搞形式、圖虛名而生產，爲宣傳價值而生產，甚至爲某些根本違背經濟規律的政治需要進行勞民傷財的生產。這些都是以『計劃經濟』的名義進行的，所以人們有時把這類『爲生產而生產』的現象叫做『爲計劃而生產』。」這裏所講的，當然是我的看法。

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引起了中央報刊關於生產目的的第二輪討論。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至十日，還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性的討論會。

這場討論直接涉及到我國現存的經濟體制問題和有關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不必諱言，過去我們有些經濟領導工作者缺乏明確的爲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的思想，這不是甚麼「左」或「右」的問題，它的性質同官僚主義者漠視民生有些相似，是直接違反社會主義經濟本性的。從本質上說，「爲生產而生產」的現象同不關心「人」的地位有關，過去一提「社會主義是爲了人」，就被扣上「人性論」的帽子。不弄清這些問題，「爲生產而生產」的錯誤思想就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經濟體制的改革也難以進行。這就是這場討論的意義所在。

此外，我在此不能不提一下我的一個過失。大概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之後，胡耀邦轉給《理論動態》一篇文章，係蔣一葦同志所寫，提出我們的國有企業應當成爲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照現在所說，即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大膽的意見。這個問題正是揭發了我們以往社會主義經濟的弊病所在。中國開始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雖然採取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形式，甚至國有企業的大部分產品的計劃調撥也採取企業之間商品買賣的形式，企業內部也利用成本、利潤、價格等

範疇進行經濟核算，但能不能夠說這是一種以市場價值規律爲自然主導力量而以宏觀計劃調控爲必要輔助手段的眞正的商品經濟呢？我認爲不能這樣說。中國以往的社會主義經濟就生產資料領域來說，實際上是一種以商品爲外殼的一定意義上（即使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意義上）的「產品經濟」；就是消費品（這裏主要指農產品）這個商品領域也不是主要按市場價值規律運行的。正因爲這樣，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標誌着我們的經濟將開始一項根本性的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蔣一葦的文章正是在這方面指明了一個突破口。

而我和我的同伴們當時對此卻感到無把握，實際上是我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到這個程度，所以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把這篇文章壓下了，沒有發表，也沒有同作者商量，致使這個正確的重要的意見至少推遲了半年才得與人們見面。如果我們不犯這個過失，文章能夠及時發表，本可以使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進一步向深層次發展。

十二　起草《歷史決議》和學習《陳雲文稿》

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是又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是總結過去準備開拓未來的新時期。一方面是總結過去，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要目的之一是藉此統一全黨思想，以便集中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另一方面，調整和更新中央領導班子，初步實現年青化。

組織調整迅速進行。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在黨中央主席（此時主席還是華國鋒）之下，設立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原中央秘書長職務撤銷，由胡耀邦任總書記；八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由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胡耀邦接任黨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爲黨中央副主席。組織調整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是中央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決定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下設起草小組，起草小組由中央指定，胡喬木任組長。我也是小組成員之一，但我沒有前去參加具體起草工作，因爲學校工作確實離不開，其時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安子文突然病逝，教育長也因患癌症動大手術而長期住院，胡耀邦已無暇顧及黨校工作，他

把《理論動態》最後定稿權也交給了我，而馮文彬則主要忙於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這樣一來，黨校的日常事務包括行政和人事，相當一部分不能不落在我的肩上。因此，《歷史決議》的日常起草工作我只好請假。當然，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前面說過的我對胡喬木的印象，覺得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爲好。

《決議》如何寫，鄧小平曾經作過九次談話（見《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91－310 頁），這些談話幾乎把決議內容全部交代清楚了。決議從草擬提綱到撰寫完成共花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中間經過兩次大討論：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十月黨內四千人參加的大討論；一次是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後討論。兩次討論我都參加了。

我是贊成寫歷史決議的。因爲自從粉碎「四人幫」以來，對於一些重大問題議論紛紛，特別是我黨爲甚麼會犯「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前例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究竟怎樣評價，這個問題具有十分尖銳的性質，而且事關全局，甚至關係到黨的命運，有人已公開提出今後不應再提毛澤東思想了。很顯然，這些問題如果不很好解決，我們將無法前進一步。

記得起草小組第一次開會議論的時候，就有兩位與會者率直地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已到了非廢棄不可的時候了，過去還講得通，現在講不通了。並當面責問胡喬木：「你是理論家，請你解釋一下究竟甚麼是毛澤東思想？」喬木只能苦笑不答，其他人則不表態。

我覺得這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草率不得。記得我當時禁不住說了這樣一個意見：現在立刻這樣做恐非所宜，要從政局穩定考慮。「毛澤東思想」應否廢棄的問題，還是靠

後一點，或者讓我們的後人去決定吧！

我的意見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還是一個人治重於法治的國家，許多問題由此產生。四十年代提「毛澤東思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革命走過極其困難曲折的道路，幾乎面臨失敗，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盲目聽命於蘇共，盲目執行共產國際強加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在中國革命生死存亡關頭，確實是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方針挽救了中國的黨，挽救了中國的革命，最終把中國革命引上了勝利的道路。這是客觀歷史事實。因此，當時提出「毛澤東思想」含有針對蘇共和共產國際之意，意思是，我們將按照自己的方針路線，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這裏要提一下：一九三七年共產國際派王明等人回國並控制黨的某些要害部門，意圖奪權，毛澤東幾乎又一次處於少數地位，三七年十二月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是由王明做總結報告的，這個報告提出了錯誤的方針政策，黨又一次處於危險關頭；其時王明還未經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了許多文件。幸而當時黨內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特別是張聞天、王稼祥等人依然傾向毛澤東，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也表示支持毛澤東，勸告王明不要爭當領袖。這樣，原以「太上皇」自居的王明最後陷於孤立，奪權失敗。這次事件是促使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思想」就是在整風以後逐漸在人們的心目中樹立它的地位的。蘇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從這方面說，當時提「毛澤東思想」自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可是另一方面，當時提「毛澤東思想」甚至將之列入黨章，也說明中國黨已深受蘇共提倡「個人迷信」、「神化個人」的影響，而且誰幹這種事情誰得利。這是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就我們目前的情況來說，

等於自造了一個困境，即：這時如果我們突然廢棄「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在人們的心目中實際上等於否定我們已走過來的道路，從而在政治上造成被動，並因此難以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恰當的判斷，而這是當前一個更爲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晚年犯了如此重大的錯誤，爲民族國家造成如此深重的災難，共產黨人絕不能「爲尊者諱」，絕不能以任何藉口掩飾或篡改歷史事實，否則，共產黨就不成其爲共產黨，只能說是一個爲着謀求某種私利和特權而造神的迷信宗派集團。「凡是派」之所以令人覺得悲哀，就是因爲他們不明此理，喪失理智，實際上淪爲宗教信徒。但是，即令如此，即令我們面臨困境，但爲我們爲之奮鬥的事業着想，爲擺脫困境，我們必須採取既科學又現實的態度，即走一條既維護眞理同時又保持政局穩定的路。

因此，我以爲應當充分肯定《決議》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即：目前不廢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而是將「毛澤東思想」的內涵重新加以解釋。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它是中國革命集體經驗的結晶（主要在五十年代以前），是一種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理論。在這一前提之下，作出兩種區別：一種是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適當區別開來（所謂「適當」，是因爲毛澤東思想畢竟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五十年代以前，毛澤東名副其實地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代表）；一種是要把作爲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毛澤東晚年之所以犯錯誤，也是由於他本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初衷，違背了自己原來堅持的正確的東西。這後一種區別更爲重要。或許有人說這樣講未免有些「弔詭」，但這並非說法的「弔詭」，而是歷史本身的

「弔詭」。在歷史上，原來思想正確或大體正確但後來違背自己的初衷走向謬誤的事是常有的。人是會變的——偉人、名人、普通人都一樣。

我以爲，實際上現在只有這樣做才能穩住政治大局，避免局勢動蕩。就是說，目前首先需要從現實政治情況出發考慮問題。

但這當然不是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無可挑剔，它將永世長存。以科學眼光看，除了某種學說的創立人可以用個人名字命名這種學說以外，將這種學說的奉行者特別將集體創造的經驗歸之於個人，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不管這個人在其中起了多少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同時以爲，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目前的處理並不是最後的處理，也不可能是最後的處理。「毛澤東思想」的存廢問題，最後的決定權並不在我們手裏，這個問題只能留待我們的後人去解決。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一樣。我相信歷史總會對每一個人（包括對歷史有過重大貢獻的偉大人物）作出公正的評價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時，《決議》仍未明確寫明應將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別開來，我除再次口頭說明我的意見外，並用書面文字提出建議，這個建議被採納了，寫入《決議》第三十一條中。同時，爲了讓人易於瞭解「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我並建議將實踐已證明其爲正確的毛澤東的部分重要著作目錄，主要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著作，收入《決議》的有關章節。這個建議也被採納了。（但我要聲明一句：我並未開列篇目，《決議》中列的篇目是胡喬木等人開的）。

至於在此之前，在一九八〇年十月間黨內四千人討論的那

次會上（討論分小組進行），我主要發表了這樣一個看法，我說：寫《歷史決議》是爲了統一認識，減少分歧，以便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但我認爲，這個《決議》只能看作是初步的，雖然它在當前最需要達到認識一致或大體一致的問題上做了工作，收到一定的預期效果，但也畢竟只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各方面的影響又如何，毛病究竟出在哪裏，需要從各個方面，包括思想理論工作方面，黨的生活方面，現行社會主義體制方面等，找出問題，總結出經驗。我說我很同意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人所說「現在要重新認識問題」，即重新認識我們的方針政策，重新認識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等等。一切口號也都要重新審查。總之，《決議》不能只限於一個，或只作一次。不能說，一切問題通過這個《決議》都解決了。認識總歸是一個過程，何況，我們的經歷實在太複雜，方方面面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我舉例說，中央政治局剛通過鄧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其中關於制度改革、制度創新的許多重要問題和重要意見，《決議》沒有吸收進去。一個《決議》當然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因此我們也就需要承認，今後尚有許多問題有待討論，決不可把自由討論的大門關閉了。

也就是在《決議》起草和討論過程當中，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應邀到國家機關黨委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做了關於自五十年代以來黨的歷史上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被破壞、實行個人專權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和慘痛的歷史教訓的報告，這個報

告後來草成一篇文章，題爲《如何防止災難性歷史的重演》，送胡耀邦審閱，胡原打算將此文分送起草小組和各政治局委員參考，但當再送第二稿時，他改變了主意，他對稿子略加修改，然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

「我在幾個地方作了一些大膽的刪改，只有一個地方因為工程太大，請你自己動手。但這些地方都只是作為我個人的意見提請你斟酌的。在我看來，（此文）可以在《理論動態》上刊登，至於是否在報紙上發表，那就還要考慮一下，因為現在人們的思想特別敏感。中央現在的決策是：讓人們在歷史問題上冷卻一段，集中精力引導人們搞四化。四化上去了，那時再來回味一下歷史，可能更好些。

胡耀邦，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後來這篇文章登在《理論動態》一九八一年第262期上（見本書附錄三）。這也算是一種形式的歷史經驗總結吧！

《歷史決議》尚在討論修改過程中，一九八〇年十月《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以下簡稱《陳雲文稿》）出版了。

此時出版《陳雲文稿》的意義何在？當時我沒有明確意識到這個問題。《陳雲文稿》出版在《鄧小平文選》（最初的單卷本）之前，《鄧小平文選》是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其次，《陳雲文稿》的編輯不按領導人文選一概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事的通例，而是在鄧力群直接主持下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編輯，說明與當前政策關係密切。當時的形勢是：經濟改革已提上日程，農村改革已轟轟烈烈地展開，但整個經濟尚處於調整階段。《文稿》收集陳雲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文

章，也就是「三大改造」以後到「大躍進」失敗這個期間的文章。按照慣例，這類文集的出版，報章雜誌都要發專論，號召全黨學習，黨校的高中級幹部自然也不例外。我特請鄧力群來黨校向全體學員作輔導報告。他一共講了四次，由我在講台上全程陪同。

我未直接接觸過陳雲，不瞭解陳雲的黨內歷史，自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破格參加政治局直至一九三七年那段歷史，但在我的印象中，陳雲是一位傑出的理財家和嚴謹的經濟工作領導人。建國後陳雲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在各個重要經濟領域都有出色的貢獻，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八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大躍進」失敗後協助中央度過經濟危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所以我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曾斗膽向中央建議，讓陳雲參加經濟領導工作，因為陳雲復出工作時是具體負責政法方面的工作。我的建議刊登在務虛會「簡報」總 169 號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接着，別的小組也有表示贊成此項建議的。不久，中央決定國務院成立一個財經委員會，由陳雲任主任。這至少證明我的建議是有理由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到一九八〇年三月成立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時始告結束）。

我之所以邀請鄧力群前來做輔導報告，不僅因為他是《文稿》的編輯者，而且我知道他在「文革」前幫助陳雲做過一些文字工作，為陳雲起草過講話稿，我覺得他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比較瞭解。

鄧力群的講話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聽衆有二千餘人。鄧擅長口才，講話有條有理，能夠吸引聽衆。這次他做了認眞準備，寫了厚厚的一疊稿紙。但出乎我的意

外，對他這四次講話學員們卻有不少意見。事後校方召開座談會瞭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意見主要有這樣兩方面：

一方面是對於經濟工作本身。這些高中級幹部畢竟都有實際工作經驗，來校後又讀了一些經濟學著作，還討論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生產目的問題對他們的思想觸動很大）。所以他們在討論中特別關心經濟體制及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們說：五十年代以來特別是「三大改造」以來，我們的經濟折騰來折騰去，老是在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上兜圈子；雖然黨的文件上寫明，公有制佔絕對優勢條件下要發展一定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搞多種經營，實際上我們的經濟愈搞愈死。統購統銷，統配統售，指令計劃，說是「統一市場」，實際上沒有市場了，這樣怎麼能把經濟搞活呢？又說：現在提「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報告說「調整是關鍵」、「改革服從調整」。農村又怎樣辦？改革怎麼服從調整？調整的目的是甚麼？農民自發起來改革你能拿「調整」把它擋回去？「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對我們的經濟來說簡直是一個怪圈，二十幾年了，我們還是在原體制的這個怪圈裏折騰。總之，大家意識到我們的經濟體制確有問題，但不知道問題究竟在哪裏。那時還沒有人講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有問題，只是表達了我們的經濟之所以不能搞活主要由於計劃過死這樣一個思想。

那末，另一方面不滿的意見又是甚麼呢？最後弄清楚，是報告過於突出個人以及報告對中央領導人的不恰當的評論，包括報告人的口氣太大，等等。

在撥亂反正時期，「突出個人」確實引起了聽衆的極大反感。特別對鄧力群所說的這樣兩句話：「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

律」，這樣講反而損害了學員的熱情。學員們說：說已經發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得太高了；報告人講陳雲同志熟讀《資本論》可以，爲甚麼又要講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這樣一褒一貶是甚麼意思呢？又說：報告人說陳雲同志「政治強，黨性好，道德品質高」，這樣評論黨的高級領導人也不合報告人的身份。學員們還不滿意報告人在講陳雲經濟思想時常把自己也擺進去，說自己與陳雲如何如何，等等。

我沒有想到報告會引起這些不愉快的問題，只好對鄧力群的講話習慣（據我瞭解的）向學員們作些解釋，並指出「口氣大」不算甚麼問題，這是一個人講話的特點，同時說明鄧力群確實與陳雲接觸較多，幫助陳雲搞過一些調查研究，有親身體會，因此有時聯繫到自己也難免。

我覺得這些問題不算大，解釋一下就可以了。只是對於所謂「毛主席發現了民主革命規律，陳雲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兩句話確不妥當，我提議刪去，以免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已盡在這部書中了。修改後講稿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鄧力群同意了。

這件事我並未向胡耀邦報告，原因就是因爲我對鄧力群同志多少有些瞭解。至於後來聽說黨校學員有直接上書中央反映上述情況的，但這在黨校是常事，來黨校學習的人中「通天人物」多。有一次李一氓也對我說：「你們學員向中央告我的狀，我再也不敢登你們的講台了。」我也只能做一、兩句解釋，別無他法，畢竟向中央反映意見是學員的權利啊。

但是不久以後，我偶然從王震口中得悉鄧力群把這看成是黨校（當然首先是我）向中央寫信批評他，王震爲此憤憤不平。我對此當然感到驚訝，但也沒有十分介意，因爲我畢竟多

少知道一點鄧力群之所以爲鄧力群。至於其中究竟還有甚麼背景，或者這可能會引起甚麼後果，更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十三　一場意外的遭遇

關於眞理標準的爭論剛結束，另一場爭論又發生。我剛擺脫一場鬥爭的漩渦，很快又被捲進了另一場鬥爭的漩渦。

與第一場爭論比較起來，這場爭論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來說具有更爲深遠的意義，同時由於當時的錯綜複雜的微妙形勢，表面上並沒有形成對立的陣線，暗中的鬥爭卻隨着改革的展開而日益展開，但局勢始終曖昧不明朗。因此，這場爭論也就更爲複雜，更加曲折和困難。這裏涉及到的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自身改革的問題，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新課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於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特別提出要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進行認眞的改革。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這一點大家至少在表面上是沒有爭議的。總的方面有爭議的是：爲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要不要對現行經濟體制即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究竟如何？調整和改革的關係如何處理？改革要達到一個甚麼樣的目標？如何實行對外開放，開放可能達到甚麼程度？等等。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宣告眞理標準討論基本結束以後，這些問題就很自然地突出起來了。

這些問題本來不曾在我的腦子中兜轉。自從《陳雲文稿》問世，並聽了鄧力群的報告之後，我開始留心這方面的問題。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特別當我經歷了一場意外

的遭遇之後，我逐漸察覺到在我們面臨經濟改革這一主題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日益明顯地對峙着：

一種觀點認爲，五十年代，主要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實行計劃經濟，取得很大的成績，經驗是成功的，「大躍進」以後搞糟了，現在應當回過頭去採取那時的經驗。計劃經濟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過去的計劃經濟執行上有些缺點，主要是公有經濟集中得太多太死，沒有劃出一塊地盤（比如百分之五）讓多種經營和自由小生產有適當的發展，沒有適當的市場調節，所以現在需要提出「以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方針，以便把經濟搞活。但這不是說可以放棄計劃經濟體制，否則將離開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在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存在，但是不能發展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更不允許開辦外資企業，也不允許發展鄉鎭企業（當時稱社隊企業），特別在沿海地區，因爲這樣只能爲資本主義復辟和農民投機倒把創造條件。

另一種觀點則認爲，五十年代，我們自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基本上仿效蘇聯的模式，集中力量辦成幾件事情，如建成一百多項國營大中型企業，成績是很大的，爲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蘇聯的模式特別是它的計劃經濟體制（其本質是排斥商品經濟）已明顯地落後於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經濟缺乏活力，經濟效益愈來愈差。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找尋在中國條件下最能發展生產力（其中重要一項是能利用當代科技進步）的體制和方法。因此，單純回到五十年代的舊體制去是不適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經驗不能否定，但我們不能把那時

的經驗變成框框甚至變成一種「意識形態」而自縛手足。我們應當立足於當前中國國情的特點，立足於當前世界科技發展的新形勢，對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爲主體的條件下，不僅可以搞計劃經濟，而且可以搞市場經濟，發展鄉鎮企業更是解決農村問題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對外開放，進行國際交流，是現代經濟發展中的應有之義，社會主義經濟更應如此。對外開放（包括引進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等）應是我們長期不變的國策，閉關鎖國不可能實現經濟現代化。

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很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兩股不同的勢力。

兩種不同觀點的較量在以後各種問題上表現出來。人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會觸動地雷，或者在毫不相干的問題上會被一個方面認爲是有意反對自己。

我們所經歷的那場意外的遭遇，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發生的，不過當時我們自己未曾意識到而已。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評華國鋒並決定將他的辭職要求提交六中全會去討論之後，大約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間，當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黨校副校長馮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議，《理論動態》要寫一篇文章反駁一種議論。馮文彬不負責《理論動態》，也從來不過問《理論動態》的事，這次要求《理論動態》寫文章，並且是要反駁一種議論，是甚麼議論呢？據他說原來是這麼回事：中央批評了華國鋒，華國鋒準備辭職下台，有人對此抱不平，因此流傳一種說法，說華爲人厚道謙虛，做事也比較謹慎，未可厚非，而現在上來的新領導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夠謹慎謙虛，說話隨

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馮文彬說：這種說法可能由於不瞭解情況，也可能別有用心。書記處議論了這個問題。馮文彬特別說，陳雲同志的秘書王某也認爲需要寫篇文章批駁這種議論。馮說，文章要求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眞正的謹愼謙虛，現在我們的事業所需要的是一種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那種謹小愼微、墨守成規、害怕創新的消極情緒和作法，不是甚麼眞正的謹愼謙虛。

我對寫這樣一篇文章持保留態度。因爲一則，華本人已主動提出辭呈，按情理不宜再寫此文；再則，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評反而容易阻塞言路，顯得沒有器量。因此我頗費躊躇。但馮文彬幾次直接催促「動態組」寫這篇文章。我於是請研究史學的孫長江執筆試一試。

爲了選擇適當的角度，文章停停寫寫，一直拖了幾個月。勉強寫成後，經「動態組」集體討論，然後由我審查簽發，以《謹愼謙虛和實幹精神》爲題，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論動態》282 期上。

這篇文章我事先沒有向胡耀邦報告，因爲據馮文彬告訴我，此事已在書記處會議上議論過。文章刊出，馮又沒有同我商量，直接將文章送給《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又轉給了新華社，準備報紙刊登後向全國播發。不幾天，馮文彬找到我，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個不祥的消息，說：有人將這篇文章送到上頭去了，說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場誤會。陳雲爲此直接責問胡耀邦。胡摸不着頭腦，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馮文彬說完等我的回應。我甚麼也沒有說，轉身離開了他。對這種事我能夠說甚麼呢？

事後獲悉，這篇文章是被一位經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覺神經的人上送胡喬木、鄧力群，然後又到達陳雲手裏。文章「針對陳雲」的罪名就此成立。（這裏特別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眞可謂「立竿見影」！）

我預感到會有甚麼事件來臨。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解除胡耀邦的困境，因爲他本人並不知情，所以特地寫信如實地將此文的寫作意圖和寫作經過作了簡單說明。信請馮文彬轉送，因爲他在中南海辦公。誰料馮文彬怕胡耀邦向有關人批轉這封信，怕自己成爲責任者，因此將信扣壓未送，直到兩個月後他才將此事告訴我。爲了這件事，胡耀邦無端承受了壓力。也是爲了這件事，或者還有其他甚麼不可告人的原因，我和另兩位（孫長江和阮銘，而阮銘與此事毫無關係）則成了中央組織部特別調查的對象（以考察幹部爲名）。

時值十一屆六中全會剛開完，中央特別組織一批人有重點地到一些地區傳達全會精神。我奉命赴河北省邯鄲地區，河北省委書記李爾重也到達那裏。那時剛好我妻子病重住院，但傳達任務必須執行。爲了避開那種極不正常的氣氛，任務完畢後我無立即返京述職的心情，由一位同事陪同轉赴河南鄭州找一個清涼山區住下來讀點書。沒有多久，就接到妻子病情加重的電報，促我立即返京。

這次離京外出時間剛好一個月。回來除跑醫院外，第一件事就是找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詢問「調查」我等究竟爲了甚麼。我向他說明《理論動態》文章的來龍去脈，立意何在。宋任窮一邊矢口辯解說「調查」屬於「正常的幹部考察」，與文章的事無關，一邊卻像早有準備似的隨手從抽屜中抽出另一期《理論動態》（296 期），那上面有一篇題爲《跳出圈子想問

題》的文章，他以無聲的雄辯態度指給我看其中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如下：

「例如，曾經行之有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安排，在當時國際國內條件下，的確是比較適宜的，它的許多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把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圈子。」

我猛地恍然大悟：原來這段文字被用來證明《理論動態》第 282 期文章確有不可告人的「針對性」，確是不可寬恕的「瀆神」行爲！

《跳出圈子想問題》一文，是我外出期間由「動態組」同志所寫，我不知情，事後查問，文章的題目是胡耀邦所出，內容也經耀邦審閱，並已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我回來細閱此文，就那段文字本身來說，就文章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驗的評價來說，這裏無絲毫可以指責的地方。何況這篇文章的立意一開頭就點明：「作爲一個領導者，在作出決定時固然要謹愼從事，但研究問題必須打破思想上僵化的狀態，跳出過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問題。」這種立場有甚麼可挑剔的呢？我對這篇文章憑空獲得如此嚴重的指責只能表示驚愕不已！

由此也使我明顯地感覺到：一九八〇年改革剛剛開始，關於如何對待五十年代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的爭論也隨着開始了。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已無可逃避地捲入到這場正在展開的新爭論漩渦中去了！在靜止的空氣中，已經有隱隱的威脅，沉重的預感。

下引胡耀邦的一段談話雖是後來的事，但我要在此先一併

提一下。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胡耀邦和宋任窮爲我請求離開黨校事約我談話時，我再提到《理論動態》282 期那篇文章的事。胡耀邦說（根據當時的談話記錄）：

「你們可以說清楚這件事，文章讓大家看！我看過這篇文章，絕不是針對陳雲同志的，沒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論動態》的同志會反對陳雲同志。小平同志後來也看了這篇文章，他並沒有表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和中間，這種事可不少，從字裏行間找問題，從文字上進行猜測，教訓可不少啊！我們不能再幹這種事，不能隨便立案。說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了反對毛主席，這個案我當時就認為不能成立。」

《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在撥亂反正期間曾得到過一個評語：「政治上強」（鄧小平語）。可是現在又從另一方面得到了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評語：「文德不好，不堪信任。」眞相究竟如何，是非曲直，只好讓事實和歷史去說話了。

十四　中國政局的嚴峻而微妙的時刻已經來臨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這三年，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通過了《歷史決議》，調整了中央領導班子。在完成這三件大事以後，新舊矛盾並未完全解決，「凡是」勢力或教條主義勢力或固守舊體制的勢力仍嚴重存在，改革創新又沒有現成的方案可循，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進。因此，新的矛盾不斷產生，思想經常反覆，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又停下來看一看。在前進中不止一次地和舊的東西妥協。

爲了有助於弄清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國發生的事件，包括一些絕對不可思議的事件，我認爲有必要在這裏概括地說一說至少在我看來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國局勢的某些特點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面臨着確立新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核心的問題。就領導核心來說，鄧小平乃大勢所需，衆望所歸。在第一代領導人相繼故世前後，鄧再上再下，幾番沉浮，遭遇無數障礙，最後一道障礙是「兩個凡是」勢力，但歷史的選擇終究不可阻擋。就資歷威望而論，鄧小平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在解放戰爭後期即淮海戰役時鄧已躍居前線指揮的決策人；一九五五年調任黨的總書記後，他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已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而卓立於林彪、陳雲等之上，特別周恩來對於鄧的尊重處處讓人感覺出來。鄧小平顯然

具有一種異乎尋常政治家的氣質，那就是他在中國的驚險萬分的政治環境中不像那些深藏不露細心觀察氣候的政治家那樣，以韜藏之術保護自己，避開惡勢力，必須待確有把握於己無害之時才說當說的話，行當行之事；鄧不甘於韜藏，經常直面惡勢力，逆潮流而行，爲挽救危局而不顧一切。在黨的政治生活中，鄧受共產國際任意整人的惡習的影響也較小。歷史上，即使當王明路線猖獗之時和後來在毛澤東「一言堂」高壓之下，鄧小平也沒有同流合污或當「風派」的劣跡。

我相信將來歷史評價鄧小平這個人物時不會忽略下面這兩件事。一件是，鄧小平親自執行反「右派」的錯誤方針而後又親手平反之（儘管並未徹底平反，實際上幾乎全部平反），鄧小平親自執行反修論戰傳播極「左」思潮而後又親手糾正之（儘管沒有公開說這件事）。反「右派」與反修，鄧雖非始作俑者，卻是主要的協助執行者，因爲當時他位居總書記之職。中央反「右派」的領導情況我不知詳情，但對領導反修論戰我多少直接接觸到一些。所謂反修論戰，主要指撰寫《九評》（回擊蘇共攻擊中共的信件），正像前面提及的宦鄉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指出的，「九評」有其反對蘇共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當性的一面，但其所提出的不少論點基本上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無端攻擊南斯拉夫共產黨（其時蘇共則已經公開承認過去斯大林反南是錯誤的）更是大錯特錯。負責撰寫《九評》的「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直屬鄧小平領導。每篇評論的提綱擬出後，鄧都親臨討論、定盤子；寫成後每篇都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討論通過。我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鄧小平的，親眼看到他的明快的辦事作風。鄧小平親手辦的這兩件大事，後來又都由他自己親手平反糾正。像這樣的事，在歷

史上也是少見的。

第二件事，就經歷來說，鄧小平屬於從青年時期起就受蘇聯模式、舊社會主義模式熏陶的一代人，但是他最後成爲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敢於否定社會主義舊模式的人。當鄧小平提出要重新認識「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時，社會主義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原來是針對蘇聯模式而言，當蘇聯解體以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指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或者說就是二十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的新發展，這種社會主義要求各國按照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路。毛澤東從五十年代起就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自己的路，但是沒有成功，反而越搞越「左」。鄧小平把它連同社會主義舊模式一併糾正過來了，眞正開始走自己應當走的路。這無疑是蓋世的功績。

改革社會主義自身，重新走社會主義新路，重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件事要比依教條公式行事困難得多，從黨自身來的阻力也要強大得多。這就是我們在改革中必然要遇到磨難甚至作出某種犧牲的原因。我們不能要求鄧小平將改革的一切方面和過程都設計好，或者將改革的完整理論提供給我們，這是不切實際的。重要的是，舊模式的堅冰已經摧破，新道路已開通。就此而言，鄧小平已無愧於他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無愧於我們的時代。

鄧小平自然也有他所處的時代所賦予他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他從事的改革事業的某些方面也表現出來。單就工作作風來說，鄧小平的特點是力避煩瑣，要言不煩，思維敏捷，果斷決策，柔中有剛，舉重若輕。但決策時，有時因決心下得過

快過急而未免失之於「粗」。以「粗」臨大事，失誤自難免（鄧小平自己說過，他身後如果有個「四六開」即功六過四的評價，他就滿意了。當然，這要看以後歷史究竟如何評論他）。

一九八一年以後在確立新的領導體制和處理某些新課題時，在我看來，鄧小平至少在下述幾個問題上面臨着挑戰與考驗，而他的過人的強勢、革新的魄力，還有他的局限性，也主要在這四個問題上表現出來。

第一，在粉碎「四人幫」接着又初步排除了「兩個凡是」的阻力並確立了新的領導方針之後，鄧小平理所當然地成爲主導中國局勢的核心人物。就當時的情況，這時在組織中央領導班子方面可供選擇的主要有以下三策：一是由鄧小平出任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哪怕只任一屆），比較年輕一點的人爲輔，然後在不太久的適當時候再改由輔助者主政。這是上策。在當時局勢異常複雜並且衆多老幹部復出工作的情況下，這樣做有利於全黨意志統一和局勢的穩定，也有利於改革開放的執行；二是繼續保存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仍由華國鋒爲首的中央領導班子，而幫助其改變方針政策。這自然是下策，因爲這樣做容易使「文化大革命」的殘餘保留下來；三是立即由比較年輕一點的人主政，鄧小平等老一輩少數人（不超過三、五人）爲中央顧問，顧問不擔任現職。這是中策，這樣做雖然方向正確，但依照中國的狀況，爲時卻未免早了一點。後來實際出現的領導格局，實際上是中上策混雜而用之。鄧小平不同意由他出任黨主席或總書記之職，而讓兩位比較年輕一點的人直接站上領導第一線——胡耀邦爲黨的總書記，趙紫陽爲國務院總理；同時，以鄧小平爲代表的老一輩仍身居中央要職（中央政治局常

委排名爲：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這樣的領導格局，實際上最終決策權仍操在老一輩人手中，「第一線」的人不過負具體執行之責而已。而掌握最終決策權的人物又因深懷「我將你扶上馬，再送一程」這種不正常心態，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威和強勢。而新的領導人則時感自己是被人「扶上馬」的，又被人執着轠繩相送，自然自己不敢多作主張，只能事事請示，甚至自己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說起來令人驚訝，然而這完全是事實，胡耀邦甚至指揮不了書記處屬下的鄧力群領導的政策研究室。其次，產生這樣的領導格局，所用的仍然是個人和少數領導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的辦法，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如此，一個時候還出現所謂「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等說法。鄧小平自己曾指出：「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辦法」。（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這種做法不僅直接摒棄黨內民主，而且在黨內培育一種「鑽營」、「奉承」、「各派提各派的人」等不正常現象，有的甚至類似封建「世家」制度，連革命也成爲「世家」了，認爲只有選擇「革命世家子弟」接班才最可靠。這對黨的肌體損害極大。與此同時，對於應當退下來的原高層領導人士（俗稱「省、部級」以上）採取設置顧問委員會的妥協辦法。中央顧問委員會不僅陣容龐大，而且被賦予一種特權，如中央顧委全體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顧委常委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樣，實際上限制了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的獨立決策權和獨立工作能力。現在看來，這樣做總的方面是弊多利少。

第二，建國以來，我們不僅有經濟體制方面之失，而且有政治體制方面之失，皆由蘇聯模式影響而成。政治體制之失，

很大程度上又同中國自身的歷史條件有關，同殘留的封建主義習俗有關。鄧小平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着重指出了這一點，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八一年以後，對於既成經濟體制的改革，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卓有成效地作出研究分析，並在改革上一步一步突破，尤其在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首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是原南斯拉夫，不是中國。但我們在改革中終於也走上了這一步。這是經過了長期的鬥爭和不斷的反覆，至今也不能說認識已經完全一致。但在政治體制方面，無論在理論研究上，還是改革實踐上，則一直滯後。原因有多方面，考慮到保持黨的領導作用和保持政局穩定是關鍵。既成的政治體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在甚麼條件下形成的，其弊端的癥結何在，不從理論上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將一步也不能前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在理論上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缺乏實際操作性，因此，付諸實行則很難。看來，政治體制的改革比經濟體制的改革，其難度要大得多，也複雜得多。從實際情況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無法同步進行，所謂「同步」不過是空調頭。現在大體上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政治體制的改革只能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在保持政局穩定的條件下，逐步地進行。現在我們面臨的固然有政治體制改革本身的實際困難，也有理論方面滯後和領導上的動搖遲疑，喪失時機。一九八六年已經遭遇過一場風波，應當從這場風波中吸取教訓，這個問題留待以後再說。

第三，政治上軍事上姑置不論，這兩個領域內鄧小平的領導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經濟領域，意識形態領域，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在這些方面鄧小平的實際核心地位不斷受

到挑戰。一九八一年後，經濟改革領域內兩種不同意見的或明或暗的較量，已爲人所共見。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中，不同意見的較量往往又要保持政治上團結一致的外表，雙方在行動上都力求避免正面衝突而採取一種微妙的交鋒方式。在這種情勢下，有人趨向一方，有人模棱兩可，有人徘徊觀望。而領導人之間（主要是老一輩領導人之間）又常常不得不採取「搞平衡」的辦法。而上有搞平衡者，下必有犧牲者，即以犧牲一些人爲代價來保持團結一致的外表。上述以中上策混雜用之的辦法所產生的領導格局，實際上助成了這種領導特點。這就使得整個形勢和領導關係變得異常複雜和捉摸不定。

第四，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主張實際上起了作用，而且由此形成領導思想的某種分歧。前面交代過，這兩句話是趙紫陽在四川工作時說的，也許他並無意於作爲一種方針提出，但這兩句話確實反映了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思想傾向或行動方針。胡耀邦則不是這種精神狀態，據我所知，胡耀邦固然主張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也主張着重防「左」、反「左」。作爲一位從小參加革命的紅軍老幹部，不能設想胡耀邦會縱容右的東西，他的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就證明了這一點，這篇講話甚至證明胡耀邦警惕右有些過頭；但自撥亂反正以來，許多事證明胡耀邦在政治上同樣把「左」看作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他認爲阻撓中國進步的主要是「左」的思想情緒，是思想保守和文化落後，因此他大聲疾呼克服「左」的傾向，同愚昧無知作鬥爭。這是對於現實狀況的一種比較清醒的估計。現代化的困難和阻力主要來源於此。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三月講兩種錯誤思想傾向時，也講到：「反對和否定四項原則，有來自『左』的，有來自右

的」。（《鄧選》第2卷，第380頁）這裏所謂「左」，顯然是指教條主義而言。同年七月十七日，鄧小平《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同上，第389頁），第一次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管這個名詞是誰發明的），其本意似在於在搞活、改革的同時，在政治思想上把好關，防止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使社會主義站穩陣脚；但由於對究竟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很難作出明確的界定，沒有提出可供實際操作的政策界限，因此，此後不久，在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觀念中，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公式：反對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上的右。換言之，「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右的東西當然要反對，但是這樣一個公式，更多地爲「左」的教條主義勢力所用，他們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企圖將一部分改革道路的探索者（特別在意識形態方面敢於總結歷史教訓的人）打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列，重走過去二十年「左」的道路。這就是爲甚麼在黨內對是否要提「資產階級自由化」曾經多次發生爭論的原因（最明顯的一場爭論發生在一九八六年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時不少重要領導人主張不提這個口號，未果）。總之，在不同勢力互相較量的極端複雜的改革環境中，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很難掌握分寸，也很難預測，並且極易加深意見的分歧。後來鄧小平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他自已也終於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主張。但這已是一九九二年的事了，這時胡耀邦已經去世。

胡耀邦被選爲黨主席特別是登上總書記職位後，被迫置身於上述這種微妙複雜形勢和複雜領導關係所激起的風口浪尖之

上，承擔很大的風險，而他自身不可避免地又成爲構成這種複雜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耀邦自一九七七年以來，以他的勇於承擔風險和工作實績在幹部和群衆中贏得了廣泛的聲譽，特別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信任。他從黨校工作起步，歷經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秘書長、黨主席等職，而於一九八二年中共的「十二大」當選爲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是不是充任黨中央第一把手的合適人選？雖然鄧小平在胡耀邦當選總書記時說過「看來我們這個選擇是正確的」，但許多人還是爲胡耀邦懸着一顆心，抱着看一看的態度。

在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眼中，胡耀邦是一個富有革命熱情和正義感的人，一個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個在當政以後依然具有犧牲精神的人，一個爲人率直、敢於直言、即使在惡劣環境中也能夠保持獨立思考精神的人，一個公道正派、待人寬厚、與人爲善、好學深思、拚命工作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天眞的人，一個好像沒有多少政治機心的人，因此，信任他的人都爲他登上這個崗位而擔心。同時，他本身又確有一些弱點爲人所議論或容易爲人所乘。例如，他喜歡即興講話，講話又坦率隨便，有人對此時有微詞。上面提及的馮文彬所說在胡剛上台時就有人說這說那，就是一個證明，當時馮爲此提出要寫一篇文章反駁這些議論（載《理論動態》第 282 期），我持保留態度，原因亦在於此（這篇文章果然沒有平息那些議論，反而節外生枝，招來一場誤會，已如前述）。因說話隨便而爲自己招來大麻煩的，莫過於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見香港記者陸鏗的那次談話，這次談話在胡下台時甚至成爲他的一大「罪狀」。此外，胡耀邦還有一些弱點，如胡雖謙虛下士卻不深懂

當自己處於高位時如何擇言用人，與人為善卻不善於團結好左右，自己不太熟悉經濟卻禁不住要在這方面發議論。因這些弱點，在這樣的崗位上如果造成磨擦或閃失，除了影響工作外，很容易為人所乘，對自己造成或大或小的傷害。

還有一件事必須說一說。外面總有人傳言胡耀邦身邊有什麼「智囊團」。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恰恰相反，胡耀邦調動工作崗位總不帶自己的人馬（最多帶一個機要秘書），到哪裏工作就用那裏的人。他在中央黨校任職幾年，當他任黨主席和總書記時，沒有一個黨校的人在他身邊。他也不從中組部和中宣部帶人。他擔任總書記時，除書記處有一個研究室外，並沒有一個為他提供意見的機構，而如前所說，書記處的研究室也不聽他調遣。在他身邊經常跟他接觸的只有兩個秘書和一個警衛參謀。他沒有專設什麼供自己諮詢的人，更不拉幫結伙。有時為了起草講話只是臨時拉幾個適當的人使用，過後即散，並沒有什麼固定的寫作班子。這是胡耀邦的一個優點，有時也可能成為他的弱點。

大家承認，胡耀邦處事待人比較寬厚、寬容，為政講原則，但力避暴躁。應當怎樣看胡耀邦這種作風？中國古人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賤，賤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得以和。」又說：「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然寬猛相濟，實是一樁難事，自古以來，非大政治家莫能臻此。中國政治經過二十多年的「猛」——以階級鬥爭為綱，尤其經歷十年浩劫，社會上彌漫着暴戾之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扭曲。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的重寬容，以寬為主，以寬濟猛，事實證明，是深服民心黨心的。一九八一年以後有幾年之所以政通人和，實多賴於此。然而，樹欲靜而風

不止。一九八一年後在改革問題上兩種勢力的較量，非議改革的勢力不但繼續以整人爲業，而且實際上自成中心，自行其是，不時圖謀製造風波。他們爲此竟將胡耀邦比之於梁武帝，「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於寬者也」；說胡耀邦也是這類人物，這就是背棄「四項原則」。他們實際上對平反「右派」也憤憤不平。他們掌意識形態之權，主張意識形態領域須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爲綱。他們不斷擴大他們的整人事業，藉此遏制改革勢力的發展。在這種局勢下，胡耀邦處境之困難可想而知。

我在這裏要記下一件事，這件事看似瑣事，實非瑣事。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我寄一篇我認爲比較滿意的文章給他，徵詢他的意見，請他定奪。因爲文章中提到《晉書・堯兪傳》，我在給胡的信中順便附上這樣幾句話：「這篇傳記說堯兪的爲人，『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敢欺。』因爲厚重言寡，雖遇人不設城府，實內含威嚴，故令人不敢欺；若厚重言多，又不設城府，那就難免爲人所乘而受人之欺。」我特別提到，「總書記過去說自己在經濟上是打麻雀戰，現在地位變了，麻雀戰的方法怕也得變一變，這方面『言寡』恐怕要比『言多』適當一些。」胡耀邦後來見到我時說，他也找出《堯兪傳》來看了一遍。「多讀書好啊！」他嘆息讀書的時間少了。

我後來獲悉，他實際上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回事，他那時正在用心一條一條地閱讀剛修訂過的《辭源》，他渴望獲得「知識」，卻不大留意周圍的風雲變幻。

胡耀邦從他上台的那天起，就生活在日理萬機、惴惴不安而又患得患失的日子裏。所謂「患得患失」，就是他一時覺得

總書記的責任重大，應當有所作爲；一時又覺得這職位實際上只是虛位，想要有所作爲也難。這種患得患失心理使他雖常提出自己的見解，卻往往不能果斷行事，反而動輒得咎。他更沒有料到，當他剛登上黨主席職位不久，在召開「十二大」的前夕，竟會有人對他下手，公然拆他的台，這就是他辭去中央黨校職務，王震接任黨校校長時所搞的一場「文革」式的運動，這場運動雖整的是別人，但矛頭顯然是對着胡耀邦的。

十五　一九八二年中央黨校「搞運動」事件

「十二大」召開前夕，胡耀邦為甚麼拒絕擔任華國鋒辭掉的中央黨校校長職務並且連原任的副校長的職務也辭去？接任的為甚麼又是一位軍人？當時在人們頭腦中是一個謎。

中央黨校是黨內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在提高與統一全黨思想方面起重要的作用。所以每當歷史重要關頭，黨校都由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校長以保證全黨思想一致，如延安整風時期黨校校長為毛澤東，進城初期為劉少奇，粉碎「四人幫」後為華國鋒。現在撥亂反正僅初步告一段落，重大的變革時期眼看正在到來，在這個關鍵時刻胡耀邦卻宣佈辭去黨校職務，究竟為了甚麼？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某種壓力？

同時，在人們的心目中，無論從哪方面說，繼任者王震將軍並不是黨校校長的合適人選。黨內對於這位目前列名政治局委員的軍人並不陌生，他在黨內是一個具有特殊名聲的人物。在戰爭中他雖算不上是名將，卻仍不失為一員虎將（他的最高軍職是縱隊司令員），立有戰功，因此一九五五年獲得上將軍銜，成為我國三十七名上將之一。人們一般瞭解的他的為人特點是：講義氣，能仗義執言，好打抱不平，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時又蠻不講理，好打「橫砲」，有些居功自傲勁頭。在取得政權以後他的名言是：「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對某些特權毫不謙讓。他一生中最出名的還是執行軍墾屯田政

策，從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南泥灣開始。南泥灣的軍墾，是誰首先提出來的呢？是朱德。但是這件事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抹煞，不爲人所知，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裏說明一下。

一九四〇年開始，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停發八路軍薪餉彈藥，並封鎖陝甘寧邊區，使邊區軍民生活發生相當大的困難。這時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方針，發動大生產運動。朱德就在這時提出了著名的「南泥灣政策」，經黨中央同意，他親自組織力量到當時還是一片荒涼、人煙罕見的南泥灣實地勘探，並於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正式下令調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屬一二〇師）開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其後，朱德又多次到南泥灣視察督促。經過指戰員們共同努力，終於使南泥灣這塊荒蕪的土地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被稱爲「陝北的江南」。這件事大大地推動了包括陝甘寧在內的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並爲建國後在邊疆地區（新疆、東北等地）實行軍墾屯田提供了經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爲《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的社論，社論中說：「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總司令名字聯在一起。」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屯田政策的嘉名後來在黨史上卻僅僅與毛澤東和王震的名字聯在一起，朱德的名字不見了，這當然是不公正的。據說，朱總司令誕辰一百周年前夕，朱的秘書撰寫紀念文章披露此事，但這篇文章又被胡喬木壓下未發，說：「發了有影響，寧可向作者作檢討也不能發。」胡喬木在不少場合成爲欽定黨史的人。（按：胡喬木去世以後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始披露此事，總算是一個補救。）

王震軍墾南泥灣，同時負一部分衛戍延安之責。王雖自稱

「粗人」，但十分關心政治動態。當時適值延安整風。在鳴放的牆報上最先發現王實味的「反黨」文章並向毛澤東報告的就是王震。毛澤東極重視此事，乃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展開了批判並對其政治歷史問題進行審查。當時此事轟動延安。這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爲審幹運動有直接影響。王震因此受毛的器重，竟委他爲「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以自己沒有文化推辭，毛澤東說：「我就是要你這個文化不高的人和文化人打交道。」這裏透露出歷史上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陰暗的一面（抗戰初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共四萬餘人，絕大多數是好的，但康生等人曾估計其中特務分子佔百分之八十，是完全錯誤的）。王震自此一直稱自己是「知識分子的朋友」。後來王實味被殺，此事與王震無關。王實味的冤案一直到八十年代才獲平反。

全國解放時王震（作爲彭德懷的一部）奉命進軍新疆，後來被任命爲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鄧力群爲宣傳部長。王震在新疆執行軍墾屯田（後來統稱「農墾」）政策卓有成效，對安定新疆有功。但他在執行少數民族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肅反中殺人過多，特別是違反中央關於新疆土改押後力求穩定上層的指示，反而搶先實行土改，並擅自逮捕一批上層阿訇，使得新疆人心惶惶，政局動蕩。但他自稱「無產階級」，拒不承認錯誤。毛澤東對此大爲震怒，立即通知西北局撤銷王震、鄧力群職務，調回北京。其後王震先任鐵道兵團司令，後任農墾部部長，未曾參與中央政治軍事決策機要。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王震被選爲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文革」初期，王震與農墾部兩位副部長對立成爲兩派，打了一陣引人注目的派仗。黨的「九大」（即開除劉少奇黨籍

的那次大會），王震正式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其後再無引人注目的動作。後期協助汪東興作中央警衛團的工作，因此使他有機會得以在「老幹部」（包括被打倒的鄧小平、胡耀邦等）中間傳遞訊息。特別在林彪垮台、毛澤東示意重新起用鄧小平之後，他在周恩來、汪東興領導下，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做了一些聯絡工作。大概也正因爲如此，他獲得了鄧小平的看重，後來其地位蒸蒸日上，直做到國家副主席。

王震和胡耀邦是湖南瀏陽老鄉，兩人一向關係密切，有私人交情，爲甚麼會一下子反目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呢？對此事，一時難以說淸。記得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在接見香港記者陸鏗時的那次談話，當陸提到總書記和王震是瀏陽老鄉，胡答：「是的，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陸說：「呵！那是南北呼應。」胡答：「也可能是南轅北轍。」這雖是後話，但從這裏多少透露出兩人對當時的撥亂反正和改革的態度截然不同。還有一件事，這件事雖是從別人處輾轉聽來的，但卻是確實的，因爲告訴我的人說這是胡耀邦親自向他透露的（這也是胡的坦率處）。胡告訴他：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增補三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胡耀邦，也有王震。胡耀邦說：當時他考慮到王震同志的個人作風，考慮到中央決策權力機關的嚴肅性，同時考慮到軍隊方面可能會有意見（因當時軍隊不僅有名列王震之前的其他上將存在，而且還有大將在，他們中有的人的條件比王震更爲適合），因此向中央建議是否將王震的提名暫時擱置。但胡得到的答覆是：王雖愛打橫炮，但此人也有其可愛處。結果，胡耀邦的建議未被接納。我想，如果此事屬實（我相信此事的眞實性，因爲我聽說此事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不久，一九七九年初），則由此引發兩人之間的不睦，首先引

起王震對胡耀邦的不滿，是完全可能的。

從後來某些消息來源得知：王震出任黨校校長原本就是某股勢力針對胡耀邦的策劃；而此前胡耀邦拒絕華國鋒讓出來的黨校校長職務，在擔任黨主席後並表示不再兼黨校職務，則主要是胡耀邦本人考慮問題上的失誤，實際上是一種妥協退讓的表示。自己妥協退讓於前，別人得寸進尺於後。

中央書記處重新任命黨校新領導班子後（除更換校長外，其他人的職務均未動，任命日期爲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有人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來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準備啊！」

當時黨校內部情況是：原主持黨校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校長安子文去世後無人代替，常務副校長馮文彬纏身於中辦事務，教育長宋振庭動大手術住院，這樣，學校日常事務不得不落在我的肩上，這也就是說，當時得由我（即新校長準備排除的人物）出面與新校長打交道。爲了避免這種尷尬，馮文彬把病中的宋振庭調回來，暫時負責學校日常工作，作爲緩衝。這樣，宋很自然地成爲一個關鍵人物。馮文彬當時確實叮囑他：「要頂住！」

我並不認識宋振庭其人。宋是怎樣來到黨校的呢？

聽說宋「文革」前爲吉林省委宣傳部長，「文革」初期暫時下台，但很快又被起用，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省幹校革委會主任，負責管理下放勞動的幹部。粉碎「四人幫」後復任省委宣傳部長，但當時他在吉林省已很難立足。所以一九七七年中央黨校復校時他曾通過成仿吾（黨校顧問）表示願來黨校做研究工作，黨校沒有接受。胡耀邦任中宣部長後，想從地方上物

色一位有宣傳工作經驗的人任副部長，有人推薦宋，這樣他就來到了北京。不料當中央組織部正式就宋的任職問題向吉林省委徵求意見時，吉林省委不同意此項任命，認爲根據他歷史上極「左」的表現，不宜在中央任此類職務。這樣，他就被掛了起來。宋與馮文彬相識，這時找到了馮文彬，要求來黨校。馮文彬開始就教育長職務徵求我的意見經我推辭後，就將宋調來擔任此職，這樣也可以使胡耀邦藉此下台。但宋到任後不久就發現癌症，動了大手術，長住醫院。這次突然把他召回來，他完全明白是爲了甚麼。對他說來，這確是他生命關鍵時刻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新校長到校後，鬥爭立即展開。鬥爭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未曾報告中央書記處，未經校務委員會討論，亦未與常務副校長馮文彬商量，新校長便直接命令教育長宋振庭向中央組織部打電話，通知將吳江、孫長江、阮銘三人從黨校調出，而這三個人正是去年中央組織部以「正常考察幹部」爲名進行特別調查的對象。新校長到校的第一個動作就把他的軍人作風完全表現出來了。這次宋振庭還算「夠朋友」，他在電話中通知我有這件事，並安慰我說：「將來總會有說話的機會的。」我感謝他的好意，回他說：「校長自然有任免學校人事之權。但我的職務由中央書記處任命，任命剛剛下達，要調走也須經中央書記處同意。再說，我是校委會成員，校委員會應當開會討論這件事，把調走的理由當面說清楚。現在黨已正式制訂了有關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有話就現在說，不必等待『將來』再說。」

我不知道宋有沒有向組織部打電話，打了，也是給組織部出了一道難題。這樣，事情自然陷於僵局。

幾乎與此同時，胡喬木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鑒於馮文彬中辦事務繁忙，兼管黨校工作有困難，可調蔣南翔任黨校第一副校長。蔣南翔是甚麼人呢？蔣原是教育部部長，現已退居顧問。現在問題不在於爲甚麼要把這位已經退休的人物重新請出來，問題在於蔣南翔過去在共青團中央工作時是馮文彬的副手，現在調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其目的不必說是爲了擠走馮文彬。而胡耀邦兩頭使用馮文彬，自然給人以便當的口實，使胡喬木得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這說明，奪權的大勢已定。這大概是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初。

第二階段，從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中旬。

經過新校長一個時期的工作，並許以事成之後任副校長之職，再加上已傳出蔣南翔要來任第一副校長的消息，宋振庭的態度便轉了。他向新校長表示：馮文彬叫我「頂住」，我宋某是有黨性的，不能幹這種事，我聽王老的！於是，新校長通過宋某，再加上一位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王某，在短短時間內，利用馮文彬出訪朝鮮、我在家養病的時機，發動了一場突襲式的「運動」。這是「文革」以後，三中全會以後，在中央機關首次發生的一場整人運動，而且其方式是極不正大光明的。

「運動」期間我不在校，以下的情況是我在事後得悉的：

六月二十六日，就在馮文彬離校赴朝的第二天，新校長匆忙來校在各部、室的主任會議上宣佈三件事：(1)蔣南翔要來擔任黨校第一副校長；(2)吳江要調離黨校，屬正常調動；孫長江不進領導班子；(3)阮銘這個造反派頭頭要清除，清除後向中央寫個報告。他說：「我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大好，但我要和這個造反派頭頭較量較量。」並囑將有關阮銘「文革」初期參加

造反的材料下發，全校討論（這些材料一份也沒有發給我，因此事後我也不知道其內容）。

校長宣佈完畢就離開了學校，但他並不回家，而是住進了醫院。他身居醫院，卻不忘向外到處散佈說：吳江曾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意即吳江「也是造反派」。我在本書一開頭就指出這是一種極低劣的奇談怪論——他這寶貝大概是夢中從東海龍王那裏取來的！

運動就在中央書記處（黨校的直接領導者）毫不知情、校務委員會未加討論、中央或中央組織部並未下達任何調令、馮文彬和我均不在場的情況下，突然發動。運動選擇所謂「阮銘問題」爲突破口。奉命主持運動的宋某、王某向大家宣佈：「阮銘問題長期不能解決，文彬同志有責任，吳江同志應負主要責任」。（下面加了一句：「請不要提耀邦同志。」）

秘書長王某親自到我主管的理論研究室督陣。他再次向「動態組」同志查問去年《理論動態》第 282 期文章的寫作意圖，仍無所得。又指使理論研究室另一位負責人向大家宣佈：「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要把理研室的蓋子徹底揭開。」當有人責問「爲甚麼討論阮銘問題要宣佈吳江的工作調動，中央並沒有調令下達」時，這位負責人竟然直言不諱：爲了有利於發動群衆。

所謂「發動群衆」，除個別單位少數人搞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的勾當外，其實引來的是一片混亂和抗議，甚至對中央的情況引起猜測：是不是中央又出了問題？機關黨委擅自將攻擊、誹謗兩位不在場的學校領導人（馮文彬和我）的言論印成「簡報」上送下發，其內容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報沒有兩樣。因此，群衆的反感和責問越來越多。

運動爲時短暫。六月二十六日開始，到七月七日馮文彬回國、十二日我也返校之後就停息下來。在此以前，我對運動一無所知。我的秘書小何爲了照顧我的身體，在我留家養病期間一直向我封鎖消息。

回校後我接連向中央書記處和黨中央主席胡耀邦寫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寫於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內容是抗議這種公然違反黨章的不正常不光彩的行爲，要求中央過問這件事。因爲黨校搞運動，中央一直是被封鎖着的。

第二封信寫於一九八二年七月間，內容是向中央說明所謂「阮銘問題」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說，我是阮銘調來黨校之後才認識他的，過去只聽說過名字。胡耀邦將他調來擔任《理論動態》一名編輯，他在黨校沒有其他任何職務，更不擔任教學任務。理論研究室成立，《理論動態》劃歸理論研究室管理，這時我才見到阮銘。爲了瞭解幹部情況，我向學校人事部門詢問阮的情況，學校人事部門正式告訴我：阮在「文革」初期參加造反，後來很快被「王關戚」打倒，受審七、八年，沒有作結論，可以使用。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有一次調查來函中又問起阮銘的事，胡耀邦將函件批給我，我代表校委會責成機關黨委書記王某（也就是這場運動的主持人之一）就阮銘的情況再作調查，王某調查後仍以「阮銘問題不必作結論，中央組織部也這麼看」兩句話報告校委，我命他同時直接告知阮銘本人。我寫道，既然如此，若說這裏有甚麼「包庇」的話，那麼，包庇者不是別人，正是機關黨委書記王某本人。胡耀邦閱信後在上面批了兩句話：「讓阮銘當編輯是我的主意，文彬、吳江沒有責任。」

據我的觀察，阮好參加社會活動，好發議論，好激動，筆

頭較健。平日獨來獨往，他在外邊的活動我無法過問。後因工作需要，也爲平衡人事，安排阮銘、孫長江爲研究室副主任時，胡耀邦還特別關照我：阮不必管行政，讓他寫東西。我想這大概是發揮其所長的意思。胡確實欣賞阮的文筆，但說不上「重用」（像王震、鄧力群們所說的）。

（這裏要說明：運動期間學校機關黨委準備給阮銘留黨察看處分，阮不服，上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直說校長這樣做違反黨章。阮這人有反抗性格。而當時中紀委負責人李昌敢於接受這一申訴也是一種仗義行動。然而此舉卻觸怒了校長，他下令開除阮銘的黨籍，並揚言「不開除阮銘我不當校長」。這樣，阮銘被開除了黨籍。但當開除黨籍的決定按規定上送上級黨組織批准時，上級黨組織卻不表態。所以，這是一項未經上級黨組織批准的開除決定。）

第三封信寫於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離召開「十二大」已不到一個星期了。我在此信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黨校搞運動的經過。信的開頭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是完全背着中央領導、背着學校校務委員會、背着本人，以陰謀突襲手段進行的一場『文革』式的運動。三中全會後，中央剛平反大量冤案，而且剛頒佈的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決定墨跡未乾，在中央高級領導機關竟又發生這種無法無天的整人事件，其影響是非常壞的，它從根本上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並引起了種種猜測和思想混亂。中央黨校又是全國幹部集中之地，黨校搞運動的名聲在全國不脛而走，使人對中央新領導班子的團結再度引起了懷疑。這一事實說明，黨內搞運動，搞『文化大革命』的習慣勢力依然存在，受蘇共熏陶的黨內整人惡習依然存在，黨內出於各種目的熱中於此道的仍大有人在。」

此信語意有些激切，那是因爲我對黨內政治生活的改善有較大期待的緣故。時至今日，事實證明我在這方面的期待有些過於天眞。

七月中旬以後，動作有所收斂。校長仍留醫院，暫時無動靜。馮文彬準備召開一次校委會生活會，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生活會前夕（七月十八日），「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宋振庭以複查身體爲名也住進了醫院。進醫院那天他留給校委一封信，語氣是和解的。

七月二十日，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一百四十二名學員畢業，要求黨主席胡耀邦前來講話。胡耀邦這次拒絕前來黨校，而是把學員請到中南海去作了一次講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値得記下來，他說：

「要同一切錯誤和邪惡的東西作鬥爭，也就是要解決相信眞理與堅持眞理的關係。在我們的事業面前，任何時候都會有極端錯誤的東西、極端邪惡的勢力的干擾破壞。任何時候都不要向它們低頭和投降。歪風邪氣、醜惡現象、邪惡勢力總會長期存在的，要把他們經過幾次鬥爭就消滅乾淨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方針，是要經過緊張的努力，經過不斷的鬥爭，把它們縮得小而又小。同它們鬥爭，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在一切領域同它們劃清界限，不被它們所誘惑。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前表現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昧着良心說瞎話，犯大錯誤。有的人，風浪一來，個人利害關係一來，就經不住考驗，就向邪惡勢力投降，當俘虜，幹壞事，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後幾十年，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風大浪大概不會再有了，但在某個地方，某個單位，

則難免可能發生大風浪。作為一個革命者，要站穩腳跟。凡屬不符合黨和人民利益的事，怎麼樣也不能去幹，不能陷進去。要解決個人同黨、集體和群衆的關係。任何時候都不要把自己置於黨組織、集體和群衆利益之上。」

胡耀邦這次講話後來公開刊登在報紙上，自然不會不引起黨校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

胡耀邦講話後不幾天，八月三日，宋振庭出院。這次大概出於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出院當天又給校委寫了一封表態信，說：身體複查結果不錯，因此「心裏十分感激黨，只有以餘年多做點好事，不幹、少幹壞事、錯事以自責」。

鬥爭的第二階段到此暫告段落。

接下來就是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我作爲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從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共開十天。胡耀邦當選爲總書記（代替原來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十二大」後，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蔣南翔到任。

下面，就是鬥爭第三階段的經過。

先說兩件事。在代表大會上，新校長完全不顧事實，大叫黨校仍有「造反派」（指阮銘）在搗亂，並要求將他的發言印發大會，意圖爲難胡耀邦。書記處因其發言未經核實，未允印發。另外還有一件事是，我在「十二大」小組會上有一個發言，是關於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同組的《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約我就此問題給《人民日報》寫篇文章，我答應了。文章見報後，有人將此事報告了校長，校長連夜在電話上訓斥秦川，並用威脅性的語言責問：「《人民日報》竟敢發表吳江的文章，你們還要不要腦袋?!」聽，這是甚麼話？能做出如此「可愛的」舉動來的，除這位校長外黨內確無第二

人！而當時到任的蔣南翔則附和說：「以後校委成員發表文章事先要經校委審查。」

這一次大概經高人指點，新校長走了一條捷徑：聲言請來了「尚方寶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校長神情振奮地來到黨校召開緊急校委會，說是傳達要事，我未被通知參加。事後我間接得到了講話記錄本，記錄基本可靠，但內容卻令人捉摸不定：究竟是上頭甚麼人講的話，還是校長自己的話。我且把他這次講話摘錄幾段在下面：

> 「吳、孫、阮三個人，他們在三中全會前後寫過一些正面文章，但他們總的表現不好，在黨校工作不合適。先生不好，學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質，不能看現象，這三個人以調出黨校為宜。」「吳江、楊獻珍爭論不休，吳江自以為得勝了。吳江不一定對，楊獻珍不一定不對。」「他們寫信批鄧力群（按：並無此事，這可能就是指黨校學員上書中央反映鄧力群上次來黨校講話中的問題），可是鄧力群還為他們說好話。鄧力群是正派人。胡喬木、鄧力群是經過考驗的，還得依靠他們，不能依靠吳江等人。」

這樣一篇毫無根據、光怪陸離、不倫不類、不知所云的「妙語」，實在令人吃驚！

當時參加會議的馮文彬向胡耀邦電話彙報這個講話內容（注意：這個講話也是背着書記處搞的），胡耀邦在電話記錄稿上批道：「對吳、孫、阮等同志的問題要由黨的組織部門調查核實後作出實事求是的處理，不能個人說了算！」但是這個批件因秘書的建議而未曾發出，胡的秘書擔心這樣做會使事

情更加複雜化（其實這是過慮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中央免去馮文彬中央黨校副校長及校委委員的職務。與此同時，馮文彬告我，中央書記處決定我仍留任黨校。

得到這個消息後，我一夜未曾合眼。我反覆思考：留下來是必要的、可能的嗎？我當然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但我留下來還能幹甚麼呢？實際上已經無法正常工作，弄得不好還可能影響中央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最後考慮還是請辭離校，及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我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直接寫信給總書記，陳述我離開黨校的理由。胡耀邦和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於十月十六日上午約我到中南海總書記辦公室談話，批准我的要求。胡耀邦說了一篇話，實事求是地評價我在黨校的工作。我只提了一個小小的要求，我說，我已經過了花甲之年了，按年齡應當退下來，但由於黨校搞了一場運動，「惡名」在外，人們不明所以，所以覺得還有必要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呆一段時間再退下來，這不算是戀棧。胡耀邦同意了，當着宋任窮的面指定由中組部另行安排工作。

這樣，我離開了黨校。我在黨校工作的時間恰好是從「十一大」到「十二大」，整五年。

最後我不能不遺憾地提到，我離開黨校以後，新校長實踐他的諾言，準備提宋振庭為黨校副校長，上報中央書記處。中央書記處經討論不僅沒有批准此項任命，反而決定撤銷宋的教育長職務並調離黨校，原來準備調到文化部，但文化部不接受，所以新校長只好提出讓宋以「顧問」名義留校。宋雖以繪畫自娛，終因心情抑鬱，不久病發而亡。一個執著而不幸的

人！

黨校的事件寫到這裏似乎可以停筆了，但想了一想，覺得還有一個尾聲需要在這裏留幾筆。

我離開黨校以後，一次，前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後又曾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李頡伯同志，突然打電話叫我去看他，並且向我要一張紀念照。李頡伯「文革」後任鐵道部副部長，現在已經退下來，閒居在家，身體不大好。李是一位有名的耿直人，嫉惡如仇，無話不說。他和我們的新校長有通家之好，並且在粉碎「四人幫」時還共同參與過一些串聯工作。我每年春節都要去看他一次。這回大概是因爲他知道我離開了黨校，並且遭遇了一場風波，所以打電話來叫我去聊聊，但是爲甚麼突然要一張紀念照呢？我心中有些嘀咕。

我去了，當然要談黨校事件的過程，我盡量輕描淡寫。他聽後嘆了口氣說：「你們得罪了一幫人！你們的校長是一個『凡是派』，我最瞭解他。他不是壞人，但他可以爲人所利用。我聽說他們把你一『擼』到底，你的名字也從六屆政協委員名單上被抹掉了。」我苦笑一下說：「你眞是消息靈通人士！何止一個政協委員，就連區區一個《哲學研究》雜誌的客座編委也給抹掉了。校長並向組織部打招呼，不再分配我工作；還說要將我逐出北京，此點組織部未予同意。」頡伯「哦」了一聲，顯然他不知道這些內情。我問：「校長不是力主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嗎？」他說：「第一次小平出來工作，是周總理讓汪東興在毛主席面前提的話，這時他老人家自己已經有這個意思了。主席逝世，華國鋒上台，在粉碎『四人幫』中他受汪東興的調遣，那時也有我在內。華國鋒當上了主席以

後，汪東興是既得利益者，這時在對待小平的問題上汪東興的立場變了。你們的校長還是擁護小平出來工作的，他跟我說過，華成不了氣候。不過這個人啊，他既擁鄧也擁『兩個凡是』，『凡是』到底。他就是這樣一個矛盾人物。」

李提到『凡是』，我恍然大悟：新校長禁止黨校出版社發行《眞理標準問題討論文集》，以及示意一個刊物的記者不准在報導中提及中央黨校發動眞理標準討論一事（未果），原來其原因在此。我說：「我們批『兩個凡是』得罪了一幫子人，『罪』無可逃，那就隨它去罷，我也絲毫不後悔。」

我爲他留下了一張我和我妻子在一起的紀念照，果然是不祥之兆，隔不了多久，頡伯同志就病逝了。我想，那幾年黨內不斷發生變故，政治生活又開始不正常，可能是促使他早逝的一個原因。他最易激動，每到不能自持的地步，他的心臟承受不了過度的壓力。

十六　我和楊獻珍的糾葛，以及歷史上中央黨校為何一度成為「惡鬥」之地？

現在可以談我在中央黨校期間同楊獻珍的一段糾葛了。

黨校新校長在他的講話中說，吳江和楊獻珍的爭論「吳江不一定對，楊獻珍不一定不對。」就爭論的發生說，這講法部分地是對的，但若說「吳江自以爲勝利了」，則非事實，相反，在上述黨校的運動中楊獻珍是「勝利者」。

我同楊獻珍的糾葛，起因於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在黨校講《哲學上兩條戰線的鬥爭》，將楊獻珍作爲中國哲學界機械唯物論的代表來批判，前已說明，這樣做在政治上是不恰當的，作爲學術問題討論亦非時機。這篇講話公開發表於一九七八年第 1 期《哲學研究》雜誌上，後來又收入我的一本論集中。所以，就爭論的發生說，首先要歸咎於我。

楊獻珍一九七八年從流放地回到北京，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接連向《哲學研究》編輯部寫了三封信，用語尖銳。編輯部感到棘手，於一月十二日將楊信抄件寄給我。我於同月二十四日覆信編輯部並請他們代向楊致歉，並請他們將我下面這段話轉告楊獻珍：「我的文章歡迎批評。有的已可看出是明顯錯誤，如把楊老的哲學思想在政治上無限上綱。至於學術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不過也不必着急，現在楊老休養身體要緊。」這是我寫在信上的話，編輯部告我此信已送楊看過。《哲學研

究》於一九七九年第 3 期起連續刊出楊獻珍責問我的三封信。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我在黨校講課時（聽衆有五千多人）又一次就此事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我說：「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也是在這個講台上，我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楊獻珍同志的哲學思想時，沿用了一九六四年以來的某些過頭提法，將哲學問題上綱上線。學術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上綱上線則不對。」這篇講話公開刊登在中央黨校校刊上。

但是，楊獻珍不肯罷休。他除了將發表於《哲學研究》的三封信收入他的《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以外，還在不同場合向我提出責問，並問我爲甚麼一直不作答覆。我於是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寫信，刊登在《哲學研究》一九八二年第 5 期上。我說：「我未即覆，是認爲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還是暫時冷卻一段的好。」我又說：「我那本出版於三中全會之前的小書是準備修訂的，其中，在已經逝去了的歷史條件下的某些政治上的提法要修正，至於學術觀點尤其是爭論中的學術觀點則無須更動，我也無權更動了。」楊獻珍畢竟是老前輩，我的用語是和解的。

有關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爭論，始終是楊獻珍的一塊心病。楊獻珍否認思維和存在之間存在着同一性，並爲此嚴厲批評過艾思奇的思維和存在同一性論。但現在他不承認他否認過思維和存在之間的同一性，要別人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在甚麼地方有過這種說法。我於是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寫第二封信答覆楊獻珍，此信刊登在《哲學研究》一九八二年第 7 期上。

前面已經說過，一九八二年六月正是新校長在中央黨校發動一場運動的時候，我當時在家養病，並不知道搞運動的事，第二封信正是在這個時候寫的。事後得知，這時楊獻珍正忙於

插手黨校的運動。新校長到任後，六月十四日，楊獻珍寫信給校長，就「教學人員素質」問題提出建議，說：「不能讓那些心術不正，品質惡劣、言行不符、缺乏覺悟的人擔任教員。」這明明是露出了一股殺氣。新校長表示楊的建議「很重要」。不久，楊再寫信給校長，提出他對目前黨校狀況的看法，他說：一九七七年以後的黨校「一直是康生的陰魂不散；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換了校長，學校才得到了新生。」並作詩一首，說這樣一來《理論動態》可謂「圖窮匕首現」。楊獻珍這一番不尋常的動作，不僅對新校長「搞運動」起了支持、配合作用，而且實際上是對黨校他原有的那股勢力（黨校歷史上稱之爲「楊家將」）下了殺氣騰騰的動員令。

但我對於楊獻珍這位老革命家竟然能夠說出像「一九七七年以後的黨校一直是康生的陰魂不散，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換了校長，學校才得到了新生」這樣的話來，實在深爲惋惜。恭維新校長幾句本來未可厚非，但爲了私人利益，恭維得太難堪，難堪到顏面可以不顧，是非可以顚倒，甚至作出一副願效犬馬之勞的姿態來，實在令人感到悲哀！

我發了第二封信後，楊獻珍於同年十月十六日再發一信，這是他的第四封信了，登在《哲學研究》一九八三年第 1 期上。還是繼續追問我，要我拿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他究竟在甚麼地方講過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雖然我的第二封信就是回答他這個問題的（爲了考慮楊的聲譽，我在這信中所用的材料還是留有餘地的）。

對楊的第四封信我又沒有立即作覆，照楊獻珍的說法：又「冷了下來」。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我離開黨校後的第三年，才又寫第三封覆信。這一次我覺得應當將該說的話說出

來，包括我所瞭解的中央黨校歷史上某些「惡鬥」事件的眞相是非。我知道此信的份量，因此將信一式三份，於一九八六年四月間分送中央書記處、中央宣傳部、《哲學研究》編輯部。《哲學研究》編輯部當然要看上邊的動態，他們不敢自作主張貿然發表。直到一九八六年年中，我才得知總書記在我送給他的這封信上寫了幾句話，然後將信轉給了中央宣傳部。

總書記的批語寫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原文如下：

「轉中宣部同志一閱。中宣部有一、二位同志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似乎也有點好處。至於《哲學研究》發表不發表這樣的爭論文章，我是一點不介入的。黨內同志對待歷史上的某個爭論，如果當面說清，從此不再糾纏，當然很好，但對一些同志來說，也很難。因此我也無能多說。」

這樣我的第三封信自然被壓下了。

兩年後有人向我建議，是否可以找個適當的地方將信發表，以澄清事實。我說，當我寫此信時楊的身體還好，有討論問題的能力，現在聽說他病勢趨重，信就暫時不發了吧。這樣，這第三封信就一直壓在我的書櫃裏。

現在，楊獻珍已經作古，我也已到了風燭飄搖之年。往事已矣，學案尙存。其中是非，如果後人有興趣，就讓後人去尋覓吧！

但我在這裏要說的還不只是這件事。就歷史上學術界與楊獻珍的「三次論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問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合二而一問題）來說，我都未曾直接參與。我只想憑藉我在黨校工作期間的親身觀察，試圖弄淸楚中央黨校究竟怎樣一度成爲政治思想理論方面的一個「惡鬥」之地，原因究竟在哪裏？其中尤其關於楊獻珍與艾思奇的爭論，外界

傳聞最多，誤解也最多（在外國，費正清主編、劍橋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6）》，對於中共中央黨校糾紛的報道，就嚴重失實）。

從延安整風起，黨校以「實事求是」作爲自己的校訓，領導作風還是比較好的。解放後易名爲馬克思列寧學院，由劉少奇兼任院長（時間不長），凱豐、李卓然、陳伯達相繼擔任過副院長或院長。楊獻珍是由陳伯達推薦爲學院的教育長的，陳伯達將學院的行政工作交給了他。康生很早便插手黨校事務（一說是中央委託他照管黨校），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也曾在黨校工作過，康生與黨校的關係因此更加密切。學院於一九五五年與華北革命大學合併，始復名爲中央黨校。一九五六年楊獻珍赴蘇聯考察歸來，正式任中央黨校校長。這時陳伯達離開了黨校，康生進一步直接插手黨校事務。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之前，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是一直支持楊獻珍的。

康生和楊獻珍（特別自楊考察蘇聯回來後）一起，全部接受斯大林日丹諾夫的思想指導方針，在這方面他們可說是完全一致。日丹諾夫是三、四十年代蘇共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他的指導方針就是在各個領域，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包括自然科學領域，不斷地進行批判鬥爭，不允許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專橫、武斷，動輒將學術問題提到政治上，也就是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爲綱。日丹諾夫本人雖於一九四八年去世，但他的影響根深蒂固。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也參與學術領域的鎮壓，將不同觀點上升爲不同政見，然後加上「右派分子」、「奸細」、「西方走狗」、「蘇聯現實的詆毀者」等等罪名，將他們的名字錄入報刊秘密檢查總局的「黑名單」，從此他們的任何作品都不能發表。一九四七年蘇聯召

開了一次哲學討論會，日丹諾夫嚴厲批判了亞歷山大洛夫的《西歐哲學史》，說它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成爲「資產階級哲學史家的俘虜」。就在這個會上，他提出了所謂「哲學史是唯物論和唯心論鬥爭，並戰勝唯心論的歷史」，必須從各個時代的階級鬥爭去考慮每個哲學體系和哲學思想上的鬥爭。這樣，他就對歐洲哲學史上極大多數哲學家作了完全否定的評價，特別對於黑格爾，說黑格爾是「對法國革命和法國唯物論的貴族反動」。那時及其後，黨校大力提倡向蘇聯學習，日丹諾夫的這篇講話就成爲黨校哲學教學和哲學研究的「經典」。楊獻珍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的思想，即來源於此。楊獻珍的《甚麼是唯物主義》一書，就是這種思想的充分表現。加上五十年代黨內日益抬頭的「左」的傾向，提出「思想領先」、「批判開路」，加強思想控制等，這一切成爲黨校的辦學方針、思想理論指導方針（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未曾插手學術界的事，一般情況下中國用的是「群衆運動」、「大批判」的手段）。

與延安時期一度提倡過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針不同，馬列學院強調一字一板地學習馬列原著，教員只要求做原著的輔導，有人白首只能輔導一本原著。這種刻板學習原著的方針，不是把原著當作研究的對象，從中找到正確的精神和方法，而是將原著作爲膜拜的對象，提倡一種頑固不化的教條主義。這種方針只適於培養一批原教旨主義者，完全不可能造就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一種倒退。

馬列學院初期，一批受聘而來的蘇聯學者專家成爲教學上的主力，也是偶像，他們居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凡是自己

人講課有不按照蘇聯專家的講稿的，「有理無理三扁擔」。學院當初也擁有中國自己的一批有名望的學者，如艾思奇（哲學教研室主任）、張如心（黨史教研室主任，長征幹部）、周文（秘書長，三十年代左翼文壇領導人之一）、何其芳（文史教研室主任）、郭大力（經濟學教研室主任）等，還有幾個較有修養的老經濟學家。蘇聯專家逐漸撤走後，中國學者主講某些課程，由於觀點不同，加上各種政治運動紛至沓來，矛盾逐漸上升。學術上則主要是艾思奇和楊獻珍之爭，他們兩個人都是講授哲學的，可謂狹路相逢。楊獻珍着重於闡述一般唯物主義原理，很少講辯證法，他除了抱住日丹諾夫講話不放，就只推崇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寶庫和唯一來源，而很少顧及其他。艾思奇則似乎對專門輔導原著不感興趣，他自編講義，通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自編的講義在社會上流傳很廣。楊、艾兩人的哲學思想和教學方法都不相同，矛盾和衝突自不可免。

除艾、楊矛盾外，還有其他的鬥爭。首先是周文，在「三反」「五反」時期，楊獻珍責周文出錯，再三逼他做檢討，周憤而斃命。周文死後，何其芳不久也離開了學校。一九五六年楊獻珍又批判張如心。張如心是長征幹部，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當時負責黨史教學，但他也涉足《實踐論》、《矛盾論》的研究，並寫了幾本小冊子。張如心受批判，「罪狀」有三條：(1)蘇聯出版名人傳，張如心自寫小傳，還在蘇聯出書，均未經楊獻珍審閱；(2)一次，張如心僅以幾塊蛋糕宴請蘇聯專家，楊認爲這是對蘇聯專家的大不敬；(3)張如心鬧離婚，想再娶一個年輕女子。張爲此受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分派到上海去當一名廠長。張如心這一案例使其他學者爲之寒心，

紛紛離開黨校。有一位我認識的老經濟學家一直掛名在中央宣傳部，無事可做。

老實留在學校中授課的艾思奇，一直不見容於陳伯達和楊獻珍。艾思奇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勢遠遠不如陳伯達，但他在哲學界的名望卻要高過陳伯達，當然，也要高過楊獻珍。艾思奇一九三七年抵達延安（時年二十七歲），毛澤東慕其名，經常約他到自己住處談話，毛澤東讀艾的著作所做的筆記也拿來示人。毛澤東評價艾思奇「是一個眞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實忠厚，誠心誠意做學問。」這些，都受到陳伯達和楊獻珍的妒恨，他們爲此更容不得艾思奇。楊獻珍將艾思奇作爲他的「哲學兩條路線鬥爭」的對象。奇怪的是，陳、楊兩人聯合起來竟在艾思奇青年時期所寫的《大衆哲學》一書上作文章。

大家知道，艾思奇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大衆哲學》一書，是他的通俗哲學論文的結集，作者那時只有二十四歲，這本書在闡述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及某種幼稚自屬難免。但是這本書的出版在當時全國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青年在它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很長一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國民黨統治區打不開銷路，唯獨《大衆哲學》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國民黨區域印行了三十二版，可見它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重大貢獻。可是陳伯達和楊獻珍又是怎樣對待這本書的呢？

試看楊獻珍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文革」初期）寫給黨校負責人的一篇《申訴》材料，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馬列學院時，陳伯達同志有一次告訴我說，艾思奇這個人懶得很。艾思奇思想懶惰，從不肯花費精力勞動，只靠一本書吃飯。陳伯達還說過一個故事，他說，有一次有幾個同志在一起

談天，談到了艾思奇的《大衆哲學》，陳伯達同志說，閉着眼睛，隨便把《大衆哲學》翻開哪一頁，就可以在上邊找到許多錯誤。別的人還以爲陳伯達同志說得太挖苦了，陳伯達同志說，你們不相信，可以當面試一試。於是我找了一本《大衆哲學》，隨便一翻，翻出的那地方，就是講甚麼宇宙的事物分作兩大類云云，錯誤百出。這就是陳伯達同志對艾思奇的哲學水平的評價。」

要感謝楊獻珍，他老人家無意中爲我們留下了一份對於瞭解黨校「惡鬥」情況頗有啓示性的背景材料。

「文革」前楊、艾之爭，艾思奇被整主要有兩次：一次是陳伯達與楊獻珍聯手整艾，一次是楊獻珍康生聯手整艾。楊獻珍也被整兩次：一次是反「右傾」時，另一次是批「合二而一」。這兩次整楊都由黨中央（毛澤東）出面，康生是主要執行者（從此康楊分手）。艾思奇在兩次整楊中都不過是參加批判而已。

有意思的是，這四次批判，被批判者都是正確的，批判者則站在錯誤的立場上。

先說兩次整艾事件。

艾思奇第一次被整是一九五三年，緣於艾在授課中講的兩個觀點。一個是艾思奇在講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關係時，以中國革命產生自己的領袖爲例，說中國革命要產生自己的領袖是必然的，但這個領袖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則具有偶然性。另一次艾講矛盾論，說「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也有矛盾，因爲兩者儘管都是暴力革命，但道路是不同的。」艾思奇所講的這兩個觀點被批判爲「非常荒謬的錯誤」，由此引發對於艾思奇的教學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全面檢查與批判，說他「幾乎從來沒有認眞

研究過一個實際問題，同時也很少切實地鑽研過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這可說是典型的斯大林、日丹諾夫式的批判！這次批判還鄭重其事地以院黨委的名義向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報告。爲甚麼要報告給毛澤東本人呢？其用意看來也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關於出現偉大人物（或領袖）是必然的，恰巧某個偉大人物（例如毛澤東）在一定時間出現於中國，這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樣的觀點難道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爲甚麼是「非常荒謬的錯誤呢」？說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則是首先奪取城市，兩者不同，把這種「不同」用哲學語言表述爲「也有矛盾」，用語即使不很妥貼，也算不上是甚麼錯誤，更談不上「非常荒謬」。這種批判竟出自兩位「大理論家」之口，實在令人詫異。

尤其令人詫異的是，這次遞交中央的批判報告竟然用了大量的篇幅批判艾思奇《大衆哲學》一書，據說目的是爲了制止這本書的修訂出版。這種事如果不是深得日丹諾夫心傳的人，是決然做不出來的。

至於艾思奇的第二次被整，是在一九五六年，這時楊獻珍已當上中央黨校校長。挨整緣由是：艾思奇在一次講課中肯定了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命題。這當然觸犯了楊獻珍的「唯物論」。承認思維和存在兩者具有同一性，在楊獻珍看來，是十足的黑格爾式唯心主義囈語。正像楊獻珍後來自己所說的，他不認爲能夠「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應用到思維和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根本問題上」。他要求艾思奇放棄這一觀點，但是艾思奇（還有哲學教研室一位老資格教員，名叫陳仲平）拒絕放棄自己的觀點。正在僵持之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來臨

了。其時艾思奇正在青島養病，病尚未痊愈，就被召回北京參加運動。艾思奇回京不到十天，在楊獻珍組織動員下，有人就給艾思奇貼出了近二百張大字報，還開了幾次批判會。批判中竟然說，肯定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右派觀點、右派言論（據當時參加批判和貼大字報的人親自告訴我，當時他們對此也感到十分吃驚，但是無可奈何）。爲此，艾思奇幾乎被扣上右派帽子，大概是因爲艾思奇畢竟頗負盛名，楊獻珍有所顧忌，最後沒有給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只決定下放鍛煉；但爲儆效尤起見，卻把那位堅持自己學術觀點的老資格教員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勞動二十幾年。以上做法都是經康生同意的。

雖然這場爭論暫時偃旗息鼓，但問題並未解決。一九五八年夏天，陳伯達突然告訴楊獻珍，說蘇聯出版的《哲學辭典》關於「同一性」條，是反對毛主席的，是濫用黑格爾哲學語言的胡言亂語，授意楊獻珍撰文批判。這一下正迎合楊獻珍之意，他很快寫成了題爲《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的論文，不指名地批判了艾思奇的觀點，寄給《紅旗》雜誌。《紅旗》雜誌副總編輯胡繩也是一位哲學家，他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並且向康生談及，康生向毛澤東請示，不想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回答：思維和存在當然有同一性。這樣，楊獻珍的文章就被壓下，康生也不再插手這個問題，陳伯達更是噤若寒蟬。

一九五九年夏，我調到《紅旗》雜誌社工作，主管學術方面稿件。一次胡繩談起這件事，說是否可以請王若水寫一篇正面論述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文章，說王若水對黑格爾哲學較有研究。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和王若水打交道。王若水的文章以《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爲題，發表在《紅旗》一九六〇年第 11 期上。文章發表後，不

但黨校的人感到震動，整個哲學界都對這個問題引起了興趣，紛紛撰文討論，艾思奇也發表了兩篇論文。但所有文章都不指名道姓，只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是一場眞正的學術討論。這場討論對於提高人們的哲學思維水平，特別對於唯物辯證地瞭解哲學基本問題，克服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存在的機械唯物論傾向，有極大的幫助。

懾於毛澤東的意見，楊獻珍不敢正面表示異議，但也不甘心屈服，他於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在學術史上少見的獨特怪異的論點：他肯定「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但是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他說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前一個命題是「毛澤東同志獨立地前無古人地提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未提過，所以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大書特書，用金字記載下來」（楊獻珍語），而後一個命題則始於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囈語。

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在楊獻珍那裏，思維和存在所具有的同一性，竟不是「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無怪一向對楊獻珍深表同情的日本評論家說：撰寫《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一文，是楊獻珍「理論上的悲劇」。

楊獻珍是一位自尊心極強同時又自信達到偏執程度的人，他在學術上遭此挫折，在他一生中從未有過。從此，艾思奇被他視爲「不共戴天」的對手，連毛澤東在他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同時，楊獻珍畢竟是一個唯物論者，在一般唯物論立場上甚至是一個堅定的唯物論者，因此，當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大躍進」的錯誤已明白地顯露出來的時候，楊獻珍不自禁地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但他還是小心謹愼，他選擇了兩個邊遠地區——東北和新疆，披露他的不滿情緒。他在這兩個地區對

幹部的講話，直接指出「大躍進」中大刮「五風」，是「十足的唯意志論」，「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義」，還說了其他一些諷刺挖苦的話，這是楊獻珍講話的特點。但是出乎楊獻珍的意料，很快，這兩個講話記錄稿就落到了中央手裏。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盧山會議後，全黨展開了激烈的反右傾鬥爭，楊獻珍在這場鬥爭中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在康生主持下）。這一次楊獻珍是站在正確的立場，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和處理。一九六〇年楊獻珍被撤銷中央黨校校長職務，降爲副校長，只教書不管事。接任校長先是王從吾，後是林楓。

林楓任內，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一九六四年初，楊獻珍在授課中借用方以智的命題，提出「合二而一」論，並做了自己的一些發揮。這個命題顯然十分敏感，因爲當時毛澤東正以「一分爲二」的哲學命題作爲「階級鬥爭爲綱」的理論根據，楊獻珍卻於此時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題來。當康生向毛澤東彙報這個問題時，毛澤東立即說：這是反對我的。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並調離黨校（原定調出北京，因林楓說情，才留在北京，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並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批判「合二而一」。

不知道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前還是以後，康生在釣魚台召開北京宣傳和學術界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艾思奇也在場。艾思奇在康生發言以後並沒有說甚麼，倒是關鋒即席發言，說：「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作爲學術問題，讓大家討論。」康生表示同意關鋒的意見。第二天中宣部召開會議作具體安排，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傳達彭眞的意見，說這是一個學術問題，要作爲學術問題處理，意思是不必

馬上展開批判。散會時我問許立群，《紅旗》發不發文章？許說：《紅旗》和《人民日報》都等一等。看來，在上頭這時已經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接着，全國報刊陸續有討論文章發表。果然出現了不少肯定或基本肯定「合二而一」論的文章。討論不久，就對上述言論展開了批判。這時我才猛然想起那次關鋒發言的用意原來在此。全國各地都有人被批判爲右傾修正主義的「合二而一」論者，打擊了一大片。《紅旗》雜誌這次還算沉得住氣，沒有匆忙發表文章，過了好久才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那時我正好領受新任務離開北京去了北戴河。評論員文章是由當時新調任《紅旗》副總編輯（同時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范若愚負責組織撰寫的。

這裏要說一說我當時領受的任務。「合二而一」問題開始，毛澤東也親自介入了這個問題。他交代給陳伯達，要組織人寫一篇文章，講清矛盾、對立統一、分析與綜合等問題。先從搜集哲學資料着手，看前人、資產階級學者、馬列主義者對這些問題是怎麼講的，然後擬出提綱送給他看。陳伯達指定由我、龔育之、關鋒三人，我再拉了《紅旗》雜誌哲學組的邵鐵眞，共四人，承擔這一任務。究竟文章要講清甚麼，陳伯達轉達時也語焉不詳。毛澤東似乎將「一分爲二」看作分析，將「合二而一」看作綜合，因此他的意圖似乎要着重講清甚麼是分析、甚麼是綜合以及分析與綜合的關係——不是概念上的分析、綜合，而是客觀實際的分析、綜合。

我們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工作，七月在北京完成整理資料的工作，八月到北戴河（因爲毛澤東在北戴河）撰擬提綱，八月十日左右將資料和提綱一併送交上去。八月十八日下

午，毛澤東便找我們四個人談話，陳伯達、康生也在座。這就是後來流傳的毛澤東在北戴河接見哲學工作者的《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這次講話，我請也是湖南人能聽清毛的口音的龔育之同志作記錄，他是當時在場的唯一記錄人，我以爲講話記錄只此一本，誰料後來「文革」中公佈流傳的講話記錄比我們的要詳盡得多，這才想起當時空蕩蕩的大廳中有錄音裝置）。原來我們以爲毛澤東是要評論我們所擬的提綱。不料他一開口就說：「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學哲學的同志應當下去，今冬明春就下去。不搞階級鬥爭，搞甚麼哲學？」然後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材料收到了，提綱看了一遍，關於分析和綜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接着他就談他對分析和綜合的看法：「一個吃掉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就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世界上有甚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他說：分析在社會上就是階級分析，《紅樓夢》我看了五遍，只有用階級分析，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四大家族史，才能讀懂《紅樓夢》。最後他又歸結到：「搞哲學的人以爲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我們糊裏糊塗地接受任務，又糊裏糊塗地被打發走。這時我才弄明白，他已打消了寫一篇文章的主意，催促我們下去搞階級鬥爭，在當時就是搞「四淸」。這樣我們倒如釋重負，因爲擺脫了一個實在不好對付的難題。

現在就可以回到黨校批判楊獻珍這個問題上來了。楊獻珍是在接受大會批判後離開黨校的。黨校誰是批判楊獻珍的主力？有人想當然以爲是艾思奇，其實還輪不到艾思奇。大會批

判的總發言人是當時已調任《紅旗》副總編輯仍兼黨校副校長的范若愚，這人選是由康生決定的。就在毛澤東那次講話結束的當晚，康生打電話給范，叫他速來北戴河。康生交給范若愚的任務就是讓他在黨校批判大會上做總發言人，狠狠批判楊獻珍。爲甚麼不把這個任務交給艾思奇呢？康生直說，艾思奇書生氣太重，勝任不了這個任務。聽說，范若愚在大會上批楊整整批了兩天。而范原是楊獻珍一手提拔起來的得力幹部。

「合二而一」論的文字批判其實是草草收場，因爲楊獻珍問題已得到處理，不久「四淸」也告一段落，「文化大革命」就來臨了。

「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前夕，一九六六年初，艾思奇曾與胡繩、田家英、關鋒等一道應召赴杭州，聽毛澤東講話。這次講話就講到「彭德懷就是海瑞」這個問題。後來整理講話稿時，艾思奇因病回北京住院，不久就病逝了。所以艾思奇沒有參與談話記錄的整理（胡繩證明了這一點）。艾思奇這位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去世時才五十六歲。他的知友周揚爲《艾思奇文集》作序，說艾思奇「爲人敦厚，待人眞摯，治學勤奮，對黨和人民一片忠心。」從艾思奇的一生看，這四句話艾思奇確是當之無愧的。

楊獻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難，那主要是一九六七年以後，他被誣陷爲叛徒，身陷囹圄。在此以前，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他還寫了一份長長的《申訴》材料，糾纏過去的糾紛，包括學術爭論，不少地方仍是對着艾思奇的。這份《申訴》材料至今還完整地保存着（楊獻珍在他的《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中所刊載的，只是原文的一部分）。但是，那時無論造反派也好，陳伯達、康生也好，他們對這些已毫無興趣，他

們完全不關心楊獻珍有甚麼「哲學罪案」，而是專心於鑄定楊獻珍等人的「叛徒罪案」（即六十一人的冤案）。所以楊獻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直至身陷囹圄，並不是由於學術問題、哲學問題造成，而是在別的問題上遭人誣陷。

楊獻珍是一位老革命家，黨內有聲望的教育家，他勤奮好學能寫文章，過去有過光榮的監獄鬥爭史；如前所述，他在「大躍進」時期還表現出反對唯心主義的勇氣，這些都應當肯定，應當受到人們的敬重。楊獻珍通過政治上的平反恢復了聲譽，包括他的作爲一個哲學教育家的聲譽，以高齡之年重新爲黨盡力，或者再度闡述他的哲學見解，這些我們都應當爲之慶幸，爲之高興。

但是楊獻珍在獲得平反以後，仍耿耿於以往的人事糾紛和學術爭論，不忘記昔日的個人恩怨，對那些過去同自己有過不愉快關係的人，批評過自己的人，特別對於艾思奇，作出過分的反應。例如楊獻珍一九八一年出版《我的哲學罪案》一書，其中點名批判甚至謾罵艾思奇的地方就達一百七十處之多，甚至說出艾思奇「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和屍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能刮去」這樣的話來，這實在未免太過分了。這些自然使人感到震驚。但是按照楊獻珍的性格，同時顧念到他以高齡之年承受如此嚴重的迫害，他的這種心情也可以不必過於計較。眞正使人感到遺憾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楊獻珍在經歷「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之後，在他從奇冤中脫身出來之後，卻沒有能夠跳出個人恩怨的牢籠，從大局着眼，爲事業着想，認眞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並進而檢查歷史上黨校教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思想理論指導上的經驗教訓。學術是非的爭論固然重要，但是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說，弄清指導方針

上的是非，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尤爲重要。可惜楊獻珍沒有能夠利用他獲得平反後的珍貴餘年，把自己的認識提高到這個水平，從而對黨的理論事業做出必要的貢獻，這自然不能不使人感到是一種缺憾。

我在黨校工作的時間不過短短五年，而離開這個學校至今已經有十幾個年頭了。我想，過去在一些不正常歲月、不正常鬥爭中所積累起來的種種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人們應當已經淡忘了，應當看作是值得認眞總結其經驗教訓的歷史了。這裏不僅是一個學風問題，而且是一個黨風問題。特別在當前的特殊形勢下，我們應當告別過去的糾紛，共同致力於恢復馬克思學說的本來面目（馬克思的學說在許多方面已經被歪曲了，被教條化了），恢復馬克思主義者的本來面目（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墮落成爲原教旨主義者），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點出發，重新開闢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途徑——這就是我最後想說的話。

十七　打開全面改革的大門所遭遇的風浪

離開黨校，已進入一九八三年了。一九八三年是打開全面改革大門的一年，是關鍵性的一年。

我離開了黨校，算是離開了政治漩渦的中心，但仍處於漩渦的邊緣。自從我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以「正常調動」名義在一個單位離職，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到另一個單位重新任職，其間投閒置散又整整兩年零八個月。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又戲劇性地度過了「後文化大革命」的三個年頭。這是託那位「善解上意」的組織部長宋任窮之福，他不顧在總書記面前許下的諾言，又賜給我三年「靠邊站」的時光。

我的住處並沒有搬遷，還是住在離黨校一公里之遙的一幢小樓裏（也是黨校宿舍），那裏環境幽靜，離頤和園這座皇家園林又近，每天早晨可以步行到那裏去鍛煉身子，眺望那剛修繕好的排雲殿和霧氣濛濛的昆明湖。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著名史學家王國維曾自沉於此，時年僅五十歲。

我對王國維自沉的史實並不太瞭解，當時無事，就去翻翻有關史料。王國維是入民國後中國新史學的開山人物，陳寅恪等繼之，然後郭沫若又別開生面。王氏曾東遊日本，又曾研究西方的文學、哲學，加之王氏見到的地下史料，如甲骨文、漢簡等，爲前人所未見。所以王氏雖繼承乾嘉史學，但遠非乾嘉諸老可比，其學識已由舊入新，而又主張維護中國文化特性。

王氏曾爲末代皇帝溥義師，任「上書房行走」。對於王氏自沉的原因，史學家陳寅恪曾有以下分析：王氏覺軍閥混戰的民國還不如晚清的政局，變法維新雖好，但清廷坐失時機，以致傾覆，社會制度既變，其原有的思想便無所依恃，因而不得不死。王國維死時，陳寅恪曾撰輓聯，其內容哀感動人，玆錄之於下：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勝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下聯係指王氏遺言托陳寅恪整理其書籍文稿。由舊入新，總不免會有種種悲喜劇演出。康有爲、嚴復也是此類人物。

我的宿舍離新工作單位不遠，步行一小時即可到達。安步當車，環顧四周景色，也常想及今之由舊入新者較之彼時又另有一種表現。現時的舊東西較之過去的要頑強多了，那是因爲現時的敎條主義權威畢竟要超過乾嘉之學的緣故。

新工作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被稱爲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辦的高等學府，我在那裏掛一個副院長的頭銜。這個學院創辦於一九五五年，從創辦至我到任，學院一直屬全國政協常委會領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學院第一屆領導成員：院長吳玉章（中共）、副院長：柳亞子（民革）、楊明軒（民盟）、聶眞（中共）、千家駒（無黨派）等。人選也是適當的，體現了這個學院的性質。反「右派」鬥爭後，學校的統一戰線運作基本上陷於癱瘓。「文革」中停辦。目前正處於恢復籌建階段。我到任後不久，不知道出於甚麼理由，領導關係突然改變，學院脫離了全國政協而歸屬於中共中央的一個部——統戰部。然而這樣一來，實際上等於改變了學院的性質。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正値新老交替、領導人員變動頻繁之際，這個

問題根本不在領導層的視野之內，新領導人亦不明事情的究竟。這種不正常情況就這樣一直拖延下來。我去的時候，學院尚無校舍（舊的校舍被佔，新的正待動工），是寄住在別的學校，每年只舉辦二、三期短期培訓班，我每期至多去講一次，所以有更多的時間看書寫作；同時，因爲仍處於漩渦的邊緣，所以有時風浪的波及仍不能倖免。

我們的改革實際上從一九八〇年開始。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一九八四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爭論的風浪逐漸大了起來。

一九八三年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提出了全面系統的改革開放；二是開展了一場所謂「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也就是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是提出了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目前究竟處於甚麼階段的問題，醞釀着一場爭論。這三件事意義深遠，揭開了貫串於整個改革過程的複雜鬥爭的序幕，其內容在不同的條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出現。

這三件事，第一件我只是旁聽者或旁觀者；第二件所謂「清除精神污染」，事關重大，也涉及到我；第三件，有關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爭論，我是直接參與者，作爲爭論的一方，但這場爭論直拖到一九八五年才公開進行，所以要放在下節敘述。

第一件事，或說第一次鬥爭，由胡耀邦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關於《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所引起。這次講話第二天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摘要刊載，標題是：《搞四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次講話實際上是傳達鄧小平

跟胡耀邦的一次談話內容，主要提出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及有關的政策性意見。胡的講話說明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目前就要全面而有系統地、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所謂「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子、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同時指出，「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複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於這一點，中央決定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試驗，這就保證我們不會來回折騰和產生混亂。」

講話指明，前幾年我們主要在農業方面進行改革，其他方面還只是小改小革，沒有全面觸動根本性質的問題。他在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之後，強調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缺乏活力，不能歸咎公有制本身。誰如果在這方面有懷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問題主要還是在於落後的經營管理方式。」由此提出，根據這幾年某些地方的試驗，城市工商業也可以搞「以承包爲中心的，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互相結合的，職工福利和勞動成果相聯繫的經營責任制」。這就是要求城市工商業也開始進行全面的體制改革。

這個講話，引起了關於目前是否要進行全面改革，目前應當是改革服從調整，還是調整服從改革這個問題的爭論，引起了改革者內部的意見分歧。

在講話以後的一次高層會議上，胡耀邦受到陳雲同志的強烈批評和責問，說：「還要不要『十二大』的決議？」所謂「十二大」決議，是指「十二大」關於《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報告中下面這段話：「在一九八一年到

一九八五年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同時要鞏固和完善經營管理體制方面已經實行的初步改革，抓緊制訂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的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廣泛進行企業的技術改造，逐步展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這裏要補說一下：「十二大」政治報告雖由胡耀邦負責，但報告的起草工作由胡喬木主持。據我所知，胡耀邦對胡喬木一向很尊重，特別在文字工作方面。但胡喬木卻不是虛心對待。報告起草過程中，胡耀邦曾對草擬中的報告內容提出過不同意見，主要是經濟部分，胡耀邦表示不甚滿意，但他的意見被胡喬木頂回去了。胡喬木當着全體起草人的面對胡耀邦說：「耀邦同志有方針性意見可以對我說，具體問題就不必過問了。」事後看來，像前面所說的，「十二大」報告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的提法偏於保守，沒有完全擺脫教條主義（例如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有些問題則帶有明顯的妥協性質，各方面可以各取所需。上引那段話自然可以解釋為全面系統的總體改革須待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才開始進行，而現在你胡耀邦竟然擅自修改決議，宣佈提前行動！

究竟是胡耀邦擅自行動，還是當時改革的形勢特別是農村改革的形勢已經逼人，城市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

這個問題本來可以在會議上平心靜氣地討論，重新分析當時的形勢和重估「十二大」決議的某些提法，得出恰當的結論。然而據說，當時在會上責問者怒氣未息，胡耀邦無以應付，其他人沉默不語。最後鄧小平說了句「到此為止」，會議就不歡而散了。

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爲止」。會後，胡喬木不知道執行誰的旨意，未經高層集體討論，亦未向胡耀邦請示，竟爲胡耀邦這次講話起草了一份中央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通知，送胡耀邦簽發。這是完全對着胡耀邦來的，叫胡耀邦自己吞下這個苦果。胡耀邦無奈，只好將此通知送鄧小平。此事後來被鄧小平制止。鄧小平說「胡趙體制不能動」，即指此而言。

一場實際上的「拆台」行動被制止。包括城市在內的全面系統的改革卻由此正式起步了！

這件事明顯地暴露了在改革問題上兩股勢力的較量，胡耀邦首當其衝。按理，胡耀邦剛上台不久，老一代領導人中間，即使有人對胡耀邦的任職持保留態度，但爲大局着想，此時完全不宜行「拆台」之事，而以善意幫助爲正當。不耐心觀察，不善意幫助，稍不遂己意便疾行「拆台」，只能使矛盾激化，政局動盪。此實非老一輩領導人所當爲。

另一方面，平心而論，這次事件確也暴露出胡耀邦處事作風上的弱點。作爲總書記，胡耀邦有責任在決定重大問題或公佈中央準備實施的意圖之前，以會議形式或其他形式徵詢、溝通、協調各方面（尤其是黨政領導人），取得共識，然後付諸行動。特別當情勢發生變化需要改變原來決定的步驟時，更應如此。但是，胡耀邦卻未經必要的磋商（在主要領導人之間）就將重要決定公諸報端。而當時黨的另一位重要領導人、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又出訪未歸，趙又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負責國家經濟事務。由此益見胡耀邦的倉促宣佈是不適當的。我彷彿看到這時的胡耀邦仍是五十年代團中央時代的胡耀邦。

至於關於城市改革的具體做法方面的不同意見的出現，是完全正常的。例如，胡耀邦原主張城市工商業的改革也從「承

包」着手，首先把勞動者的勞動同生產成果緊密地聯繫起來，把責、權、利三者結合起來，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趙紫陽則主張從「利改稅」着手。最後經過討論，胡耀邦表示尊重趙紫陽的意見，決定按趙的主張辦。總的說，胡耀邦這個人雖然好出主意，但並不固執己見，特別在經濟上，在領導層。這一點卻很少爲人所注意。

但總的情況是當時出現了一種朕兆，預示「十二大」建立起來的領導體制相當脆弱，改革上的分歧和領導危機隨時都可能發生。

第二件事，即所謂「淸除精神污染」又是怎樣發生的？它究竟包含一些甚麼內容？這當然是對於我們的進程和政治環境發生重大影響的問題。這裏我將用較多篇幅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九五六年中國以自己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消滅了社會剝削現象。但是從八十年代開始，農村改革勃興，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農村興起了一種將集體土地分配到戶，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爲中心，同時又有集體統一經營的新的農村體制。被束縛多年的農民的手腳放開了。農民手腳一放開，就像雨後春筍似地在原社隊企業的基礎上興起了大批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同時又出現了一批小規模的私營企業，還出現了私人商業和長途販運商販。這樣就又開始產生了某種僱工剝削現象和投機倒把行爲。農村中的能工巧匠，有技術，自己幹不過來，請了幾個幫手，就算僱了幾個工吧，被僱的人心甘情願，說這樣大家都可以多得，沒有他來僱用，自己不會幹，就甚麼也撈不到了。可就有人說這是僱工剝削，走資本主義道路。

一些人對此惶惶不安。社會主義竟然產生了僱工剝削現

象，這還了得！他們認爲這是污染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變質的嚴重現象。於是頻繁派人下去調查鄉鎮企業和私營小企業及私人商業中的剝削現象，隨後「大事不好」的警報像雪片一樣飛來。中央領導人雖然提醒說對這種現象要「看一看」，要從搞活經濟角度耐心觀察分析，不宜大驚小怪。但是，一些人硬是製造聳人聽聞的輿論，非議叢起。

與此同時，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灰色陰暗的東西。有些作品宣傳色情，甚至出現了淫穢書刊。某些報刊傳播西方資產階級一些腐朽沒落思想。在一些人中間，產生「一切向錢看」的傾向。這些不健康的傾向自然應當引起注意，及時加以清理，像後來的「掃黃」行動那樣（注意：「掃黃」行動爲人民所歡迎，卻絲毫未引起社會震盪）。

此外，在理論界，在報刊上，有少數幾篇討論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的文章，這完全是另一類性質的問題。我已經說過，「文化大革命」這種極少見的現象，其腥風血雨遍及各領域，引起人們從多方面思考問題總結經驗教訓，這決不是一個《決議》所能夠代替，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這一段歷史的種種現象將引起今後幾代人的深思。理論界提出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來討論，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是理所當然的。試問「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沒有權力異化及其他種種異化現象，人間何處才有異化現象？人道主義問題也是這樣。雖然人們談論這些已是痛苦多於憤慨。當時最先提出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來的，我記得是周揚和王若水。王若水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我未曾見，但我可以猜想他寫這方面的東西不及他寫哲學文章那樣冷靜說理，不免帶雜感性質。周揚的講話和文字就不同了，他對這個問題是經過認眞思索，可謂深思熟慮，文字也是冷靜說理的。

周揚在「文革」後最先談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請他到黨校來做報告的那次，也是由我在台上陪同。那次他講了整整一個上午，題目是《解放思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最後部分就專講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講畢下來他問我的意見，我說，異化問題你不是早在一九六四年的一個報告中就講過了嗎？我指的是一九六四年當我們正在寫「反修」文章時，一次周揚把他的報告稿送陳伯達審閱，其中就提到異化問題，說的是修正主義者把人民所賦予的權力變成了人民的異己力量。這個報告稿當時在陳伯達那裏通過了，後來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裏也通過了。這次周揚講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所實行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把人民所賦予的權力，黨所賦予的權力變成了人民的異己力量，黨的異己力量，是完全正確的。這次講話記錄稿由周揚自己改定，原擬登《理論動態》，後來我考慮到這個問題比較敏感，改登在校刊上。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是馬克思逝世百周年，黨中央舉行隆重的紀念會，由胡耀邦作報告。在此之前，三月七日，學術界召開了一個學術討論會，由周揚做主題報告，題爲《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這個報告稿事前送中央各有關領導人看過，當然包括胡喬木在內。這報告比上次講話更着重地講了異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問題。會議圍繞着這兩個問題，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幫」以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人道主義爲名，實行滅絕人性的、慘無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

討論會在中央黨校召開，我已經離開了黨校，當然不可能再去參加會議，但周揚的報告稿很快便到了我手裏。周揚在那

裏究竟講了些甚麼呢？因爲不久之後展開了一場批判，胡喬木把提出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看得非常嚴重，認爲這是故意誹謗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胡喬木還專爲此寫了一篇批判長文。正因爲這樣，我倒越發覺得有必要將周揚所講的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論點摘錄於下，一爲存眞，二爲供後人評論。

——**關於人道主義**。周揚說：「一個時期裏，我國不少青年學生對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流派頗感興趣。這種現象，我們應該認真引導。我認為，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才能真正克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觀念去說明和解釋歷史。儘管這種人道主義學說，對舊制度的抨擊，也曾經顯示出某些激動人心的力量；對歷史的認識，也有過片斷唯物主義的見解，但總的說來，未能跳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框框。作為整個思想體系，未能成為科學。」「我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的體系之中，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包含着人道主義的。當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關於「異化」**。周揚說：「在馬克思主義中，人佔有重要地位。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異化』是一個唯物辯證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義者可以用它，唯物主義者也可以用它。

黑格爾說的『異化』，是指理念或精神的異化。費爾巴哈說的『異化』，是指抽象的人性的異化。馬克思講的『異化』，是現實的人的異化，主要是勞動的異化。關於『勞動異化』的思想，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詳細的論述。後來，他把這個思想發展為剩餘價值學說。這在《資本論》中說得很清楚。那種認為馬克思在後期拋棄了『異化』概念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肯定人的價值，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毛選》第 1516 頁），那就要肯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異化。承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反對異化，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社會主義消滅了剝削，這就把異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的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所以，「異化」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用不着對這個名詞大驚小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當不害怕承認現實。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自然，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們也是完全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來克服異化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本身，而是我

們體制上的問題。」

可以看出，周揚爲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作了用心良苦的辯護，但胡喬木等仍認爲是叛逆之作。周揚報告後，胡喬木通知《人民日報》不得刊登周揚的報告。周揚本人對此並沒有表示甚麼，但當時身爲《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負責理論版的王若水，自作主張抗命將周揚的報告全文發表了。這首先刺傷了胡喬木的權威神經，使正在醞釀着的鬥爭加速到來。

幾乎與此同時，黨校的同志告訴我，學校剛傳達了胡喬木的一個講話，其中有這樣兩句話：「資產階級正在捲土重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已佔了主導地位。」我想，形勢果然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了嗎？那時我又像「文化大革命」時期一樣已經不再去看文件、聽報告，只翻閱手頭的幾份報紙，聽到的消息也少了。但不久我終於得知，一場運動又來臨了。這場運動就是所謂「清除精神污染」，來勢相當兇猛。

中央的講話事先好像是有的，但是並沒有說要搞這樣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央或書記處並沒有出面部署運動，好像只是由中央宣傳系統向下進行部署。唯一公開見諸報端的「清污」動員報告，是中央黨校校長在南京的一次講話。

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宣佈後，引起了一片恐慌，因爲誰也弄不清「清除」甚麼，「清除」的界線在哪裏。首先是農村和城市工商業界，以爲改革搞錯了，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了，「反右傾」又來臨了，因此紛紛準備退卻。中央見此情景，首先是萬里站出來說話：「農村改革沒有污染問題」，接着是趙紫陽站出來說話：「經濟領域，包括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沒有自由化。」這樣一來，才算把經濟領域這一頭穩定下來，這使運動發動者實際上喪失了他們原定的主要目標。

但是，「清污」一直擴大到人民群衆的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一些純屬個人興趣愛好的東西被橫加干涉：一些歌被禁唱，一些電影、電視片被禁演，裸體雕塑被砸碎。有些工廠門口站上崗，宣佈留長頭髮的、穿異裝奇服的男女工人不得入內。《瞭望》周刊封面登了中國女體操運動員（世界冠軍）在高低槓上的動作照片，也被一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收繳了。這股風同樣波及到部隊，聽說有的連隊宣佈收繳「淫穢照片」，戰士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上去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污」搞到這種程度，中央不能不出來宣佈收場。運動持續時間約達兩個月。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胡耀邦接見團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團委負責人，有一篇講話，說到這次「清污」由於一開始沒有劃清政策界限，所以「許多地方走了樣」，有的搞到普通群衆頭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衆生活方式中純屬個人愛好方面去了。胡耀邦說了這樣一段意義深長的話：

> 「走樣子的實質在甚麼地方？就是用『左』的東西或者用守舊的觀點，用封建主義的觀點，去對待清除精神污染。這是萬里同志提出來的，我覺得他提得很對。一個『左』的東西，一個封建主義的東西。前天書記處會議上，楊尚昆同志說：我們許多東西一做起來就採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造成了很大損失，把文物古跡都橫掃了。『文革』後，撥亂反正，已經過了五年，怎麼還搞『左』的東西，還有封建主義的東西？有封建主義思想的人對現代、對現代世界各國的東西都看不慣，還要把社會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聽！一個「左」的東西，一個封建主義的東西，藉着所謂「清污」，又威臨到人們的頭上了！

胡耀邦的講話還沒有提到文藝作家的作品、學校教員的講稿普遍遭審查等類事情，在這方面，又出現了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搜查、整人的現象。

胡喬木置這一切胡作非爲於不顧，全力對付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他專門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爲他撰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書，批判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中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觀點。此書於一九八四年一月正式出版。

胡喬木確有令人敬佩的文才，這本書雖非他親手一字一句寫出，但也絞盡了他的腦汁。但在我仔細拜讀他的書以後，卻深爲胡喬木惋惜：胡喬木固然不失爲起草遵命文字的大手筆，具有政論家才幹，但理論思維確非其所長，在理論上，胡喬木不及毛澤東的另一位大秘書，亦稍遜於周揚。

周揚的文章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內容，並且由此出發，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分析與批判，但仍從根本上捍衛了社會主義制度。胡喬木的文章卻竭力迴避我們剛經歷過的十年災難歷史及其慘痛教訓，以及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提出的新問題，好像一切都未曾發生過，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一切照舊，我們只能反覆背誦蘇共黨史教程中所說的那些話。胡喬木的大作，在理論上，在一般意義上，通篇讀來倒也是馬克思主義語言或近似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許多對於資產階級抽象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的批評似乎也是對的，但是對於我們這裏曾經長期存在過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和政治專制及運動中發生過的種種惡行的性質，卻避而不談，究竟這裏有沒有連資產階級的

人道主義也不如的東西？封建法西斯主義是否也是一種政治異化、權力異化現象？這裏，連討論的餘地也沒有留下一點點。作爲一個多義詞的人文主義提出後，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係一直糾纏不清，如今胡喬木又提出作爲世界觀、歷史觀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和作爲倫理道德觀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兩個概念來，更加令人神迷目眩，而其目的只是爲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這個概念。究竟馬克思主義應不應當有自己的人道主義觀？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正是胡喬木等大談我們的社會主義已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時候，所以他對異化問題的立論也由此出發。但是他們忘記了，即使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也是有舊社會的多種痕跡存在的呀。

就說共產主義吧，共產主義是否有自己的人道主義呢？這裏我們且引用馬克思自己說的一段話。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說：「共產主義，作爲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爲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眞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馬恩全集》第 42 卷，第 120 頁）這也算是對於共產主義人道主義的一種解釋吧？貫徹人道主義原則，不是要求別的，只是要求我們維護人類的最高利益並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注意：人與人類生存環境的關係現在正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與威脅。）

對於異化問題，胡喬木在理論上顯然力不從心，有時甚至把自己置於非常可笑的地步。試舉一例：

爲了說明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已打算把異化的概念

拋棄，胡喬木小冊子初版本提出了一個證據：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第1卷原使用異化概念有四處，而馬克思於一八七二年親自修訂出版的法文版《資本論》第1卷，删去了德文版中原有的三處異化概念，只保留了一處。胡喬木據此認爲，這是證明馬克思自己動手把異化概念捨棄了大部分，即四分之三。但是，胡喬木卻沒有去查一查，經馬克思自己於一八七三年（即在出版法文版後一年）親自修訂的《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第2版，以及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最後校訂的《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第4版，德文初版原有的四處提到異化概念的地方均照舊保留不動。而且恩格斯一八九〇年最後校訂《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第4版時，還特別說明：他的校訂再一次對照法文版和根據馬克思親手寫的筆記，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補充到德文版原文中去了。

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馬克思在修訂法文版《資本論》第1卷時，是考慮到法國讀者對於德國哲學術語不大熟悉，所以「異化」一詞只在一處使用，而把另三處改用了別的但是意義相同的表達方式，如此而已！同馬克思此前有些著作比較起來，異化概念在《資本論》中確實使用不多，這不是因爲別的，只是因爲整部《資本論》的剩餘價值學說，都是在實際闡明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問題，異化概念就包含在剩餘價值這一概念之中。

這彷彿只是一件小事，但對於這種「小事」的疏忽顯然表明胡喬木這篇「反自由化力作」本身，其「自由化」的臆斷實在不少。可以率直地指出，無論從政治上或從學術上看，胡喬木這本小冊子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

自從讀到胡喬木爲十一屆三中全會起草的那個講話稿以

後，我一直覺得胡喬木好像被一種甚麼幽靈糾纏着，他一直沒有能夠從這種糾纏中擺脫出來。

還有一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必須在這裏提一下。胡喬木批判周揚的小冊子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出版，同月二十六日（一九八四年春節）胡喬木寫了一首詩給周揚並致問候。其詩曰：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癒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
更美了：擁抱着一對戰士。

我不想去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胡喬木這個人做出的像這一類讓人弄不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這次「清污」的目的之一是要藉此改變《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在「解決」了中央黨校的理論工作班子之後）。爲此，鄧力群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中旬召開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集中批判了王若水近年的言論。十月二十八日就宣佈調整《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撤銷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胡績偉也受到了批評。按胡喬木原來的計劃，是打算派他所欣賞的一個人前去接替王若水的職位。此項計劃因未獲胡耀邦同意而未能實現（胡喬木所欣賞的那個人後來被安排去負責黨史研究班子）。

這次令我最爲感慨的還是周揚的遭遇。周揚從三十年代

起，一直是我黨文化文藝事業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一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文藝評論家。十年「文革」，八年楚囚，復出後已兩鬢滿霜，但才思不減，豪情依然。周揚是我的前輩，雖然年齡不過大我十來歲。一九三九年當我從陝北公學轉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研究班的時候，周揚是班主任。相處不久，我到敵後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去了，從此一別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們才在張家口再見面。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的一九四八年，晉察冀邊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周揚任華北局宣傳部長，我在那裏編輯華北局黨刊《建設》周刊，這樣又碰在一起了。但時間很短，進城後周揚很快便離開華北局，到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這些部門去工作，此後又很少見面。不料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五屆全國政協會上，我們又相逢，並且同在一個組——社會科學界組，周任組長，薛暮橋和我是副組長。組內有季羨林、容庚、唐蘭、陳岱蓀等不少名學者。關於周揚，這時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的坦率眞誠的自我批評、自我解剖精神，他鄭重地總結歷史經驗，毫不文過飾非，對於過去因同他工作有關而蒙受冤屈的同志，他誠懇地一再表示歉意，特別在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會上，他向數百名作家坦誠檢討，賠禮道歉。這需要眞品德和大勇氣！另一方面，是他在再次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和文聯主席後仍勇敢地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稱讚眞理標準的討論是繼「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之後中國現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爲了瞭解討論經過及其中的曲折，他還專程到我宿舍長談一次。那時恰逢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他爲召開一次盛大的紀念會特組織一個籌委會，並邀我參加，雖然我非文藝界人士。他說，魯迅是你們紹興人，也是浙東人，浙東自古

是出史學家的地方，他們重視歷史經驗。從歷史上看，歷史本身就是從錯誤中走過來的，我們黨、我們自己也是從錯誤中走過來的。

黨校事件中，黨校校長曾警告周揚不要爲被整者說好話，這樣，我們之間的接觸就暫時少了。但我萬沒有想到胡喬木會在這樣的問題上對周揚下狠手。周揚受此打擊，加上八年牢獄折磨，身體漸漸不支，以致一病不起。他無知無覺不言不語僵卧病床數年，最後終於撒手而去。

我自己呢，前面說過，這場運動也波及到我。我已離開了黨校，但是黨校領導集團仍不肯放過我，他們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專門組織了清查小組，清查我的所有講稿、講話和文章。在我的一生中，這種遭遇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一次。這場清查運動因群衆的抵制而草草收場，對我的清查據說也不了了之。我能夠說甚麼呢？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爲山西《晉陽學刊》（一九八九年第 2 期）寫過一篇《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片斷》，其中提到這次遭遇，公開聲明我的態度，我說：

「在這種場合，我的立場只能是這樣：甚麼有權的人如果有興趣查我的東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錯誤言論（或曰「自由化」言論）自然歡迎批評，我自己對黨對人民負責，也要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但如果沒有錯誤，或者按照黨章國法我有權在一定問題上說出自己與別人（任何權威人物）不同的觀點，若有人因此發表這樣那樣的攻擊性評論，或者製造這樣那樣的讒言，或者施展手段造謠誣蔑說不倫不類的話，或者明裏不說暗中卻變着法兒整人，那就讓他們說去，讓他們整去，我也一句話不收回，——這

就是我的態度。除此之外，我別無選擇。共產黨人隱瞞自己的觀點或者毫不顧惜自己的獨立人格而看風駛舵，是可恥的。」

十八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目前所處歷史階段的爭論

雖然迎面撲來的風浪強勁，全面改革的大門還是撞開了。從一九八三年開始，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並以城市爲重點。撞開全面改革的大門的，自然是具有剛毅性格的鄧小平。胡耀邦一月二十日的講話只不過是傳遞了一個訊息。

全面改革的大門一打開，調整服從改革還是改革服從調整的爭論自然最終解決了。現在提到面前來的是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理。「十二大」報告所提的「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依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計劃、小分散」。從一九八三年開始，「不能光搞計劃經濟，也要搞點市場經濟」的問題提出來了，這是鄧小平再次提出「市場經濟」，並確定已創設的經濟特區要以市場經濟爲主。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這裏所說的商品經濟，按我的理解，就是市場經濟，或可以稱之爲商品市場經濟。《決定》並指出中國現時的經濟應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求目前必須「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注意：按我的理解，後來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法的延伸，兩者並無原則性

的區別。這裏所謂「有計劃」，並非保留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作爲體制來說，兩者不能並存，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吸取計劃經濟的某些優點，例如，有計劃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不可缺少的，是其重要內涵之一。）

特別要提一下，負責起草這個《決定》的已經不是那兩位據說是「中央非依靠不可」的人物了，從此以後，他們永遠退出了主宰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位置。這個《決定》是由胡耀邦、趙紫陽親自主持另組班子起草的。

現在提到面前來的突出問題是：中國的改革是循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呢，還是脫離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狀況究竟怎麼樣，它正處於一個甚麼樣的歷史階段？這個問題已成爲改革所面臨的最根本性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如果不明確地予以回答，改革將很難取得人們的理解，因此改革也將難以理直氣壯地進行下去。

因此，這是一個非解決不可的重大的理論問題，它的正確解答將爲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提供理論基礎。

有人說：《歷史決議》不是已確定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尙處於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嗎？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明確地解決了嗎？

否！《歷史決議》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這裏反而爲教條主義者和「左」傾共產主義者留下了一個可鑽的空子。

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是按照《哥達綱領批判》和《國家與革命》兩書，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爲兩個階段：實行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和實行按勞取酬的共產主義第一階

段或初級階段。列寧後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稱之爲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從馬克思到列寧，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嚴格劃分的，過去我們也是這樣。如果讀者有時間願意去翻一翻中國一位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文章，那麼，例如在他所寫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中，就可以發現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當作是一回事，其中提到「未來的只有一個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就是指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樣的例子到處可見。那時，說共產主義初級階段也好，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好，都是一回事。

《歷史決議》之所以指明我們的社會已是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是針對當時有人否定我們的社會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要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劃清界限。請讀一讀「十二大」政治報告吧，《歷史決議》和「十二大」政治報告的主要起草人都是胡喬木，鄧力群是他的副手。在「十二大」政治報告中，人們開頭時讀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正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但是後面馬上又讀到：現在共產主義運動「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爲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歷史決議》那個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階段的定性，並沒有越出我們過去在書本上所見的那個舊公式、舊框框。問題正出在這裏。具有教條主義和「左」傾共產主義傾向的人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在我們改革道路上設置了一道理論障礙物。

鄧力群執掌中央宣傳部工作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全國發佈一份關於《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

的研究提綱(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名爲「研究提綱」,實爲「宣傳提綱」。發佈這一「提綱」的目的,就是要在全面改革社會主義舊體制、徹底糾正過去「左」傾共產主義傾向所造成的種種弊害的時候,在全國發動一場「高舉共產主義大旗」的宣傳活動。

請讀《提綱》提出的下述的論斷: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以後,我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發展到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國的共產主義實踐,已經是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實踐。」

接着,又着重加以說明:

「這不僅是個名詞和用語問題,而是要有科學的概念來表達我們當前的社會性質和我們從事的實踐活動。共產主義好比一座宏偉的大廈,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大廈的門外,而是已經進入了大廈的門內。進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對於我國人民來說,已經不僅是一種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我們現在實行各項社會主義政策,也就是共產主義在今天的實踐。」

我是在《提綱》下達半個多月以後才讀到這個《提綱》的。這個《提綱》雖然也說了一些關於改革的冠冕堂皇的話,更可笑的是把那個剛遭受某些人士嚴厲譴責的胡耀邦的《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報告也列爲正式指導文件,但其用心是一目了然的。

我讀到這個《提綱》時,正是兩股風浪撲面而來的時候,周圍的環境使我暫時無心顧及這件事。到了一九八四年全面改

革舊計劃體制的局勢大定以後，一九八五年我才重新把這個《提綱》撿出來細讀一遍，並去查閱從馬克思到列寧的著作。對列寧，我特別注意他從《國家與革命》到十月革命以後的經歷與思想的變化。

我發現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列寧對於在俄國當時落後的經濟文化條件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認識上有過多次反復。開始耽於理想和既成的理論模式，認爲一切將很快進入共產主義；後來他的認識一步一步地與現實接近，越到後來越認識到：在俄國那種歷史條件下，想要在剝奪地主資本家之後直接進入完全的社會主義（即所謂「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能的；在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前，不可避免地將要先經過某種初步的一定形式的社會主義。列寧認爲，這種社會主義稱它爲「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也好，「不完備的社會主義」也好，或者說「帶有小農在居民中佔優勢所造成的特點的社會主義」也好，總之是作爲一個起點，一個中間環節，一個過渡的階梯，藉此準備條件，以便在將來有朝一日達到完全的社會主義。不管列寧這裏所提作爲過渡環節的時間在他設想中有多長，他是怎麼看待這個過渡環節的，或者是否出於策略性的考慮，總之，這是一個過去從未有人提出過的重大歷史課題。列寧說：「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過渡到社會主義（按：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究竟要經過多少階段。」（《列寧全集》第 27 卷，第 118 頁）他說：「如果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將來總歸會達到目的的」，但是現在「我們還不能闡述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將來是個甚麼樣子，甚麼時候達到完備的形式——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也不能說。」（《列寧全集》第 27 卷，第 134 頁）列寧後來的新經

濟政策思想就是由此而來，他企圖由此開闢一個進行社會主義試驗的領域。

但是在列寧逝世後不久，新經濟政策提前結束了。一九三六年實現農業集體化，蘇聯就宣佈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斯大林在宣佈這一點時，特別聲明：「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爲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制度。」（《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99頁）

斯大林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實現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兩者劃等號，就是否定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分階段發展的思想，作爲向共產主義（包括其第一階段）過渡的一個階梯的思想；同時也等於宣佈今後的任務就是由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因此，蘇聯後來一直宣佈他們正在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進，不要多長時間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或者說他們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等等。

不幸，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們也曾走上了這條道路，而且準備匆匆忙忙地向共產主義過渡。大家知道，中國原來的社會基礎比舊俄還落後，我們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廢墟上，在現代生產力還不足百分之十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三大改造就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那是不可想像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急忙地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甚至曾企圖與蘇聯比賽究竟誰先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其嚴重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就是產生困擾我們多年的「左」傾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根源。把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定位於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一切措施向共產主義高攀，取消公有制以外的一切經濟

成分，企圖把社會主義搞得純而又純，從而使現實生產力不堪其負擔，受到嚴重的束縛，經濟體制上弊端叢生。我們傳統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與商品市場經濟相對立的「產品經濟」。各種弊端使經濟體制日益僵化，缺乏活力，並且積重難返，終於走到了今天必須對整個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這一步。

那末，在這種時候，強調宣傳我們的社會已經「發展到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們「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門」，我們正在「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等等，究竟爲了甚麼呢？如果這種論斷能夠成立，那就是說，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是完全不必要的，改革是一種倒退，——《提綱》所想說的不正是這樣一種意見嗎？

毫無疑義，我們面對着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必須總結自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教訓，重新認識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而且不限於中國一國。在現實生產力狀況下我們必須徹底拋棄那種認爲一切將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幻想。

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他摒棄一切憑空構造的社會的幻想，他也不爲人們提供無根據的理想。他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經說：「工人階段不是要實現甚麼理想，而是想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裏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我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舊社會除了孕育着自然經濟因素和農民平均主義思想以外，除了共產黨以及本身還不夠成熟的工人階級以外，有甚麼可以稱之爲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新因素呢？

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重新解釋在概念上完全被搞亂了的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將已提出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現在還處在初

級發展階段」這個論斷，按照我國社會主義的現實獨立地作出解釋，使之與通常稱之爲「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命題區別開來。

我着手這個工作是在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那時風浪已暫時平靜下來，改革的形勢開始明朗化。我着手起草一篇論文。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論文初步寫成，原題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發表時改成《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階段》。文章指出，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主義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原來所說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它的發展程度遠遠沒有達到這一步，它只不過是向共產主義（包括它的第一階段）過渡的準備階段。文章說，不能因爲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水平不高而不承認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可是，也不能無視我們的社會主義尙處於不發達不完備的初級形態的事實而輕率地宣佈我們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我說，我們「不能以匆匆忙忙地進入社會主義、獲得社會主義的稱號爲滿足」，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處在「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使初級形態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逐漸發展成爲完備的、經濟上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

我認爲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尙只處於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完全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時期，我就此問題打了這樣一個比方：我們目前雖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大學的大門，但尙處於預科階段，還沒有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大學，而這個預科階段將是很長很長的，因爲我們過去的舊社會實在太落後了；到二十一世紀中期能否完成預科的

課程從而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大學即到達完全的社會主義，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因爲制約的因素（如人口的增長率，政策的穩定性，國際形勢等）實在太多，其間變數不少。這是人類對於新社會的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將論文送總書記，並附書一封。信的內容如下：

「這篇文章擬評論一下二十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目前究竟處於甚麼階段，是否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究竟如何。特別是，能否說我們目前已處於『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已處於『共產主義建設時期』，這些是有很大爭議的問題。讀到一個關於《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提綱，我覺得那裏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不恰當的。但是有人認為那個東西的正確性無可懷疑。至今中央還沒有對於這個《提綱》提出的重大問題說過一句話。難怪目前理論界對現實問題噤若寒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認為對於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究竟處於甚麼階段，中央應當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總書記第二天（二十五日）讀完這篇文章，當天就轉給他的秘書鄭必堅和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我寫給總書記的信好像不在內）。胡耀邦給兩人寫了這樣一封短簡：

「這篇文章我認為可以看看。這幾年我們報刊上發表的理論性文章不少，在我看，相當多的文章內容貧乏，不知所云；有些文章更拙劣，打着理論探討的旗幟，實際上是散佈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歪曲。吳江此文，有些地方也有可商榷處，但總的來說倒是

一篇平心靜氣探討問題的作品。你們認為如何？至於是否發表，在哪裏發表，我們都不必過問，由他自己和那家報刊編輯去定。」

胡繩表示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鄭必堅不表態。但總書記的信完全避開了問題的實質，對於《提綱》一字不提，對我的有針對性的意見也不表態，只是批評目前理論界的一種不良學風。這可能是總書記作爲政治家的一份苦心。

論文於同年七月間送到《人民日報》編輯部，編輯部對這篇文章的處理十分愼重。社長秦川大概還沒有忘記不久前因發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掉腦袋」的恫嚇。經過多次交涉，直到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這篇論文才得與讀者見面。

當時，人們對於這類理論問題似乎不大關心，比較懂得文章針對性的人對於這場爭論也大都持靜觀態度，但其影響在悄悄地擴大着。領導層顯然十分注意這個問題，這在後來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反映了出來。

一九八六年六月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前面說過，這次會議關於反自由化問題展開了一場重要的爭論。這個決議極重要的一點是廢除了「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所用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爲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胡耀邦專爲此作了一個解釋，說明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爲全民範圍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同黨的現行政策，特別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吻合，在實際工作中必然會產生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胡耀邦還特別指出，這個提法使台、港和廣大華僑、愛國人士難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慮，對祖國統一反而不

利。這是胡耀邦在政治思想上反「左」的一個行動。這時，胡耀邦的處境已相當困難，但他仍積極準備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其中就打算提出並論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問題。

我在這裏要插幾句關於胡耀邦當時所面臨的困境，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他對經濟問題的關心。大概從一九八四年起，胡提議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也就是他和趙紫陽）聯合召開各經濟部門的彙報會。彙報歷時約一年有餘。胡耀邦是藉此做點調查研究，熟悉經濟問題，其用心是好的，何況這也是書記處職權範圍內的事。只是按照胡耀邦的性格，他在聽取彙報時插話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過多。應當說，胡耀邦對於經濟問題有不少意見是具有想像力的，或者說，有他的獨到的見解；但是，也有一部分意見被認爲是不能執行的，並因而引起經濟部門某些人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後來由國務院兩位經濟工作領導人聯名向中央常委上書，訴說他們工作難做，主要批評胡耀邦的經濟思想。中國的生產原決定二十年（到二〇〇〇年）翻兩番。爲此，胡耀邦認爲前十年（八十年代）應爲後十年（九十年代）打基礎，因此提出前十年的經濟增長率要提高，不能老停留在「保四爭五」上，應加快一點例如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九至十左右。國務院兩位經濟領導人認爲這是急於求成，是新的冒進。實際上，大家知道，後來的實際增長率超過了胡耀邦的設想。所以，在這個主要問題上胡耀邦並沒有錯。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趙紫陽又親自給鄧小平寫信，提出請求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及早解決這個重大問題。此信致鄧並抄送陳雲，但這樣全局性的重大問題卻並未同時抄送胡耀邦。所以此信雖然未點名，其

針對性是清楚的。這當然是一件嚴重的、非同尋常的事。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在批判發言中宣佈了。趙紫陽這樣做是否明智，事實很快有了答案。其實，胡對趙是相當尊重的，而且胡不在時書記處會議由趙主持，趙的權力不可謂不大。趙紫陽對胡耀邦採取這種態度，說明一九八四年以後胡耀邦的處境已相當困難，總書記的權力不斷受到挑戰（不僅從「左」的方面，而且從趙紫陽方面），對他做手腳的人愈來愈放肆，社會上的議論也多起來了。

在這種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出於對這位善良領導人的關心，我將社會上對他的評論概括成幾句話，由他的秘書寫成字條傳遞給他，這幾句話是：「寬厚有餘，威重不足。有開創新局面之雄心，而無控制局勢之魄力。容易受人欺侮，容易被人顛覆。」據說，胡耀邦當時對此一笑置之，叫他的秘書將這張字條存檔（直到下台時才銷毀）。然而，這幾句話後來恰恰不幸而言中。

十二屆六中全會後，胡耀邦即着手「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十月上旬，我正因患腦供血不足住院治療，得到起草小組的通知，叫我去參加一次徵詢意見的會議，並指定我談一談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這是我自一九八二年底離開黨校後第一次參加中央有關單位召開的會議。

十一月，我離京到廣東做調查，中旬正準備離開廣東前往福建時，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命我立即返回北京，原來仍是起草小組約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說「十三大」政治報告將把這個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談後，我奉命遞交一份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的意見提綱。

但不久學潮發生，胡耀邦辭職下台。

胡耀邦辭職後，「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由代總書記趙紫陽接手。趙紫陽不僅沒有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問題放下，反而將它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作爲現階段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並將此意見上報鄧小平。鄧小平批道：「這個設計好。」爲此，原起草小組負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部分的人員仍留在小組，繼續撰寫這部份內容。

在我看來，「十三大」政治報告除了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作爲提出當前政策的一般根據以外，並沒有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作理論上的分析闡明，因此，究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在一般人的頭腦中仍然含糊不清。

「十三大」後，我應湖南人民出版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探索叢書》之邀，爲該叢書撰寫一本題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寫成，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就告一段落了。

十九　胡耀邦的倉促下台意味着甚麼？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胡耀邦自一九八一年取代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一九八二年「十二大」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取消主席制），到一九八七年一月提出辭呈，此時離「十三大」的召開只有幾個月時間了。這完全是出人意外的突然事變。

還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即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前，中央高層少數人已醞釀「十三大」的人事更動，目的是促進領導層的年輕化，首先是總書記人選和常委班子的更動。當時已決定胡耀邦退下來，改任別的職務（國家主席或軍委主席）。從十二屆六中全會後為「十三大」準備文件這件事上也可看出一點端倪：「十三大」將有兩個政治報告：一個是胡耀邦負責報告「十二大」以來黨的工作，另一個是趙紫陽負責講「十三大」將通過的關於今後改革和發展的問題。一個代表大會上有兩個政治報告，雖然過去沒有過，但沒有人認為有什麼不正常。現在卻發現了一件眞正不正常的事，那就是在離「十三大」還只有幾個月的時候，總書記胡耀邦突然提出了辭呈。

胡耀邦為甚麼辭職下台？一般歸結於當時發生的學潮，

認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官方公報更指責胡耀邦破壞集體領導原則；如若根據當時渴望取代胡耀邦地位的鄧某人在「政治局生活會」上所做的幾乎整整一天的批判發言（這個批判特別利用了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見香港記者陸鏗的某些談話內容），則胡耀邦的錯誤更是數不勝數，可謂蒼天難容。但明眼人不難看出，批判者平日處心積慮，當場慷慨激昂，徒見其取代之心迫不及待而已！我認爲我們必須對歷史負責，說明事實的眞相。胡耀邦的倉促下台，從大背景來說，自然離不開當時那種特殊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格局，但若就其直接的原因來說，則主要在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成功。而這一次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原因又在於領導方面對原政治體制的癥結所在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於這種改革的艱巨性預見不夠，心中無數。

當經濟體制改革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這是改革之必需，人心之所向，無疑是正確的步驟。

社會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提出確立民主法制政體，由來已久。中共黨內提出這個問題，當以一九八〇年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爲代表。在此以前，胡耀邦曾就李維漢與鄧小平關於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一次交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政治制度改革問題。他說：「從制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在六十三年了，從我們自己講三十年了，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在各方面推動下，鄧小平終於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個講話強調制度改革，指出：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晚年都會犯「文革」

這樣的大錯誤，就是因爲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存在問題，所以，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比人重要，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而中國政治制度的不良，封建主義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這次講話並沒有具體指出制度改革的途徑和時間表等。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四年，主要是撞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門並解決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途徑、步驟等問題。一九八六年才正式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從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起，鄧小平接連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談話。他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爲改革的一個標誌。……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提到日程上來。」（《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一九八七年十月人民出版社版，第 378 頁）又說：「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甚麼內容，應該議一下。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衆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同上，第 384 頁）接着又說：政治體制改革，要本着三個目標進行：「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活力同幹部年輕化有關」；「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同上，第 387－388 頁）同時強調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解決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同上，第 384 頁）鄧小平在幾次講話中強調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內容，

同時也多次指出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搞多黨制、三權鼎立、兩院制等，不能過分強調互相制約的體制，而要着重加強與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最後，鄧小平將政治改革的內容概括成四句話：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鄧幾次講話後，《人民日報》重新刊登了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八月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

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政治體制改革由趙紫陽具體負責，在一九八七年上半年（七月以前）寫出一個文件，講明改革的目標、方法、步驟等，經討論後逐步進行。趙紫陽立即設置了在他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這個機構由其秘書負責，調集了一批年青人參與其事。

如果不是故意把問題縮小或者不打算拋開問題的實質，那麼，我們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包括已形成的政治制度在內，而不僅限於領導體制或領導方式。如果這樣看問題，那末很顯然，從事這樣一種改革對於二十世紀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將是一件牽一髮而動全局的大事，也是一件難上又難的事。可以說，改革這種既成的政治體制要比改革經濟體制的難度大得多，其風險也大得多。這裏首先要弄清楚：這種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怎樣形成的？問題的癥結在哪裏？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形成從中國社會歷史傳統來看又有哪些特點？改革的近期目標和長期目標是甚麼？改革的步驟與方法如何？等等。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歷史上（包括近現代）國家集權的傳統，是形成中國現存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兩大支柱。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方式不同，資本主義國

家大抵是先以資本主義議會制代替封建專制權力，而政黨是在議會制基礎上產生的，然後各政黨以議會制政權爲舞台並運用它來爲整個資本主義服務。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先組織起革命政黨，然後以革命政黨爲領導，以暴力方式或和平方式取得政權，由政黨直接領導國家逐漸向新社會過渡。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原來的設想，只是不得已而暫時用之的工具，當它完成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即公有制）之後，就要歸於消亡。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只是被政黨暫時應用的工具，國家不是絕對的權力，領導國家的黨才是絕對的權力。這裏就包含着產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必然性。至於國家的性質，馬克思主義是兩極端論，即認定一切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都是資產階級專政，一切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在資產階級專政之下一般有兩個以上的政黨存在（也有工人階級政黨存在）。馬克思主義原來並沒有肯定說無產階級只能有一個政黨，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事實上一國之內也有不同的政見的無產階級政黨存在，就連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曾分爲兩個不同的派別，即孟什維克派和布爾什維克派，兩派公開並存，直到取得政權。在奪取政權後，因兩派政見不同，孟什維克派被排除出政權並被取消合法地位，這樣才形成無產階級單一的、統一的政黨並形成一黨執政制度。其後各國共產黨都在以蘇共爲主導的共產國際領導或影響下，採取與蘇共相同的無產階級一黨制；而在以後相繼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大都出現了一黨執政的格局，雖然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內）在一黨執政、一黨領導之下有多黨參政、多黨合作的特殊制度存在。

東方各國，特別是中國，在歷史上，國家、政府從來由一

個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或政治集團統治，不管這個統治集團的性質如何，並且只有這樣，才能夠維持國家的統一與安定。古代當然是這樣，進入近現代仍然是這樣，至少從形式上這種規律性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專制權力，但是領導革命的國民黨並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此導致以後軍閥割據，你爭我奪，此消彼長，外國列強乘機侵入，使國家處於更加危險的局面。後來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亦非眞統一，其力量亦非眞正強而有力，以致同樣不能消除地方割據你爭我奪的狀態，最後導致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下節節潰敗。

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出現的各種政治力量或政治集團如果其中沒有一個佔絕對優勢足以有力量戰勝群雄並駕馭群雄，則政權就無法穩定，國家也無法眞正統一。這就是我們在東方不少國家經常看到出現「一黨統治」或「一黨獨大」的原因。在中國，因爲長期存在着封建的或現代形式的集權統治，沒有政治性的集會結社自由，在國民黨統治結束以前，除統治政黨外沒有其他政黨合法存在的權利，因此，凡是要推翻舊政權的政治勢力或政治集團，它們都非依靠秘密的政治組織和武裝力量進行長期鬥爭不可。所以不論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不僅如此，這些取得統治權力的政治勢力或政黨，在取得政權以後，也必須用武裝來捍衛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黨，並且十分驚惕有敵視自己的政治性的秘密集會結社出現。在中國，這種歷史上積澱下來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習慣勢力十分強大。這和現代化國家當然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的政治改革不能不正視這一點。

中國現時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從根本上說，就是上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加上中國歷史傳統而形成的，它是馬克思主

義政治學說的產物，也是中國歷史傳統的產物。

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以「民主集中制」爲原則。何謂民主集中制？照毛澤東的解釋，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但是積數十年之經驗，我們發現，這種政治體制下所產生的民主，只能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是第一位的、根本的，民主是第二位的、從屬的。毛澤東曾明白地說：「何謂民主？民主就是走群衆路線，集中正確的意見。」這裏僅是把民主看作是一種領導方法、集中方法。所以，所謂「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這個「民主基礎」仍然是受「集中」支配的，由「集中」決定的。因此，在中國，如果整個政治體制不改革，民主集中制的這種狀況也無法改變。

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的這種政治體制形成已久，有很深的基礎，而且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在某些方面運用得有成效，辦成了一些大事（主要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所使然）。誰不承認這一點，企圖全盤否定它，或者企圖照搬西方模式來代替它，那是不現實的，徒然造成政局震盪，國勢不安，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樣的教訓已經有過了。在這裏，改革者毫無疑義需要開闢一條新路。

依一定歷史條件產生並且依然有其積極作用的政治體制，當它產生弊端的時候，只能創造一定的歷史條件（包括經濟、文化條件）逐步改革它，這是一項很複雜很艱巨的社會工程。對於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只能是體制內的改革，即該體制的自我改革，而且要區別整體和局部，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從創造一定條件這一點出發，事實證明這種改革一般還只能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改革

是先行者；當然，經濟改革也必須以一定的適度的政治改革爲助力，否則，經濟改革也不可能順利地徹底地進行。

在深刻認識這個政治體制的形成歷史和形成條件的基礎上，在步驟上如何確定改革的近期目標，無疑是當前的首要問題。在這方面，舉例來說，可供考慮的有以下這些措施：第一，首先抓住政黨自身改革這個環節，使黨的政治生活眞正民主化，使共產黨成爲名符其實的「工人階級民主政黨」（現時的工人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這是整個政治改革的大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無從談起，一切都只能有名無實；第二，實行黨政分開。這絕不是放棄黨的領導，首先是爲了使人民代表大會眞正成爲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必須認識代表人民的最高權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黨。黨作爲國家的領導力量，要在上述原則下重新確定自己的地位，改變自己的領導方式；第三，以上述兩項爲前提，切實開創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黨際民主；第四，精簡機構，包括精簡龐大的黨機構，克服官僚主義；第五，以民主途徑和法律手段剔除黨、政、軍各方面的腐敗現象，這應當是政治改革斷不可少的重要內容，中國的政治改革如果缺少這項內容，全面的整體的改革將無保證。

從種種方面看來，政治改革決非易事，不是幾句話所能定案的。要經過細心的研究，審時度勢，愼重對待，決不可以粗枝大葉，空洞宣傳，貿然從事。然而，問題恰恰發生在這裏。

趙紫陽及其所屬機構顯然無力勝任這項任務，這從他們當時的動作就表現出來了。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提出，萬衆矚目的時候，趙紫陽不是把它作爲一項艱巨任務愼重對待，而是把它看作是政治造勢，掌握政治全局的機會，把自己置於政局的

核心地位。因此，在他領導之下，首先忙於自上而下地設機構舖攤子，組織一批人馬製造輿論，到處造空氣，空泛地宣傳民主，鼓動情緒，以致一開始就引起社會的不安。

首先發現這個問題並且提出警告的，不是別人，正是胡耀邦。胡耀邦雖思想活躍，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卻是一個穩健派。他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講了一篇話，特別指出：

>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現在議論紛紛，許多議論並沒有講在點子上。這個那個研究單位，寫文章一寫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論信口開河。他們往往抓住一個甚麼外來學說，就洋洋數千言、數萬言，把西方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離開了中國的實際。當然，這裏我只是同你們通通氣，並不是要批評甚麼人。按書記處分工，這件事由趙紫陽同志負責，用大約一年的時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計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擬出一個文件，但是我們黨委還是要注意，不要讓那些人到處造空氣，造風潮，搞得人心不安。」

胡耀邦這篇講話是在學潮發生前的兩個月，但是沒有引起人們（包括趙紫陽在內）的足夠注意。而一九八五年以來又發生物價上漲，腐敗現象滋長，引起人們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反自由化的爭論（最後還是決定要反自由化）還有餘波。這就招來了一九八六年年底的一次被稱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學潮，有些大中城市的學生上街示威請願。至於這次學潮究竟同甚麼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且讓歷史去評論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及自治區黨

委書記，以及軍隊和中央黨、政、群部門負責人會議，討論平息學潮問題（這時經過胡耀邦等人的努力，學潮已經平息下去）。同時，這次會議也是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開始。

會後，也就是年終，鄧小平召集少數幾位領導人開會談領導幹部年輕化問題（誰退誰不退）、學潮問題，同時譴責「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個小會上，趙紫陽直指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辭呈（注意：不是向中央委員會，而是寫信給鄧小平）。

我確實得到這樣一個消息：當一位與胡合作共事過的同志聽到胡耀邦辭職並準備作深刻檢討時，曾急速向胡耀邦傳話：「不可輕易作檢討，更不可無限上綱。堂堂正正的上，堂堂正正的下。」據說胡耀邦不聽勸告，仍然匆匆忙忙作了上綱很高的檢討。結局就是大家知道的，越「深刻檢討」，批判者的調子越高。

胡耀邦的突然辭職下台，可以說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到胡耀邦頭上。然而，趙紫陽未深思「唇亡齒寒，胡倒趙孤」的道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竟忘掉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寓言和確有的歷史教訓。因此，事實是：趙紫陽要求「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恰恰爲別人「接着解決趙紫陽的問題」創造了條件。

我未直接接觸過趙紫陽，可說對趙紫陽並無瞭解。因此，在這裏，除胡耀邦下台事件外，我對趙紫陽不可能再說甚麼。

當時人們對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關係也議論紛紛。主要有兩種傳說：一是說胡耀邦下台的深層原因是胡耀邦「主張鄧小平退下來」，因此觸犯了他老人家。據我所知，這不是事實。事實是：不是胡耀邦「主張」鄧小平退下來，而是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其他人立刻勸阻，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只爲了這個「同意」的表示，胡耀邦立即成了許多老人的「衆矢之的」，因爲如果鄧小平眞的退下來，則其他在位的老人勢必也只好退下來，這不能不引起一些老人的憤慨。當時表現得最爲憤慨的就是黨校那位「校長」，他在學校召開的一次大會上竟然破口大駡：「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種人』！」並大聲宣佈：「學生上天安門，要熱處理，來一個抓一個。我們有四百萬軍隊，怕甚麼！」眞是難得一見的「可愛」的人，難得一聞的「可愛」的聲音！

當然，在胡耀邦，這固然表現了他的坦率，同時也表現了他對中國政治家的特殊內心世界不甚了解，天眞得驚人。

另一種議論是對鄧小平處理胡耀邦的方式有意見：堂堂一位總書記，連中央委員會也不召開，就以一個不倫不類的「政治局生活會」（還只限於政治局少數人），就給弄下來了。我以爲，這個問題也要分析。這樣的處理方式確實與組織原則不合，但依我看，鄧小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作這樣處理也有他的苦衷。因爲即使是「生活會」那種小會的批評，氣氛已相當緊張，如果開起全會來，不僅那些蓄意倒胡者將如魚得水，大施拳腳，就是黨內那些專靠批人整人升官的人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們會無中生有地群起而攻之，這樣，將使胡耀邦更加難堪；同時這樣也不能完全避免會議有引起對改革不利的嚴重分

歧的可能性。我想可能就是這些因素促使鄧小平下決心採取開小會的辦法；即使是小會，據說鄧也曾專門找胡喬木談話，勸胡在會上少發言，以減少攻擊的火力。所以，鄧小平採取違反組織原則的作法，也未嘗不可以看作是當時情況下保護胡耀邦的一項措施。而胡耀邦的辭職只向鄧小平提出而沒有直接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因此他自己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當然，這僅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和猜想而已。

胡耀邦的下台，歸根到底是意味着政治體制改革初步嘗試的失敗。中共「十三大」雖然仍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寫了一些話，但這些話從以後的實踐看，不過是些空頭文字，政治體制改革又被暫時擱置了。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向何處去？主要癥結何在？主要的經驗教訓是甚麼？從何處重新起步？……這些就是胡耀邦的下台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的問題。我以爲，在今後十年內我們如果不能就此問題找到一條出路，則中國的局勢將難以預料，整個改革也將難有保證。

二十　與胡耀邦最後一次晤談

「十三大」胡耀邦仍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除參加例會外，其實際狀況可想而知。「十三大」剛開完，我約了一個日子去看他，這是我離開黨校後第一次同他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因為第二次約見，說好是在當時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結束後去看他，不想他在會議上突然病發住院，不久去世，就永遠失掉再見面的機會了）。這次去，見他精神依舊，容顏不改。

一見面他就說：「我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想不到我能登上這樣的高位；一個，想不到我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我說：「高位未必真高，錯誤也未必如此嚴重。還是讓歷史去說話罷！歷史將會怎樣評論，我們可能也想不到。率先撥亂反正，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衝開改革的大門等等，無一不是擔風險的事，得罪人的事。你為此登上總書記的高位，亦為此而付出了代價。為黨承擔風險和為黨的利益付出代價，對個人來說都是值得的。你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至於你的檢討……」他馬上接着說：「謝謝你們的關心。那次檢討我沒有很好考慮，事先也沒有同家裏人商量。至於最後黨內下發的那份檢討，下發前並未送我看過。」我說：「那是有人做了手腳。聽說中央已察覺了這個問題，作了嚴厲的批評。後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這一機構，看來與這事有關。」

我提到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事件的成因，他好像有些茫然。我就說到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我說，直接引發這次風潮的並不是你；但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怎樣進行，我們確實沒有慎重的考慮。我說，我們黨本身的改革，黨的民主化恐怕還是第一位的。他點點頭說：「有些事情曾經想過，當時認爲並不難做，但是做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困難重重。」

然後他提起我那篇被壓將近一年的文章，好像有些歉意。我說，「我能夠理解，這件事怪不得報社，他們有他們的難處。你大概還不知道秦川因爲在《人民日報》上發了我在『十二大』小組會上的發言，王震給他打電話問他『還要不要腦袋』的事吧？」他表示驚愕。我簡單地說了事情的經過，他說，「秦川還頂得住。」接着說：「我讓起草小組找你。這個問題（指將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主義原來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區別開來）不僅對我們有意義，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意義。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都沒有注意，因此『十二大』報告將兩者混淆我也沒有看出來。」他問我對「十三大」報告的闡述有何看法，我說，《報告》沒有從理論上闡明問題。我將我準備寫一本小冊子（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的計劃告訴他，他表示贊同，說《報告》主要講當前的政策，你們還是應當從理論上闡明問題。

我最後談我對理論工作的看法。我說：「耀邦同志關心知識界，關心黨的理論事業。記得一九七七年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就談到理論必須聯繫實際。我半途出家，五十年代才開始正式從事理論工作，幾十年的經歷如今卻使我有些糊塗起來了。現在我這麼想，理論工作應與當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

離，因爲政治、政策的隨意性實在太大。馬克思確實是一位大科學家，主要是一位大史學家。究竟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已開始重新認識；究竟甚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也要重新認識。」

耀邦饒有興趣地審視着我，說「這個問題提得好。我們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歷史教訓需要總結。依你的看法呢？」

我說：「這裏主要有兩個問題。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積半個世紀的經驗，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門歷史科學，這門歷史科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只有這個歷史觀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其他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關於社會發展所提出的這個論斷那個論斷，都是運用這個歷史觀觀察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所得出的結論、判斷、推論，這些，一般並不都具有普遍意義，最多只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過去我們常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個別著作以及這些著作中的個別論斷當成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吃了很大的虧。舉例說，形成我們今天這種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主要是根據兩本書的論斷：一本就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本就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那裏所說的可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新社會的一種科學推論，但我們卻把它當作預定模式加以推行，而不管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產生在甚麼樣的具體條件下。因此，我們幾乎每走一步都要同教條主義與空想主義作鬥爭，同脫離中國國情的傾向作鬥爭。當然，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門科學本身也要發展。馬克思已是百年以外的人了，對我們來說，也算是古人了。何況他是一個西方人！古人之理至當，有些已非今日之理。馬克思生前最後幾年都在致

力於研究世界史，但他沒有機會接觸卷帙浩瀚的中國史學。如果馬克思能夠接觸中國史學，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內容一定要比現有的豐富得多。這個工作要由我們自己來做，就是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紮根於中國思想文化土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紮根於中國的傳統哲學和傳統史學的土壤之中。這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工作是不能一日停止的。」

我停了一停，接着說：「這個問題偏重於理論。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科學與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這個問題耀邦同志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耀邦說：「有不同意見不要緊。現在是我聽你的。」

我說：「因爲你今天已經不在位了，所以我能夠跟你談我的看法。照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工人階級政黨。政黨一經產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成爲政黨的意識形態工具。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一個將馬克思主義作爲自己的意識形態或指導思想的黨，如何保持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科學性，即不損害馬克思主義作爲一門歷史科學和科學世界觀的性質和獨立地位，讓人們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教條化，不教旨化，更不把它當作政治權威來運用。根據一個多世紀的經驗，要做到這一點實在非常之難。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爲政黨的意識形態工具，就容易喪失其固有的科學性。一方面，容易將學說的內容固定化、教條化，使之成爲像教旨聖諭那樣的東西，不允許（至少是限制）人們（包括黨人）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作爲共產黨人，按照黨章有時難免會有某種宣傳上的限制（也是當直接涉及到政治問題時），但並無研究上的禁區。理論研究應當和黨的宣傳工作適當區別開來，而我們卻一直將

理論研究歸屬於黨的宣傳部門管轄，因此，禁區遍佈的情況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爲政黨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極容易被當作一種政治權威、一種政治批判力量來運用，即根據政治需要將某種觀點強加於人，尤其是黨的領導人將自己的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任意批評人，甚至加人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這是完全不正常、不正當的。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政治權威來運用，以馬克思主義名義整人，實際上等於宣佈馬克思主義這門歷史科學和科學世界觀的變質或死亡。本來，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首先要求黨自身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結合本國實際，科學地創造性地制定方針政策，反對照搬書本。首先要對馬克思主義負責的是黨自身，黨在是否遵循馬克思主義精神這點上必須有嚴格的自我要求、自我批判精神。而自由研究、自由討論恰恰能夠幫助黨審查自己制定的方針政策是否眞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拒絕別人批評或自我審查的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是眞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耀邦問：「這樣重要的問題，你寫過文章沒有？」我說：「第二個問題寫過，不過沒有講透徹。現在要講透徹不容易。我主張，我們的黨章今後可不寫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寫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爲指導。」

耀邦沉吟了一會，然後說：「這些問題應當研究、說淸楚。新的實踐總會迫使人們注意新的理論，包括對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弄明白究竟甚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我們不能再過糊塗日子了，或者強迫人過糊塗日子了。僵化思想和教條主義是沒有出路的。我只能這麼泛泛

說幾句，具體研究要你們去做。」

我說：「恐怕我也來不及做這個工作了，日子不多了。」他說：「爲甚麼？活到老研究到老嘛！」

我一時不好應對，沉默了下來。在一瞬間我凝視着面對的人，似乎有許多說不出來的感慨和疑問。一個在政治上一刻也安靜不下來總想振翅奮飛甚至頗有些英雄主義色彩的人，就能甘心這樣永遠歛起自己的翅膀嗎？他究竟怎樣看待當前衆多的問題呢？現在組織上對他有一個說法，可是人們仍然有自己的看法，將來歷史對他又會說些什麼呢？我的思緒一時飄忽不定，對着這樣一位能夠與普通人發生平等交誼的領導人，心裏總有一種沉重的憂傷的不平靜的預感。

我覺得要說的話已經說完，就站起身來。他見我要告辭，突然關切地問：「聽說你感到有些孤獨是不是？」沒有等我回答，他接着說：「這大概是因爲你接觸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應當多接觸青年人，同青年人廣交朋友，這樣就不會感到孤獨了。」

我說：「謝謝你，耀邦同志！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一點覺悟，懂得要從青年人身上多吸取新的時代感受。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這次談話只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我告辭出來（但我萬沒有想到這成了最後的訣別），彷彿覺得告別了長長的一段路程，那就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這十年的路程。

我想，劫後餘生，轉眼間又是十年過去了！今後的十年、二十年又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九四年一月初稿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修改

附錄一：

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

《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

檢驗眞理的標準是甚麼？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爲了深入批判「四人幫」，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

檢驗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怎樣區別眞理與謬誤呢？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檢驗眞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眞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眞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16 頁）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眞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實踐不僅是檢驗眞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澤東同志說：「眞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眞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眞理的

尺度。」（《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23 頁）「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16 頁）這裏說「只能」、「才是」，就是說，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是因爲，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眞理是客觀眞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作爲檢驗眞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爲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爲標準一樣。作爲檢驗眞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繫起來的特性。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眞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門捷列夫根據原子量的變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贊同，有人懷疑，爭論不休。爾後，根據元素周期表發現了幾種元素，它們的化學特性剛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預測。這樣，元素周期表就被證實了是眞理。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在三百年裏一直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一定還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加勒於一八四六年確實發現了海王星這顆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才被證實了，成了公認的眞理。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爲眞理，正是千百萬群衆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爲眞理，它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269 頁）馬克思主義原是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派別，開始並不出名，反動派圍攻它，資產階級學者反對它，其他的社會主義流派攻擊它，但是，長期的革命實

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眞理，終於成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

檢驗路線之正確與否，情形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制定自己的路線時，當然要從現實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出發，依據革命理論的指導並且加以論證。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個革命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二十世紀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俄國工人運動中，都發生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那時第二國際的頭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寧主義者是少數，鬥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俄國十月革命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列寧主義是眞理，宣告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破產。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眞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一個時期內，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沒有佔主導地位。長期的革命鬥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標準是什麼呢？只有一個：就是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有的同志擔心，堅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會削弱理論的意義。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相反，只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才能夠使僞科學、僞理論現出原形，從而捍衛眞正的科學與理論。這一點，對於澄清被「四人幫」搞得非常混亂的理論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種種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例如，他們炮製「天才論」，編造文藝、教育等各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僞造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變成走資派的「規律」，胡謅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虛構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無稽之談，等等。所有這些，都曾經被奉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理論」，誰反對，就會被扣上反對馬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但是，這些五花八門的謬論，根本經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它們連同「四人幫」另立的「眞理標準」，一個個都像肥皂泡那樣很快破滅了。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他們的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眞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眞理，强權證明不了眞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於它是經過實踐檢驗了的客觀眞理，正是由於它高度概括了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爲理論，並用來指導實踐。正因爲這樣，我們要非常重視革命理論。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選集》第 1 卷第 241 頁）理論所以重要，就是在於它來源於實踐，又能正確指導實踐，而理論到底是不是正確地指導了實踐以及怎樣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一點也離不開實踐的檢驗。不掌握這個精神實質，那是不可能眞正發揮理論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說，我們批判修正主義，難道不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衡量，從而證明修正主義是錯誤的嗎？我們說，是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的銳利武器，也是我們論證的根據。我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這些基本原理是馬、恩、列、斯和毛澤東同志對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它們被長期的實踐證明爲不易之眞理；但同時我們用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仍然一點也不能離開當前的（和

過去的）實踐。只有從實踐經驗出發，才能使這些原理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們的批判只有結合大量的事實分析，才有說服力。不研究實踐經驗，不從實踐經驗出發，是不能最終駁倒修正主義的。

客觀世界是不斷發展的，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研究新事物、新問題，不斷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論推向前進。這些新的理論的正確與否由什麼來檢驗呢？只能由實踐來檢驗。例如，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說，是一個新的結論。這個結論正確不正確，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去檢驗，只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實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才證明了列寧這個學說是眞理。

毛澤東同志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97 頁）堅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

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眞理的榜樣

革命導師們不僅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親自作出了用實踐去檢驗一切理論、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光輝榜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所共同創造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文獻《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就是許多事例當中的一個生動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發表後，在四十五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實踐來檢驗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詳細地記載了這個事實。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他們又指出，「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爲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228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歷史事實的發現，曾對

《宣言》的個別論點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爲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條註釋：「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251頁）這是因爲，《宣言》發表以後，人們對於社會的史前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特別是摩爾根的調查研究證明：在階級社會以前，有一個很長的無階級社會；階級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非從來就有的。可見，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確切。恩格斯根據新發現的歷史事實，作了這個說明，修改了《宣言》的舊提法。《宣言》還有一個說法，就是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推翻資產階級。一八七二年，兩位革命導師在他們共同簽名的一篇序言中，明確指出：「由於最近二十五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着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說明十分重視，他認爲這是對《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列寧選集》第3卷第201頁）

毛澤東同志一貫嚴格要求，不斷用革命實踐來檢驗自己提出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同志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當時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後國際國內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的新情況。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語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特別寫了一個說明，指出這些按語「其中有一些現在還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其中說：一九五五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戰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這樣說不妥當。應當說：一九五五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

利的一年，在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戰線方面和政治戰線方面，則或者還沒有基本勝利，或者還沒有完全勝利，還有待於爾後的努力。」（《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25～226 頁）

革命導師這種尊重實踐的嚴肅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並不認爲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眞理或「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並不認爲只要是他們作出的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說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他們處處時時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堅持眞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群衆，毫無偏見。他們從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作「聖經」來崇拜。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必須堅持，決不能動搖；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新的結論，拋棄那些不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關於哲學，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果只有幾篇原有的哲學著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那是不行的。實踐、生活的觀點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生活之樹是長青的。正是革命導師的這種堅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才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我們不僅承認實踐是眞理的標準，而且要從發展的觀點看待實踐的標準。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作爲檢驗眞理的標準，它既具有絕對的意義，又具有相對的意義。就一切思想和理論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一點講，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就實踐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無條件地完全證實或完全駁倒一切

思想和理論這一點來講，它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今天的實踐回答不了的問題，以後的實踐終究會回答它，就這點來講，它又是絕對的。列寧說：「當然，在這裏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選集》第 2 卷第 142 頁）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於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統一的觀點，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論必須無例外地、永遠地、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的觀點，也就是眞理發展的觀點。任何思想、理論，即使是已經在一定的實踐階段上證明爲眞理，在其發展過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實踐的檢驗而得到補充、豐富或者糾正。毛澤東同志指出：「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眞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又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272 頁）馬克思主義强調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强調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永遠沒有完結，就是承認我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終完成，就是承認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我們的認識可能犯錯誤，需要由實踐來檢驗，凡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就應當改變，不應再堅持。事實上這種改變是常有的。毛澤東同志說：「眞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271 頁）林彪、「四人幫」爲了篡黨奪權，胡謅甚麼「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眞理」，實踐證明，他們所說的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眞理，而是他們冒充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140 頁）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淸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爲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眞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還面臨着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

（原載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

附錄二：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

林彪、「四人幫」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根本顛倒

葉劍英同志在去年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曾着重地指出：「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我認爲有兩層最基本的意思。一層是：一定要掌握理論。沒有理論，一張白紙，憑甚麼去聯繫實際呢？另一層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甚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爲一談。」又說：「如果我們只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脫離實際，並且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聖藥，那就只能在生活實際的『天空中飛翔』。」

我們如果把這樣重要的論斷看作是無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論，那當然是大錯特錯。這個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時弊的。林彪、「四人幫」這伙政治騙子，搞亂了許多基本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個顛倒：一個，是在政治上根本顛倒敵我關係；另一個，是在思想上根本顛倒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前一個顛倒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已經十分清楚。後一個顛倒也決不是一件小事情，這種顛倒是從根本上干擾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也從根本上毀壞毛澤東思想，由此造成一系列的混亂。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從這裏開始。

大家知道，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除了它的階級性之外，就是它的實踐性。所謂實踐性，就是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83 頁）從實踐中來的思想，其正確性究竟如何，也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所以毛澤東又說：「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16 頁）愈是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並使理論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就會愈正確、愈徹底，就愈能掌握群衆，愈易變成物質力量，也就愈能對實踐起偉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同志把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震動馬克思主義論壇的偉大哲學著作題名爲《實踐論》，不是偶然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理論與實踐的唯一正確的關係。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澤東同志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曾說到《實踐論》這篇著作比他同時的其他哲學著作更重要。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甚麼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眞理同中國革命和當代世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把實踐擺在第一位，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使馬列主義理論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中得到偉大的發展。毛澤東同志在談到別的國家的革命的時候，也總是着重指出這一點。例如，他曾勸告日本朋友，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同日本的具體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各國革命都有自己的條件。毛澤東同志不斷告誡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用來分析、研究、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反對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必須在鬥爭實踐中創造新局面，造出新理論，等等。很顯然，談論毛澤東思想而無視這一點，就是丟掉了毛澤東思想的根本。

林彪、「四人幫」是一伙政治騙子，也是一伙理論騙子。他們

天天喊「高舉」，實際上是天天在糟踏、天天在破壞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理論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林彪的「倒過來」哲學，就是顛倒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在認識的過程中悄悄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當作出發點。張春橋則提出「理論——實踐——理論」的公式，公然說：「思想上的正確與錯誤，決定於理論，理論主要是講思想問題的」。這就是說，思想眞理性的標準不是實踐，而是理論，不是理論要由實踐來檢驗，而是實踐要由理論來裁剪。誰說林彪、「四人幫」沒有「理論」呢？這就是他們的「顛倒」理論。在林彪、「四人幫」那裏，强調實踐就是經驗主義，提實事求是就觸到他們的痛處。他們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看做是科學，是來自生動活潑的實際生活的眞理，而是把它絕對化、宗教化，宣傳甚麼「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萬句」、「頂峰」、「最高眞理」、「絕對權威」等等。在這種基礎上，他們就有「理由」提據自己的實用主義需要來任意處置、肢解、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便他們「拉大旗作虎皮」；在這種基礎上，林彪也才敢於公然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斷章取義」。

林彪、「四人幫」糟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卑劣最惡毒的辦法，就是搞片言隻語。在毛澤東同志批判了他們的所謂「一句頂一萬句」的荒謬說法以後，他們又企圖固守住那個所謂「句句照辦」的陣地。可不可以引用馬列著作和毛澤東同志著作中的話句呢？當然可以，我們並不反對引用。但必須反對斷章取義，片言立論，歪曲實質，也不能「句句照辦」。毛澤東同志就說過：「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86 頁）林彪、「四人幫」在這方面是搞實用主義，宣傳一種特殊的宗教迷信。經他們摘引的片言隻語都是超時空超歷史的「絕對律令」，實踐對他們是完全無能爲力的，絲毫沒有發言權的。他們這樣做，並不因爲他們也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死抱住馬克思主義條文不放而自以爲革命的一般教條主義

者，不，他們是一伙職業反革命。他們摘引片言隻語是爲了推翻整個馬克思主義科學，爲了埋葬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他們不是以爲只有死抱住條文才能進行革命，而是爲了利用這些條文來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進行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

但是，必須鄭重指出，我們決不能因爲林彪、「四人幫」是一伙反革命而輕視他們在思想理論方面的流毒和影響，這種影響是觸目驚心的，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場浩劫。從上面所說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四人幫」確實有一條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對抗的認識路線，這條認識路線的核心就是顛倒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使理論變成空洞的抽象，這種「抽象」便於他們塞進各種私貨，混淆本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可以說是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思想基礎。因此，對於林彪、「四人幫」，我們決不能只是罵一句「死反革命」就揚長而去，而放棄對他們的理論批判，或者有意無意地磨鈍批判的鋒芒。「兩個凡是」是林彪、「四人幫」的思想體系，他們的骯髒馬屁必須一起徹底清掃乾淨。我們的批判要把被他們顛倒了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特別要恢復《實踐論》的權威，實事求是的權威，實踐標準的權威，以使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重新發揚光大。

我們如此强調實踐，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要由實踐來檢驗等等，是否就算貶低了理論的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眞理性抱懷疑態度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當然只能是否定的。

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實踐檢驗理論，而使理論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展的過程。

實踐要以革命理論爲指南，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

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指針。我們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原則作爲分析、評論、判斷問題的依據，這些都是毫無問題的，必須如此的。但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要由實踐來檢驗，其正確性要由實踐來證明。思想自身不能證明自身。理論是實踐的指南和實踐是檢驗理論（眞理）的標準，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雖然它們有聯繫），不能互相混淆。理論之所以能夠指導實踐，正因爲、也僅僅因爲理論來自實踐，並且經實踐的檢驗證明是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實踐檢驗理論的過程。許多理論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得到補充和發展；有些理論的眞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有些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指導實踐的理論，就是這樣來自實踐又經過實踐檢驗而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展。理論如果脫離實際，不與實際相結合，或者不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老停留在一個地方，它就不可能指導實踐。這些，本來是屬於常識範圍內的東西，然而在目前這個由亂到治的轉折關頭，這類常識範圍內的東西有時也往往需要重新說明。

這裏，我們遇到這樣一個問題：當人們的社會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眞理以後，這個被證實了的眞理還要不要繼續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呢？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是否就是認爲眞理不可信，懷疑相對眞理的存在呢？我們認爲，其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是由於把人的認識過程當成了許多單個的互不連貫的思想「產品」，而把接受實踐的檢驗看作是工廠裏頭的檢驗員對於產品的檢驗，因此，才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一個經過檢驗的產品還要繼續接受檢驗，豈不是等於否認了這個產品是合格品嗎？這樣看問題，顯然是完全忘記了我們這裏討論的是認識論問題，是實踐標準問題，而實踐作爲檢驗眞理的標準，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請讀一讀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 2 章第 6 節，這

裏不贅述），忘記了客觀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樣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這樣提問題，實際上是認爲，一個科學原理在未被實踐證實之前是相對眞理，而當它一旦被實踐所證明，就一勞永逸地成爲「絕對眞理」了，就不必再受實踐檢驗了，認識已經到達「頂峰」，科學只好驚愕地望着這個「頂峰」，再也無所作爲了。這完全是一種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

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說來，根據一定的原理和實踐經驗（或新獲得的歷史知識）發現新的眞理或創立新的學說，這是一回事，這些眞理或學說是否被當前或今後的實踐所證實，這又是一回事；即使被證實或部分證實了，它們仍然要在往後新的實踐中繼續被檢驗而獲得新的內容、新的面貌。舉一個例子：馬克思一八五九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所闡述的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著名的經典公式，這是馬克思研究、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並獲得規律性的認識之後所作出的總結論，它毫無疑義是眞理。特別經過馬克思寫出《資本論》，弄清楚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之後，唯物主義歷史觀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論證。那末，這個已經被科學地論證了的原理，是否還要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呢？答覆是肯定的。《資本論》發表以來的長時期中，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在運用中、在實踐中不斷地被檢驗被證實，並且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一個劃時代的發展。從十月革命到現在，資本主義在實踐中又發生許多變化，又有不少新問題要我們去研究。到了社會主義時代，關於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的科學原理，在毛澤東同志手裏，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毛澤東同志據此提出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這是因爲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運用於社會主義實踐，而社會主義實踐比之資本主義實踐又大大不同了的緣故。無

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偉大眞理，還將爲今後全部社會主義實踐所檢驗並得到發展，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宗教迷信對實踐採取專橫態度，科學的眞理將虛心傾聽實踐的呼聲。實踐的發展總是要推動眞理的發展，或使之進一步具體化。

列寧認爲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革命有在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勝利的可能。這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是一個新的結論，一個新的科學眞理。說它是科學眞理，因爲它是列寧在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實踐活動並發現了帝國主義的發展不平衡規律，經過對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關係的確切考察，從規律性上論證了的。但是，這個新結論的客觀眞理性究竟怎樣，它是否同客觀實際相一致，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還必須經由實踐的檢驗而得到證明。這個科學眞理，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前，儘管從規律性上看，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可靠性，但它仍然是未被實踐所證明的東西。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以及後來列寧、斯大林時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一定的成功，這個眞理才被實踐所檢驗而得到了證實，而成爲一個偉大的實例，成爲一種偉大的物質性的革命鼓舞力量。其後，這個眞理繼續接受世界革命實踐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革命實踐的檢驗，而不斷豐富了自己的內容。

這就是《實踐論》中所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爲眞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是認識的兩個飛躍，即認識上達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和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的飛躍，而照毛澤東同志歷來所强調的，更重要的是在於後一個飛躍，這個飛躍就是檢驗眞理和發展眞理的過程。請看，毛澤東同志是這樣說的：「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爲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

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眞理的辦法。」（《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84 頁）又說：「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眞理，這才算是眞理，不然就不算。」（《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97 頁）算不算眞理，最後還是要看實踐的結果。如果只停留在前一個飛躍而沾沾自喜，想當然地以爲一切眞理都在這裏了，自己已經深入「絕對眞理」的堂奧，因此辦事就可以不從實際出發，眞理可以對實踐採取傲慢態度而不必接受實踐的檢驗，那是一點也不懂得《實踐論》的想法和作法（實踐檢驗眞理也是一個過程，往往要經過一些反覆，這個問題我們留待以後討論）。

有人可能會問：科學研究中有「邏輯證明」一說，那和實踐標準又是什麼關係呢？所謂邏輯證明，就是在科學研究中，從一系列公理、定義、定理出發，運用抽象的數學推導和邏輯推論，作爲證明的工具，引出新的結論。但是，這裏仍然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第一，這裏以邏輯推理的形式出現的東西，是經過千百萬次的實踐在人的意識中固定下來的，它們本身就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第二，由推理得出的結論，即使經過十分嚴密的邏輯證明，也不能代替實踐標準，相反，推理的結論還必須拿到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證明它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實際。離開實踐標準的邏輯證明，難免要和實證主義的純粹邏輯分析方法滾到一起去。

科學理論的創立和發展過程是這樣，一條正確路線的形成和貫徹執行，情形也相類似。

路線、政策、方針等，是理論見之於實踐的決定性的環節。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路線，是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結革命實踐經驗，分析現實階級關係和鬥爭形勢所得出來的革命行動方針和目標。我們的路線如果是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認眞總結已有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並且確實運用民主集

中制的方法集中了全黨的經驗和智慧，那末，我們能夠有把握地說，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正確路線制定之後，要不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呢？路線的正確性要不要依靠實踐來證明呢？路線本身還要不要在實踐中得到某些修正、補充和發展呢？回答同樣是肯定的。正如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實踐檢驗理論的過程一樣，貫徹執行路線的過程也就是路線接受實踐檢驗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是多次反覆的過程。例如，一條政治路線制定之後，到群衆中去宣傳，去貫徹，爲群衆所掌握，變爲群衆的行動，這個指導過程本身也就是接受群衆檢驗的過程。一般說來，路線爲群衆所接受並轉變爲物質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可以證明這條路線的正確程度。其次，黨的總路線提出的是總綱領，是一般任務，當這個一般任務回到個別中去，回到實踐中去，貫徹到各個具體工作領域中去的時候，它就要和各個別領域的實踐相結合，接受各個別領域實踐的檢驗。各個具體工作領域根據總路線並且按照自己的情況制定出具體的工作路線、方針、政策並且在實行中獲得成功，那也是對總路線的正確性提供證明，而且這種具體化也必然要豐富總路線的內容。

還有，在執行路線的長過程中，由於實踐是發展的，階級關係也在發生變化，路線本身必然要隨着實踐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而發展，而變化自身的某些內容。例如，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長時間的鬥爭，到抗日戰爭時期，制定出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國才被我們所認識。但事情並未到此停止。因爲實踐在發展，我們的認識在加深，路線也還要接受實踐的檢驗而得到某種發展。毛澤東同志早已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爲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並採取不同的對待方針。在抗日戰爭時期，又將依附日本的大資產階級和在不同程度上參加抗日的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但是，只有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才明確宣佈我們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是反對官僚壟斷資本的革命，並且宣佈沒收四

大家族爲首的壟斷資本（佔中國資本主義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爲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毫無疑問，這是我黨民主革命總路線內容的一個重要發展。所以這樣，是因爲四大家族爲首的壟斷資本，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日本投降以後發展到了高峰，這個壟斷資本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反對官僚壟斷資本具有兩重性，它既是民主革命性質，又具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把反對壟斷資本作爲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內容，是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使民主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這不僅是路線的發展，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科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在歷史上，我們看到：錯誤路線的制定者，總是一再强調他們的路線一訂出來就是「絕對眞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無須經實踐檢驗，也不容許別人提意見；相反，正確路線的制定者，並不宣佈這一路線就是完美無缺的「絕對眞理」。一條正確路線的執行，一方面，必須堅定地滿懷信心地向群衆宣傳黨的路線的正確性，使之變成群衆的自覺行動，克服違反這一路線的各種偏差，爲實現黨的正確路線而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謹愼從事，十分重視調查研究，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和方法，小心地傾聽實踐的呼聲，考察群衆的情緒，及時改進我們的工作，反對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等。不這樣，路線正確也可能犯錯誤，或使正確的路線受到歪曲，受到別的錯誤東西的干擾。

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的一次談話中，特別講到這個問題。他說：證明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嗎？毫無疑義是正確的。這是路線問題上的眞正的唯物論觀點，而不是什麼路線問題上的「懷疑一切」。

對不可知論、懷疑論及其他哲學怪論的最有力的駁斥是實踐

對不可知論、懷疑論及其他哲學怪論的最有力的駁斥是實踐。這是恩格斯在批判休謨、康德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時所說的一句名言，對於我們今天仍然很有意義。

恩格斯這句話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人們的認識能不能正確反映現實，人們的認識是不是具有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把實踐引進認識論、確立眞理的客觀標準之前，是沒有解決，也是不可能解決的。那時候，人們從頭腦中構造各種思想體系，都以爲自己獲得了最終眞理或絕對眞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主觀思維範圍內爭吵不休，莫衷一是。在那種情況下，不可知論、懷疑論自然最有市場，因爲，誠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爲它不必根據實際，也不受實際檢驗的。舊唯物論不了解認識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也不能眞正解決這個問題。自從辯證唯物主義問世，把實踐引進認識論，確立了判別眞理的客觀標準之後，這才宣告懷疑論、不可知論的破產。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承認實踐是眞正的權威。世界上只有因爲沒有確立判別眞理的客觀標準（實踐）才使不可知論和懷疑論獲得市場，決沒有因爲確立了眞理的客觀標準反而使不可知論和懷疑論流行起來的事。誰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那就又是一個驚人的「顚倒」！

林彪、「四人幫」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非常突出地表現在他們的眞理觀上。長期以來，他們把眞理說成是依人的主觀思想爲轉移的東西；把理論本身、或權威人士的言論和看法，或文件上寫了的，作爲判別眞理的標準，而獨獨諱言客觀的實踐。他們所以這樣

做，是爲了對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顧事實，由他們任意解釋、任意褒貶，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好人說成壞人，壞蛋說成好人，完全視他們的「階級鬥爭需要」而定。他們也把這叫做「事實爲需要服務」。路線的正確與否，本來，只要尊重事實，不掩蓋事實，讓實踐和事實說話，那是不難辨別清楚的。可是林彪、「四人幫」一伙用一切漂亮的「革命」言辭把事情搞混、搞亂，藉以掩飾自己，把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裝扮成唯一的革命路線。這就是群衆中長期流行着所謂「路線鬥爭不可知」的原因。總之，林彪、「四人幫」砍掉眞理的客觀標準，是爲了便於他們胡作非爲、作假僞造而又能夠强辭奪理，把隨便甚麼臆造、謊言宣佈爲「眞理」。其爲害之烈，情節之惡劣，幾乎每個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幫」這種作法對於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極大破壞性，看來直到現在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他們造成的那種破壞實事求是、顚倒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以理論自身作爲證明理論是否具有眞理性的尺度的荒誕思潮，不僅俘虜了相當多的缺乏實際經驗和理論造詣的人（其中有的至今仍堅持認爲思想是第一性的東西），也影響了一部分有經驗的做領導工作的人，這種思潮對他們也發生了作用。林彪、「四人幫」的「拉大旗作虎皮，藉『高舉』以『營私』」的兩面派戰術確實嚇唬了一些人。同時，他們毫不手軟地把反對或懷疑他們這種作法的人打成「修正主義者」，也使一些人至今心有餘悸。

承認實踐是眞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科學不是迷信；理論首先要受命於實踐才能夠指導實踐；理論不是亘古不變的，它是在實踐中不斷地獲得補充、修正、豐富和發展的，如此等等——這樣看，是修正主義呢？還是眞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再三鄭重聲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

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列寧也再三指出，「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眞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爲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列寧選集》第3卷第26頁）

毛澤東同志關於這方面的教導就更多了。只須讀一讀《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等篇，就可以懂得毛澤東同志是怎樣對待馬列主義理論的。毛澤東同志毫不容情地嘲笑那些「以爲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是蒙昧無知的人。這些人看到列寧書上寫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從大城市開始，就拚命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首先奪取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的正確方針。他們認爲中國這個客觀世界，不是由中國人在實踐中認識的，而是由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人認識的，他們所說的一句一字也不能改。這些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想拿來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毛澤東同志說，「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這種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教條主義者。林彪、「四人幫」則是屬於另一類，他們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教條看待，不是拿它來包醫百病，他們根本就沒有治病之心，而是拿它來掩護他們從事反革命。這種人我們就叫做反革命修正主義兩面派。

這兩種人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面鏡子。而這兩種人在把馬列主義當作宗教教條看待這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相通的。

不要以爲修正主義只表現於直接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同志曾訓斥「四人幫」只反經驗主義不反

教條主義，就是暗示「四人幫」這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家伙有時也以某些教條（包括「語錄」形式在內）來嚇唬人們，欺騙人們。老修正主義者也這樣做。例如，斯大林曾指出：修正主義這種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在企圖抱住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不放，把它們變成教條，以便阻礙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從而也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斯大林選集》下卷第618頁）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整個理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不能違反；但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也是要向前發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個別原理、個別結論、個別口號，則隨着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人們認識世界的程度，始終受着歷史條件和實踐水平的限制。歷史條件改變了，實踐發展了，認識也要向前發展。新的歷史條件必然要促進理論的變化。毛澤東同志說，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單有過去那些著作已經不夠了，必須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同志，從來不諱言要把個別過時了的東西（包括自己的）加以修正或修改，用新的結論來代替。他們從來不認爲，這樣做就等於否定自己的理論或「懷疑」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們從事的是科學工作，是對眞理負責，對事實負責，而不自奉爲神明，也不願意別人把他們崇奉爲神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對於這種往往出於不正當動機的幼稚荒唐的行爲加以鄙視，有時嚴加斥責。例如，毛澤東同志對於林彪張口「三個副詞」，閉口「四個偉大」，又加上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幹法，就不但深表「討嫌」，而且直斥之曰「僞君子」。我們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修正《共產黨宣言》的個別原理的。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這種例子舉不勝舉。毛澤東同志在談到十大軍事原則的時候，也曾經指出：「運用了十大原則，取得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則目前還可以用，今後有許多地方

還可以用。但馬列主義不是停止的，是向前發展的，十大原則也要根據今後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轉引自葉劍英：《發展我國無產階級的先進軍事科學》，見《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修正、補正、糾正眞理的不完全性，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它是認識、理論發展的一個環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按照實際情況，對那些已經過時了的個別原理加以修正，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我們的黨章、憲法歷次都有所修改，有的是原則的修改，不改不行。黨章、憲法在制定的時候，經過黨中央、廣大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認眞的研究和討論，但不能以此為理由，認為曾經經過認眞研究和討論過的東西，就不允許在新的情況下加以修改。這種修改，有的是原來正確的東西因為條件變化而變得不適用了；有的是原來就不符合實際，必須拋棄；有的原來一部分內容被新的結論所吸收（例如，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問題，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雖然得出社會主義有在一國勝利的可能，但仍然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必須由多數國家的工人階級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總之，眞理是發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毫無疑義包括着對已經過時了的個別原理的修正。這並不歸結為修正主義，正好像我們說相對眞理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重視實踐經驗並不歸結為經驗主義一樣。

特別在歷史轉折關頭，實際情況變化迅速，原來提出用以指導運動的口號會迅速失效。列寧說：「在歷史急劇轉變的關頭，往往連先進的政黨也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勢而重覆舊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義。」（《列寧選集》第 3 卷第 107 頁）又說：「黨向群衆提出的任何口號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這個口號的條件已經變化時還會對許多人發生作用。這種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學會與它作鬥爭和戰勝它，就不能保證黨的政策的正確。」（《列

寧選集》第 3 卷第 611－612 頁）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可以舉出千千萬萬。例如在戰爭時期，在一定條件下應當提出「以運動戰爲主」的口號，這時如果仍拘守「以游擊戰爲主」，其對革命的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列寧這裏說的是要對這種拘守舊口號的「弊病」作鬥爭和戰勝它。爲甚麼這樣說呢？因爲要改變這些口號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這一點外，還因爲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這些舊口號聯繫在一起的緣故。這些人，他們口頭上說的是擔心某些舊口號、舊提法的修改會導致整個革命和整個理論的否定（顯而易見，這不過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飾辭），實際上是害怕自己某種個人的東西會因此受到損害。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破壞理論聯繫實際、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並且長時期對堅持這些原則的人加以迫害和打擊，其影響所及，直至今天，還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簡直是習慣性地不敢去觸及新問題、研究新問題，不敢去答覆群衆中提出的問題，總是繞開問題走；對上級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不「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衆情緒」（《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111 頁）去做好革命工作，相反地，常常逆着群衆的情緒行事。他們不看實踐效果。事情辦得正確不正確，是否眞正解決了問題，不看事實，不拿實踐作標準，而是上級或自己需要甚麼，就依此做判斷、下結論。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同志的教導。而且，不顧事實，不實事求是，也給各種野心家、陰謀家以可乘之機，使他們得以藉此製造混亂，搞各種禍國殃民的陰謀詭計。多年來，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我們吃不實事求是的苦頭實在太多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一條十分沉痛的教訓。

有些同志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責難：把實踐擺在第一位，以實踐爲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那末，把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話擺

在甚麼位置呢？對於說這種糊塗話的人，除了上面所說的可供他們思考以外，這裏，只須再反問他們一句：毛澤東同志說過：「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眞理的尺度」（《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23 頁），「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眞理的辦法。」（《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384 頁）你們把毛澤東同志這個教導擺在甚麼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眞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眞正弄懂的，我們還是應該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過去是、今後仍然是我們團結戰鬥的旗幟。林彪、「四人幫」肆意篡改毛澤東思想，打着毛澤東同志的旗幟，販賣他們的黑貨，我們不少人受過騙上過當，這個教訓太深刻了。現在應當着重於開動腦筋去眞正弄淸楚眞正的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是甚麼。只有在這個最重大的問題上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大家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只有這方面的眞正的一致，才有利於我們的團結事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鄧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極其精闢的闡述。其中指出：

「毛主席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結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繫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毛主席歷來堅持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毛主席歷來是按照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講問題的。……主要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幹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

轉。」

又說：

「全軍的政治工作會議多年沒有開了，現在開這樣一次會議，應該採取甚麼方法呢？很明顯，我們應該也只能採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過去的經驗，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任務、新的方針。這樣，我們的會議才能夠解決問題，才能夠解決得正確。韋國淸同志的報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表現。反之，如果我們只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更談不到正確地解決甚麼問題。那樣，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也只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淸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還說：

「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主席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爲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說得多麼中肯、多麼深刻、多麼好啊！

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確實不是一個小

問題。這裏涉及一個是眞捍衛毛澤東思想還是假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正如鄧副主席所指出，我們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別人堅持實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照抄照轉照搬，而不顧實際情況如何。甚至不允許講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不允許講衝破林彪、「四人幫」設置的「思想禁區」，彷彿一講實踐標準，一旦衝垮那些「禁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會站不住，就會大禍臨頭似的。眞是怪事！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革命的科學思想體系，是經過千百萬人民的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眞理，它可以戰勝一切倒退的、反動的思潮而決不被它們所戰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經企圖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幫」在內，一個一個都自己倒下去了。我們有些同志爲甚麼那樣沒有信心呢？如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眞像這些同志所設想的那樣虛弱，那樣害怕與新的歷史條件相結合，害怕實踐，害怕砍倒，那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決不是眞馬列主義、眞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但是在三大革命運動的偉大實踐中間，而且是在同形形色色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直接鬥爭的偉大實踐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的。我們有些同志自稱信奉唯物主義，熟讀《實踐論》，但一聽到實踐標準，就如臨大敵，究竟爲了甚麼呢？應當認爲，這是目前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思潮。這種思潮，同群衆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剛剛恢復和發揚起來的實事求是、憑事實講話、敢於提出和研究新問題的優良作風，站在對立面，這兩者之間的鬥爭，毫無疑義反映了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這場鬥爭的深刻性和複雜性。

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毛澤

東選集》第 1 卷第 272 頁）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認識眞理的道路愈來愈寬廣。馬克思主義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條、一切僵硬東西的最大的敵人。眞正的毛澤東思想也一樣。恩格斯說過：「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愈加符合於工人的利益和願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254 頁）毛澤東同志也說：「我們除了科學以外，甚麼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31 頁）尊重實踐，尊重科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們就能夠推動理論，獲得新的眞理。在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正如列寧所說的，「現在一切都在於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爲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列寧選集》第 3 卷第 398 頁）

（原載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

附錄三：

如何防止災難性歷史的重演？

吳　江

(一)

舉世矚目的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已經結束，十個主犯已得到應有的懲罰。中國共產黨關於建國三十一年來若干主要問題的總結性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緊進行。這兩件事標誌着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清理已初步告一段落，能夠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事業了。

「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情況：一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二是黨自身犯了嚴重錯誤，這個錯誤主要由毛澤東負責。這兩者又是有聯繫的，不可分的，或者說相互爲用，互爲因果。而其共同的結果是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一場大災難。

現在，這場災難總算已經過去了。但歷史會不會重演？這樣的災難會不會再度降臨？有人仍然有這個擔心。我們沒有理由說這種擔心是毫無根據的。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迂迴的。總的是向前發展，有時可能倒退，有時可能重演，當然不是在原來基礎上重演。我們常說，歷史每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只要某一歷史上提出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只要產生同類事件的歷史條件或土壤依然存在，那末，歷史的不同形式的重演，或者歷史上發生極相似的事件，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例如，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只要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存在着，像地方

割據和宦官外戚專權一類事就不可避免。法國革命歷史上，雅各賓派一共出現過三次（一七八九年，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旗幟和口號幾乎相同。在無產階級政黨活動的歷史上和無產階級政權的歷史上，有些同類性質的錯誤也一再重犯。例如，蘇聯十月革命初期曾犯過軍事共產主義的錯誤，廢除貨幣、商品交換等，企圖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國五十年代末也重犯類似性質的錯誤。我們曾經有過三次大的左傾錯誤，三十年代初期一次，五十年代中後期一次，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又一次，都給革命造成重大的損失。我們國家在六十年代初進行過一次經濟調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來一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三十年代起蘇聯共產黨內發生的危害極大的個人崇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內也再度重演。

中國革命有兩個令人不能忘懷的十年。一個是輝煌勝利的十年，那就是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十年是不斷革命不斷勝利的十年，眞是天翻地覆，其間幾乎沒有遭遇甚麼挫折。這是古往今來世界革命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另一個是災難性的十年，那就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管怎麼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黑暗歲月。這兩個十年是有某種聯繫的。因爲勝利而沖昏頭腦，過分强調革命領袖的個人作用，因而造成某些導致後來遭受挫折的因素，這是一種聯繫；因爲出現後一個十年而否定前一個十年，或者至少使其黯然失色，這是又一種聯繫。現在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分析前一種聯繫，但又必須警惕地防止後一種傾向的產生。

有人說，造成歷史的不幸往往是由於握有無上權力和具有特殊性格的領袖人物的存在，如果這樣的人物已不存在，而且今後也難以再產生這樣的人物，那末，這種歷史就算是過去了，不可能再重複了。這種看法，我以爲至少失之於簡單化，還是過分着重於個人作用，沒有反映出隱藏在事件背後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社會歷史原因。

還是要記住恩格斯說的那句話：原因不能從領袖人物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中去尋找，而應當從總的社會狀況中去尋找。

當然，歷史不可能照原樣重演。「文化大革命」確實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再照樣複製一個「文化大革命」。假定即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餘勢力重新登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也會披上新的服裝，尋求新的方式和口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同於黨內出現的一般反黨集團，也不同於社會上出現的一般反革命集團。他們是在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並進行活動的。他們並不像一般反革命集團那樣具有自己獨立的反革命組織系統，而是依附於黨和國家的；他們也不像一般反革命組織那樣有自己的獨立的反革命綱領，他們基本上是利用黨內日益系統的破壞性極大的左傾錯誤及與此相適應的一套理論，作爲公開號召的旗幟，藉以欺騙和蒙蔽幹部和群衆，並以此爲掩護從事他們的陰謀活動。的確，像這樣的反革命集團今後很少有可能照原來的形態（例如，一個還是以副統帥和接班人的身份，一個還是披着「女皇」的服裝）重生。我們所說的歷史的重演，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說歷史有可能重演，是指發生悲劇事件的最基本的歷史因素並未消除，或者沒有完全消除，或者消除後又重新產生了，那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同形式的但屬於同類性質的悲劇事件可能重新出現。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這樣的歷史事實很不少，我們一開頭就說到了。

因此，現在我們要着重弄清的是：究竟是甚麼樣的消極歷史因素最終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產生這類災難性的事件。

（二）

我們不能說出唯一的因素，也很難說出唯一的因素，因爲各種因素和條件是互相關聯、互相作用、互相誘發的。造成十年浩劫，從最根本的一個方面說來，是由於產生個人崇拜，個人獨攬大權和與此相聯繫的民主集中制遭受破壞，政治生活極不正常，以及中國

共產黨在創建和運用國家機器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重大弱點，特別是不重視政治民主化和輕視以至破壞法制。而後一方面則同無產階級管理國家的時間還短暫，還沒有積累起足夠的成熟的經驗這種情況有關。

以上每一個別因素都不能孤立起來看，它們也不能脫離開當時的社會環境獨立地起作用。而且有的因素的出現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例如，個人過多地集中權力。每個階級，要取得自己的統治地位，都必須有自己的政治領袖和傑出代表，以便把本階級的意志和力量統一起來。在緊張的內外鬥爭中，領袖個人的作用往往很突出，往往自然而然地集中權力於個人手中，甚至使領袖個人成爲獨裁者。從歷史上看，無論哪個階級，創業的第一代，很容易出現這種局面。在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爾，以及拿破侖，都是這樣的人物。孫中山領導革命也是這樣，他要求黨員絕對服從他個人，並要舉行落後的會黨式的打手模。直到逝世前不久他才有所覺悟，說出「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這樣的話來（據吳玉章回憶錄）。無產階級是集體主義者，要竭力防止權力過度集中於個人，但有時被鬥爭所推動，也難以完全避免。這種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的現象，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一切場合都起消極作用。它和個人迷信也沒有必然的聯繫，兩者不是一個東西。例如，戰爭往往需要權利高度集中的統帥。個人集權所造成的危害及危害之大小，也要看各種歷史條件而定，其中包括個人的條件。

無產階級開國領袖，第一個是列寧。列寧手裏也集中了相當大的權力，但是列寧運用的權力是階級的權力、黨的權力，不是個人的權力。所以列寧在世時，聯共黨內的生活是比較正常的，不同意見可以自由爭論。後來這個傳統被斯大林破壞了。請注意一點：斯大林和列寧不同，列寧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權威和主要領袖，尤其在十月革命後，他很少遇到挑戰，也沒有甚麼人能夠向他挑戰

（在個別問題上的爭論是有的）；斯大林稍不同些，斯大林當然也有歷史功績；但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一個時期，他的集權多少有些人爲的因素，容不得不同意見，採取政治高壓手段，有時甚至排斥、打擊、陷害那些不順從自己的其他領袖們。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個人集權的方式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它把集體領導的原則完全葬送了。

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空前緊張空前殘酷的鬥爭環境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領導中國革命達到勝利的領袖們是一批久經考驗的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又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他爲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主要領導地位，這是革命的結論，也是歷史本身的選擇。如果我們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革命道路回顧一下，毛澤東如何在中國革命危難之際多次挽救革命，指出正確的道路，引導革命到勝利，就會明白歷史的選擇沒有錯。一九四五年黨的七次代表大會對於毛澤東和毛思想的評價，不過是追認了以上的歷史事實而已。總的說，「七大」對於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評價是恰當的、科學的，但也應該說已經包含有若干過頭的說法。

這裏至少說明兩點：第一，不能忽視傑出人物的個人作用。個人集權往往在緊張鬥爭環境中產生，這種個人集權對歷史起甚麼樣的作用，是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主要看執行的路線、方針正確與否，看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是否正常或大體正常。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是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就推動中國歷史前進這種個人作用來說，沒有人能夠與他相比。當然，也不能把功勞全歸於一個人。第二，在黨和國家生活中，除了按正常分工負責某方面工作，或受黨和國家的特殊委托全權處理某項工作以外，決不能把最後決定權交給一個人，最後由一個人說了算，由個人獨攬大權。這也就是說，把黨和國家的命運交到一個人

手裏，這樣做是十分危險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尚且懂得這一點，無產階級政治家應當比資產階級更加正視這個問題。

革命政黨內存在家長式的、實際上的個人集權制，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現象，過去屢有發生。個人崇拜也由此逐漸發展而來。這裏有一個問題：爲甚麼毛澤東大權在握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直到五十年代前期）沒有犯大的錯誤，而從五十年代後期起就不斷犯錯誤直至掀起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呢？我想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就毛澤東同志個人來說，問題是否可以這樣看：這裏除了黨的整個情況以外，個人的思想狀況起着很大的作用。當着戰爭時期面對着國內外強大敵人、勝負命運未決的時候，當着解放初期同樣面對着國內外緊張鬥爭局勢的時候，雖然那時已有個人崇拜，但黨內生活還是比較正常的，毛澤東本人也能夠虛心體察情況，實事求是地探求客觀規律，尊重黨的民主集中制，依靠領導集體，因此能夠提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團結全黨，同心同德去戰勝敵人，克服困難。在這種時候，他運用權力實行領導是很出色的。「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黨雖把大權交給他，他也未曾濫用權力。但是，當到了壓迫自己的敵人已被戰勝、無產階級政權已經鞏固、國內經濟已經站穩腳跟、各方面的勝利接踵而來的時候，他的思想狀況開始發生變化。首先由於勝利而滋長了驕傲情緒，不肯虛心體察社會主義新事物，同時，對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面貌急於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漸脫離實際，陷入了左傾空想。因此，逐漸偏離了正確路線。從這個時候起，他就開始不正確地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有時強行改變集體的決定，把自己置於集體之上。這叫做「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就是說，置實際情況和客觀規律於不顧。勝利導致自我膨脹，又過分看重個人的聲譽和威望，諱言錯誤，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見，反認爲這是對自己權力的挑戰。這樣，一場鬥爭就不可避免，一直引導到「文化大革命」。「文化

大革命」所說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不惜任何代價鞏固一個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力和絕對權威。

第二，從黨和國家的領導狀況和管理狀況來看。世界上剛出現不久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嚴重歷史教訓，在於沒有及時地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秩序，特別是沒有確立一套用以調整自己內部關係的民主法制秩序，沒有採取適當的方式來限制黨和國家權力被濫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與此有關。

讓我們再看一看封建制度吧！封建制度是確立君主一個人的權力，這是天經地義。皇帝一個人決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作非為。但即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別是中國的封建制度，長期以來也有一套約束、限制君主權力的措施，如設立諫官制度等。唐德宗時候的陸贄，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諫官，蘇東坡很佩服他，把他的奏議介紹給宋仁宗，勸他要虛心聽取諫官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篇叫《封駁》的，指出「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他考察了漢以後歷代皇朝的統治經驗，指出唐朝時候有一種制度：在皇帝身邊設一種小官叫給事中，屬門下省，這種官「品卑而權特重」，他們有權把皇帝所下的詔書駁回去，糾正皇帝的錯誤。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唐宣宗李忱（唐朝倒數第五個皇帝）有一次任命一位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委任狀已經發出。其時給事中蕭放封還制書，說李燧當節度使不合適。宣宗正在聽音樂，他看到蕭放的意見，當即停止聽音樂，來不及另派「中使」，就派「優人」前去把委任狀追回。一直到明清時候，給事中這種官職沒有廢除。這是封建時代的一種監察制度。封建國家，有時是借助於皇帝祖宗的訓示或先聖的教條，使皇帝也不敢完全憑個人意志無所顧忌地為所欲為。當然，封建制度下這種辦法的效果是極有限的，事實上，往往成為各種政治勢力控制皇帝的一種手段。

中國的新政權建立在半封建的舊土壤上。在中國這塊地方，封建殘餘非常之多，而國家管理的民主傳統則甚少。中國是經歷過長

期的民主革命的。中國的革命者並不是不重視人民民主，中國甚至有軍事民主。但在奪取全國政權後對於運用國家民主制，卻確實缺乏經驗，或者說重視不夠。黨的領導首先要確立和健全無產階級民主制即人民民主制，使勞動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力，眞正成爲國家的主人，然後國家才有力量發揮作用。我們對於這一點並不是始終都十分看重。我們的人，長期以來只重視黨的政策而輕視國家法制，不懂得把兩者統一起來。講到法制，我不妨提一下拿破侖。拿破侖在法國革命後上台，爲了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搞了一部《拿破侖法典》，恩格斯稱之爲「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爲了制定這部法典，法國參政院召開了八十七次討論法典草案的會議，其中有三十五次是由拿破侖親自主持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此看重立法，而我們卻長期不認識立法治國的重要性。開國以後我們還碰到一個黨政關係問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我們也未能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妨礙國家直接行使權力。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因爲沒有經驗，曾把一切問題從人民委員會搬到政治局。列寧後來發覺了這個問題，只是由於逝世過早，沒有來得及解決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戰爭環境中和地下秘密狀態中走過來的，有很高的集中性和組織紀律性。在成爲執政黨之後，沒有注意及時加强黨內民主，改革黨的領導制度，實行黨政分開，沒有通過國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設，完善黨對國家的領導，在新的條件下重建和人民群衆的聯繫，因而不能抵禦舊官僚主義灰塵和封建意識對黨的侵襲，甚至也不能抵禦「權力」這個東西對黨的腐蝕。

此外，我們也沒有認識到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東西的弊害。誰也沒有提出退休這個問題，領袖人物沒有這種觀念，一般同志也沒有這種觀念，相反，都覺得離開自己不行。有的甚至到了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時候，仍津津於高位與權力。

這種弱點，也在毛澤東身上表現出來。這裏使我們認識到，在集體中，錯誤往往不能只叫領袖一個人負責。如果我們能夠較早地

有認識以上問題的覺悟並且採取適當的措施，比如說，能夠及早地提出健全國家民主制和加强法制建設，能夠及早地改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和監督制等等，那末，我們或許可以避免犯那種嚴重錯誤，或者可以大大減輕錯誤。我們未曾做到這一點，說明我們雖然創造出了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業績，卻還缺乏運用國家機器的成熟的經驗。

錯誤不是憑空出現的。我開頭就說過，我們發生這種錯誤，產生這些弱點，歸根到底，是同我們的社會歷史條件有關。中國是長期封建社會，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和與家長制相聯繫的小生產佔絕對優勢。人數很少的無產階級，同個體小生產者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的農民小生產者有很高的革命性，同時又有狹隘性、保守性，文化水平低，對現代的科學技術、現代民主政治缺乏了解。農民的特點，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農民按他們的本性來說，可說是天生的個人崇拜者。《東方紅》的歌詞就是表達農民的個人崇拜，和國際歌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個人崇拜是小生產家長制的擴大。

社會的經濟和文化愈落後，個人的作用會愈突出。在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確實容易產生個人崇拜、個人專權。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出現的個人崇拜，有一個特點，就是往往帶着濃厚的封建性，總有一點封建遺風。忠於個人，而不是忠於黨。上面「一言堂」，下面「一邊倒」。這種個人崇拜，有時甚至用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把它鞏固起來，爲害就更大。

在我們這裏，領袖個人的權力、權威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當人們發現他已經離開正確道路而採取錯誤行動並已造成嚴重後果的時候，黨內也很難有人能夠公開站出來，提出不同的綱領與之進行路線上的爭論（某種抵制或消極抵抗或局部性的糾正是有的）。有人說，建國以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公開進行着

正確和錯誤兩條路線的鬥爭。照事實看來，這種說法很難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個人集中很大權力、個人崇拜那一套盛行的條件下，特別是如果政治生活不正常，那末，在高層的領導幹部中間，容易出現下面四種情況：

一種是，能夠堅持原則，敢於講眞話，不搞「一邊倒」，能夠提出不同的正確意見。這樣的幹部，在整個路線方針發生偏差的情況下，一是容易遭到打擊或遭到陷害，二是實際上不能正常工作。

另一種情況是，對黨的事業忠貞不渝，以大局爲重，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兢兢業業地工作，努力減少因路線方針錯誤而造成的工作上的損失。這些同志常常爲了顧全黨的團結，保護黨的力量，自己甘心忍受一點委曲，即使如此，也不可避免地要冒點風險。

再一種情況，人數可能最多，這種人的特點是分不淸是非，不用腦筋想問題，盲目緊跟、照辦。

第四種情況，就是少數心術不正的人，利用黨內生活不正常，摸政治氣候，奉迎阿諛，投其所好，抬轎子，吹喇叭。他們對領袖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把個人崇拜推向極端，神化個人，製造「現代迷信」，提出「高舉」、「緊跟」一套，以騙取信任，爭位邀寵；同時，也把錯誤推向極端，製造政治經濟危機。這一切，都是爲了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抬轎子者大多是準備自己坐轎子的。

這第四種人只是極少數，但任何時候都有，他們所能起的作用，主要看整個領導狀況如何。如果整個領導不發生問題，民主集中制執行情況正常，這種人不容易造成危害。如果領導發生問題，特別是，如果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搞「一言堂」，個人獨攬大權，熱衷於個人崇拜，那就將爲那些人的活動提供絕好的機會。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經驗都證明，任何偉大人物，偉大的領袖，如果脫離集體，脫離群衆，一意孤行，聽不得不同意見，不尊重組織原則，並且爲了個人權威而堅持錯誤，堅持某種「先入之見」，並且猜疑這猜疑那，這種弱點將不可避免地爲上述那些人所利用，甚至

於受他們的蒙騙與包圍，最終受他們的支配。這是早有歷史經驗的。歐陽修有一篇《宦者傳論》，介紹古時候這種情況，可以讀一讀。他說有一種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即使是無產階級的領袖，如果脫離集體，脫離群衆，心生猜疑，總以爲別人不忠於自己，只有迎合自己者最値得信賴，結果也難免要走到這個地步。這樣，實際上也就是把黨和國家的命運交到一些野心家、陰謀家的手裏。爲甚麼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中會出現如此兇惡的反革命集團，我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因此，對於我們內部存在的這樣一種人，値得我們嚴重注意。

（三）

毛澤東逝世不久，繼林彪之後的江靑反革命集團就被粉碎。不少人鬆了一口氣，以爲災難性的歷史已經終結。也有人擔心事情並未最後了結，但他們一般地只看到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一些表面上的動亂因素，這就很不夠。問題要比這深刻得多。

我們的狀況，粉碎「四人幫」以後和粉碎「四人幫」以前，當然有極大的不同。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我們有可能擺脫一個左傾空想的惡夢時期。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看出，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個短時期，過去的歷史還在一片歡呼、告別聲中悄悄地延續，某些導致災難的因素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好像是在重新積聚起來並力圖獲得新的生命力，力求重新在黨和國家生活中强有力地表現出來。它們已成爲一種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着人們的頭腦。我們的人已習慣於借用消逝了的偉大人物的名字，披着那種久受崇敬的服裝，重複過去的某些錯誤作法。這是我們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不得不在徘徊中艱難前進的重要原因。

「捍衛毛澤東思想」，這是最響亮的口號。捍衛甚麼呢？這裏

就有最根本的分歧。是撥亂反正，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捍衛眞正的毛澤東思想呢？還是捍衛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錯誤決策和一些錯誤判斷呢？「兩個凡是」的提出，就是捍衛後者，即堅持過去十年的錯誤方針。

最重要的，作爲一切錯誤的支撐點的，是維護舊的個人崇拜，並力圖樹立新的個人崇拜。維護舊神，是爲了塑造新神。當時有一種好心的說法，彷彿只有讓一個人終身擔任最高職務，才談得上「領導的連續性」。於是，一個時期又掀起一陣宣傳個人的狂熱。甚至把粉碎「四人幫」的功勞也歸於一個人，好像黨的集體領導仍不起作用，好像「四五」群衆運動對此也毫無貢獻（實際上正是這個群衆運動使「四人幫」一小撮處於全民包圍之中，危如壘卵，不堪一擊）。這說明一些人，在新時期開始時還沒有來得及從長期的個人專權的傳統和英雄史觀的愚昧中解脫出來，具體地說，還沒有眞正認識到擺正領袖個人同黨、同人民群衆的關係的極端重要性。而能否正確處理這種關係恰恰是我們在度過十年災難之後所面臨的最迫切最核心的問題，也是全黨全國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毛病，可以說是過去十年災難的淵源。

當然，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就以重搬個人崇拜那一套來說吧，歷史照原樣重演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正像馬克思借用黑格爾的話所說的那樣：一切重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但第一次是作爲悲劇出現，第二次、第三次是作爲笑鬧劇出現。這裏値得注意的是，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的威望、集權和人們對他的崇敬是在長期鬥爭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其中人爲的勉强的因素較少（「文化大革命」期間除外）。這樣的歷史人物消逝以後，如果另一個人物要馬上代替他，第一，歷史本身不可能馬上造就出這樣的人物來，第二，如果有人要「起而强爲之」，儘管採用權威性的辦法，也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個不可捉摸的過程，而最後能否達到目的，尙是未可知的。歷史多次證明，一切離開多

數人意志的、違反民主的、人爲的集權方式，必將帶來紛爭與禍亂，使政局長期處於不穩定之中，使黨和國家付出很大的代價。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功績，在於使我們眞正決定性地擺脫過去那段災難性的歷史，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並且有可能眞正採取切實的步驟消除歷史上積累下來的那些導致動亂和種種不幸的消極因素。當然，事情是困難的，積習太深了。而新的道路新的事業尚有待我們積累經驗。在某些生疏的事情上我們還免不了走一點彎路，有時甚至還需要從頭做起。因此，道路仍然是曲折的。現在有些人，特別是一些青年人，不容易理解這一點。他們不懂得在長時期的歷史性災難之後，面臨歷史的轉折，要取得新的歷史進步的補償，也難免要走一段艱難曲折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的道路。這裏需要的是實事求是堅忍不拔的毅力和負責精神。空疏的、只圖一時痛快的激進言論，往往無濟於事。空疏誤國，歷史上不乏教訓。展望二十一世紀，仍然要依靠唯物史觀的理論思維，不能求助於十八世紀的幽靈。總之，在新的征程中，在我們內部仍然需要做大量艱苦的耐心的政治協調和思想引導工作。這就是我們目前的鬥爭和困難。

但是，歷史如長江大河，雖有曲折，畢竟東流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歷史的重擔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無法也無權推諉。我們的重大責任是要堅定不移地完成我們的中興事業。從歷史上看，要做到這一點，主要辦法是兩條：一曰總結經驗，二曰厲行改革。

關於總結經驗。中國的舊統治者歷來有總結歷史經驗的傳統，叫做「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如西漢賈誼所寫《治安策》、《過秦論》，唐魏徵所寫《諫太宗十思疏》，都是爲人們所傳誦的總結歷史經驗的好文章。一部《資治通鑒》，顧名思義，就是總結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經驗。孫中山先生也是重視總結經驗的，他總結辛亥革命失敗、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經驗教訓，決心提出革命的三大政

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改組國民黨。無產階級當然更應當重視總結歷史經驗，這是由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決定的。無產階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會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困難。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不同，資產階級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然而這種革命爲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相反，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清算自己的錯誤，或者往後退卻，有時還不免將過去做過而做得不適當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革命要經常進行自我批評，也就是說要經常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善於改革自身。暫時失敗、受挫折不要緊，重要的是要把眞切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

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次就是一九四五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次就是即將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定要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決議有同樣了不起的歷史意義。前一個決議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任弼時同志具體主持作出的，那裏批判了過去統治黨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現在看來仍是正確的，反映了歷史的眞實；後一個決議，即我們現在正在作的決議，將評論毛澤東同志的功過。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我們前面說到的搞個人崇拜，集大權於一身，搞「一言堂」，傷害民主和法制等，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必須認眞總結。但是，如果說這些錯誤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那就欠公正，也不符合事實。同時，也千萬不可忘記，在毛澤東這個偉大人物身上，錯誤的東西是第二位的，他的豐功偉績是第一位的。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現在的新中國」，這話並沒有過分，將來也站得住。同某些目光短淺的人的評論相反，像這樣的大人物，歷史過去得越久，人們對他的肯定會越多，而不是相反。越往後，人們將越看清楚這個人對於加速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巨大功績。「文化大革命」本身確實是一場浩

劫，一場災難，因此否定它是完全應該的，這也是歷史本身的結論。我們總結經驗，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必須實事求是，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個人的成見和利害得失出發。必須有歷史全局眼光，必須有歷史責任感。要着重指出犯錯誤的原因，指出歷史上產生消極因素的原因。只有公正地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才能眞正分淸是非，教育全黨全民族，從而團結全黨全民族，也只有這樣，過去的錯誤才有可能避免，才有可能不走歷史老路。

其次，關於改革。必須下大決心，厲行改革。經歷了一場大災難之後，要徹底擺脫災難，開拓一個新時期，不進行改革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存絲毫僥幸心理。「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老百姓在看我們有沒有改革的決心。這裏值得提出的是兩件事：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除確定農業改革的方向以外，還決定對整個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在經濟上，我們過去許多措施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出發，不總是能夠從客觀經濟條件和經濟規律出發，有些作法雖在當時條件下是必要的，但其弊端已日益暴露出來，非改革無以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其次是鄧小平同志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其中涉及許多重大的問題。這種改革將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歷史命運。產生消極因素的歷史根源找出來了，就要採取措施改變它。我們黨沒有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在總結經驗的同時，已經開始着手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以及經濟體制的改革，着手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整頓黨風，着手推進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加强法制，等等。同時，也提出要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中洗滌乾淨封建主義遺毒和小生產習氣，前面已經說過，這些東西是產生個人專權、家長制等等的天然土壤。當然，批判封建主義決不是肯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決不可使絕對民主、絕對自由思想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泛濫成災。我們强調國家民主化，決不是認爲，民主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也

決不認爲，言論絕對自由，限制是不應有的。必須十分警惕藉口反對封建主義而攻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最後，想簡單地補充提一下如何看待領袖的作用，如何對待宣傳個人的問題，無產階級領袖在這方面應當具有甚麼樣的品德。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需要有自己的傑出領袖。反對個人崇拜如果弄到否認或貶低領袖的作用，那是愚蠢的。任何階級，任何團體，任何政黨，都必然會出現自己的領袖，不是好的領袖，就是壞的領袖，不是傑出的領袖，就是平庸的領袖。貶低領袖的作用，甚至認爲領袖可有可無，那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或者簡直是自欺欺人。但是在領袖集團當中，在一定時期，不管用甚麼方式產生，仍然會有一個主要代表者，或者說，主要的領袖人物，他的手中握有較多的權力，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必須正視這種歷史現象。社會主義民主並不取消個人負責制，但必須防止個人負責制蛻變爲個人專權。今天，人類發展水平還不可能絕對保證避免個人專權的現象。爲此，首先在政治制度上要有嚴格的預防措施和限制措施。例如，嚴格的集體領導制度、權力制衡制度和群衆及組織的監督制度，規定嚴格的批評自我批評制度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制度；人民內部必須堅持爲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項自由；監督者要有足夠的權力和自我犧牲的勇氣；黨章國法應作出限制最高領導者權力的規定，除非按照分工或由黨和國家正式授權，個人絕對不能專擅權力，如果在重大問題上有專擅權力的行爲，則應予以查究直至提出彈劾；規定最高領導職務的任期年限（短期輪流坐莊亦非良策）以及對連任的限制，這種限制不能任意逾越；禁止對領袖的歌功頌德和一切個人崇拜宣傳，例如，動不動把領袖的一些普通言論推崇爲「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之類。首先從各級領導人做起，從黨的報紙做起。報紙宣傳很重要，必須杜絕積習甚深的個人崇拜宣傳。以上措施是否會限制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呢？是否會使人民群衆不了解自己的領袖呢？照我看那是不會的。相反，這樣做正是爲了在集

體領導的原則下正確地無弊病地發揮領袖人物的作用，正是爲了使領袖個人保持同黨、同人民群衆的正確關係。

其次，必須重視領袖本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集體主義修養。作爲領袖，應該堅定不移地忠於黨的民主，忠於社會主義民主，遵守國家法制。他在黨和國家的危難時期或者最需要他的時候應該挺身而出，當仁不讓，但決不誇大個人的作用，決不貪圖或眷戀個人權位，在應當引退的時候就及時引退。他應當眞像馬克思恩格斯所說那樣「厭惡一切個人迷信」，把個人「聲望看得一錢不值」，摒棄「要使自己成爲了不起人物的奢望」，並且眞正認識到「任何一個身居高位的人都無權要求別人對自己採取與衆不同的溫順態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72 頁)。

他應當以身作則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眞正以平等態度待人，團結人，不但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證明反對錯了的人，尤其要團結和愛護那些對自己提過不同意見證明是提對了的人；對於搞自己的個人崇拜的行爲，不能聽之任之，心安理得，甚至把這種人引爲最可信賴者而提拔重用，而應當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並提出糾正的辦法。作爲一個領袖人物，可貴的是言行一致，始終如一，不是口頭上反對個人崇拜，實際上欣賞個人崇拜，或者一個時候拒絕個人崇拜，最終又要求個人崇拜。在沒有金錢特權的制度下，政治權力往往是對某些領袖人物最起作用的腐蝕劑。我們應當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求得長進，不再煞費心機地抱住個人崇拜的惡習不放。歷史已經最明白不過地告訴我們：凡是不正確地處理個人同黨、同人民群衆的關係，把自己凌駕於集體和組織之上，心安理得欣賞個人崇拜，藉權位謀求個人聲望，並且總想手裏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大，並想終身享受這種權力的任何領袖人物，人民有一百個理由對他不放心，因爲事實證明，這是多年來不安定因素的根源，因爲這是很少不鬧出亂子來的，或者由此損害整個黨和國家的健康機體，或者使黨和國家陷入動亂或者拖入某種危機的深淵。這裏就尖銳地提出了

黨和人民群衆如何選擇和監督領袖人物的問題。

毫無疑問，這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一項重要的歷史經驗，我們應當再三加以思索。

（原載一九八一年《理論動態》第 262 期）

附錄四：

《理論動態》（第 1－346 期）

目　錄

（1977 年 7 月 15 日——1982 年 4 月 24 日，胡耀邦任職中央黨校期間）